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霹雳惊天——人民空军征战纪实



人民空军征战纪实

第一章 蓝色序曲

1 面对蓝天，中国人民开始了蓝色的畅想。

在历史的天幕上这样醒目地写着：“战争称雄的年代，谁拥有制空权，谁就赢得优势！”当中国人面对 20 世纪的祖国现状，又展望世界风云的时候，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蓝天，投向那一团轰鸣的希望之光。

于是，建设一支空军，拯救于民族危亡，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和决策。决策者的脑海里，回顾着世界空军的历史，企图从中发现自己的道路。

如果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故事，那么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童年。1

回顾之一，飞机前身是气球和飞艇。1783 年 10 月 15 日，法国蒙哥尔费兄弟发明的热气球载人上升到 26 米，使人类升空的理想得以实现。1794 年，法国首次将气球用于军事。事后各国竞相效法，取得一定成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法、俄、英等国都成立了飞艇部队。美国莱特兄弟的载人飞机问世后，欧洲各国迅速加强了对飞机的研究。从 1910 年后，在欧洲和美国广泛举行飞行比赛和航空博览会，促进了飞机的发展。

回顾之二：1914 年意土战争爆发，10 月 23 日，意军皮亚扎上尉驾驶布莱里奥 XI 型飞机飞往的黎波里与阿齐齐亚对土军阵地进行侦察。11 月 1 日，加沃蒂少尉又向土军阵地投掷了榴弹，这被认为是空中战争的开始。

回顾之三：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飞机总数约 1000 架。随着战争的进展，飞机作为战斗手段的能力也随之提高。法国首先在飞机上安装了机枪。1914 年 10 月 5 日，法国飞行员用机枪击落了 1 架德国侦察机，发生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空战。经过 4 年战争，飞机性能有了很大发展，一次大战期间共生产飞机 18 万架。敌对双方投入作战约 10 万架。在作战任务方面也由单纯执行侦察、通信、炮校等辅助性勤务扩大为空战、对地攻击、远程轰炸等多种战斗活动，并分别建立了专门的歼击、轰炸和侦察航空兵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量空中作战实践，引起了人们对空中军事的关注。英国首先认识到航空兵战略作用，认为它应该成为同陆、海军并驾齐驱的军种，并于 1918 年建立独立的军种。

回顾之四：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军政界和学术界对航空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著名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意大利的杜黑将军最先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有关空军建设和作战实用方面的许多问题。他于 1921 年发表的《制空权》一书中，全面地阐述了对空中作战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空军是未来战争中主要的、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杜黑的理论又被称为“空军制胜论”。与杜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美国陆军航空局副局长威廉·米切尔和英国空军参谋长休·特伦恰德，他们三人堪称建立独立空军的先驱。这种以杜黑为代表的空军学术思想，一方面颇有远见地揭示了空中力量的本质及其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制空权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囿于不成熟的经验和唯武器论的观点，过分夸大了空军的作用。

回顾之五：本世纪 20 年代，航空技术继续发展，但空军作战的实践不多。30 年代发生几场规模较大的局部战争，主要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和日本侵华战争。在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远征作战中，空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缩短了战争进程。西班牙内战提供了航空兵现代战争中作战使用的丰富经验。日本侵华战争完全证实了飞机支援地面作战和担任后方补给的重

要性。在这些局部战争中，一些参战国各自检验了自己的理论、武器装备和作战使用原则。飞机的军事潜力得到显示。

眼光回到共产党自己的身上。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打响了。就在这次战争中，有一支航空队骄傲地飞翔在蓝天。他们是广东航校第二期师生。

这支航空队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24年，那时国民革命政府在孙中山先生“航空救国”思想倡导下，就创办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广州市东南方的大沙头就是当年的校址。

航校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来自黄埔军校，10名学员中就有4名共产党员。我军航空史页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刘云、王翱、王勋、唐锋。他们是最早从事航空事业的共产党人。航校的全部设备，说简陋也行，说可怜也不过分。靠着4架木制的寇狄斯霍克飞机，零星购得的五加仑桶装汽油，我们的第一代航空志士靠着惊人的胆略与毅力冲上了云端。³

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极度恐慌，他们联合起来，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扼杀刚刚诞生的广东航校。

在这种动荡的局势中，广东航校的国共两党飞行学员携手并肩，千方百计提高航空志士的素质，壮大航空队伍，决议派人到苏联学习深造，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4批、数十名征天儿女。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刻苦磨练翱翔蓝天的翅膀。

湖南益阳灵山秀水哺育长大的唐锋是最早赴苏联学习航空的青年之一，岳麓山的风云使他很早就认识了革命。1918年秋，15岁的唐锋便随蔡和森同去法国勤工俭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留法两年中，除了医学专业，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并与蔡和森、陈毅等人发动了“二·八”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但留法的革命实践，使唐锋放弃了医学救国的初衷，考入广东航空学校。1925年10月，又受派遣到苏联空军学校深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下，不断取得进步。

他在苏联整整27个春秋。开始是学习，反过来又在苏联空军院校担任过少校、中校教官，还承担了莫斯科红场检阅的空中领航员，得过苏联最高的列宁勋章和红旗、红军勋章。在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唐锋参加了苏联空军冲击团，以见习空中射击副团长的军职上前线参战，建立了卓越的战功，被誉为“佩带列宁勋章的中国飞行员”。

在他回国后的30年中，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培养了大批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为航空科学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成为一名出色的空军将军。

第二批赴苏联学习航空的共产党员常乾坤，是位清秀、沉稳、干练的年轻人，他不但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学得非常精湛，俄语说得几乎可以和地道的俄罗斯人媲美。在苏联，他担任过航空教官，得过多枚勋章和奖章。抗日战争爆发后，身处异国的常乾坤4等10多名同志，从无线电里收听到国内人民奋起抗日的消息，立即联名上书，向党中央驻第三国际的代表提出回国参加抗日和建设航空事业的要求。

中国空军要发展壮大，被送往苏联学习的一批批优秀学员将为此奠定基础。同时，它也客观地告诉了我们，现代国家，倘若没有强大的空军，就像徒有四壁而没有屋顶房子，难以抵御变化无常的风云雷电，这是一个真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在大战中，空中军事力量执行的基本是争夺制空权，支援陆、海军作战，防空、战略轰炸和空中侦察五大任务。此外，还用于遂行空运、空降、通信联络、指示目标等多种任务。空中力量除与陆、海军协同遂行合同作战任务外，空中作战样式有了很大发展。战争初期德国的闪击战、不列颠之战中的英国空军的本土防空作战、日本偷袭珍珠港、斯大林格勒反攻中的空中封锁、库班空中交战、库尔斯克会战中的空中作战、美英对德国的战略轰炸及美国对日本战略轰炸等作战活动都充分显示了空中力量的战斗威力。

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在世界各国加强构筑空中蓝图时，中国共产党必需尽快地拥有强大的空军，牢牢掌握制空权。于是他们开始了蓝色的畅想，把目光投向浩瀚的天宇。

2 天上掉馅饼，第一架飞机“列宁号”。独闯虎穴，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厉害千万倍的东西。陈云献计，毛主席说正合我意，面对挑百选的人群，陈云说，“你们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

“拥有强大的空军，牢牢掌握制空权。”仅 14 个字，要真正实现这个蓝图，谈何容易，首先是没有飞机，那个时期不要说红军，即便国民党政府也没有能力自己造飞机，然而奇迹出现了。那是 1930 年春，喜讯从鄂豫皖边区传来：红军缴获了第一架飞机。这是一架国民党空军的美制“柯塞”式飞机。该机由武汉飞往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宣化店西南 10 公里陈家河的河滩上。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列宁号”的飞机。

这架飞机被转移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修复后油漆一新，两测机翼下方各绘一颗红五星。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在机身侧面工整写上“列宁”二字。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于是，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航空局在驻地新集修建了一个占地 100 多亩的机场，同时湖北黄安、麻城交界的紫云区，安徽、湖北两省交界的英县金家寨，备修建一个机场以备“列宁”号起降之用。苏区在新集、紫云、英山又修建了三处简易机场。这几处 6 机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自己动手建设的航空设施。

有了自己的飞机，没油怎么办？俗话说，好事自然来。1931 年 3 月，红四军在双桥镇战斗中捉了国民党第 34 师师长岳维峻，他的亲属托人与共产党联系，愿出几万银元赎他。徐向前总指挥一击掌，说：“好！告诉他，只要能搞来汽油，我们就可以保全岳维峻的性命”。

岳维峻的女婿忙不迭地往返于苏区和汉口之间，乖乖运来了大量的汽油和军需品。

飞机加了汽油，犹如猛虎插上翅膀，大家企盼已久的“列宁号”起飞为时不晚了。

7 月，天空刚刚降过大雨，瓦蓝瓦蓝的天空一望无际。在简易停机坪上，“列宁号”在众人的目视下，一阵轰鸣之后，徐徐离开跑道，瞬间，直上云天。地面上人们惊喜地欢呼着，欢呼这具有划时代的首航。于是在皖南大地上到处流传着“神鸟”的故事。

同年 8 月 9 日傍晚，为配合红军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列宁号”再次从新集起飞，前往华中重镇武汉上空进行侦察。散发传单。红军的飞机临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下令对重要目标实行灯火管制，一时间，灯光透明的大武汉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列宁号”的出现，令敌人胆寒，某部作战日记上这样记载着“列宁号”的悲壮履历：

1931 年 11 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鄂东北七里坪成立。半个月后南下围攻黄安。国民党第 69 师师长赵冠英率领万余人固守待援。红军攻黄安一月未克，决定派“列宁号”参战。12 月中旬一天，“列宁号”加装了炸弹架，将迫击炮弹捆绑起来挂在飞机上作炸弹，轰炸敌方指挥所，黄守军待援无望，又遭到飞机的轰炸，军心更加运摇。赵冠英惊慌中率部弃城逃跑。红军乘胜追击，生俘赵冠英以下 5000 余人，缴枪 5000 余支，黄安城遂

7告解放。1932年7月，蒋介石纠集30余万军队，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围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列宁号”飞机无法转移，只好将其拆埋入大别山中。驾驶员龙文光于1932年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列宁号”在战火中去了，然而，“摩斯”式飞机又降临在红军的阵地上。那是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第11师33团攻占龙岩，歼灭福建军阀张贞部一个多团。由于红军行动神速，敌方尚不知龙岩失守，仍派飞机去龙岩联络。当该机飞经33团宿营地上空时，副团长陈冬生架起枪打了一梭子，飞机摇摇晃晃地飞走了。红军打下漳州后，听当地老百姓说，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被红军击伤，飞行员由于失血过多，飞机停在机场上。陈冬生闻讯，带着一班战士赶到机场，缴获了这架“摩斯”式通信教练机。这时，红一军团正准备在漳州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到机场察看了飞机，指示供给部迅速把飞机修好。“五一”召开庆祝大会时，由一名学过飞行的人驾驶这架飞机，在漳州上空撒传单，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中央苏区得知红军一军团在漳州缴获飞机的消息以后，特意在瑞金坪修建一个机场，并将缴获的飞机由漳州移到瑞金。后来虽然这架飞机也废弃了，但在我军航空史上毕竟有它一笔。

历史是无情的，但又是无情的。共产党人多么盼望能有自己的空军和飞机啊！抗日战争爆发，为我们带来转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国共放弃前怨经过六次谈判，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战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扩建培养了飞行和机务人员，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没有设立办事处，陈云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他从中国革命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从红军中选一批人，送到盛世才办的航空训练班学习。陈云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达成了为中国共产党培训航空人员的协议。

延水河畔的摩托学校里，集合了40多名精壮学员，准备进行选飞体检。

美国医生马海德一手握拳，一手攥一块手表，前后左右一伸，谁把手表的位置全部指对了，谁的听力合格。查平衡机能，用的倒是自动化，可比不自动的办法更土。马海德让学员原地转圈，等弄不清转了多少圈时，一声令下突然停止，立即回答是什么方向。

为了应付盛世才招生简章上要求学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要求，教员让大家写几个字，回答几个问题，然后就填“初中毕业”，可到了陈云那里，要求就严了。他不但找学员谈话测试反应能力，让学员读报考查文化程度和视力，还用下棋的办法测试思维判断力。这一招弄得学员叫苦不迭。陈云却开导大家说：“别紧张嘛。在苏联我问过一个空军飞机机械师，文化低的人能不能掌握航空技术？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只要不是石头，就能学会。你们这些同志都不是石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还怕学不会吗？过去你们会打仗吗？会做政治工作吗？现在呢？不是都会嘛。记着不会的东西学会了，那才叫本事……”

1938年3月3日，新疆航空队举行开学典礼。43名学员分成两个班，25名学飞行，18名学习机械维护。

从这一天起，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支航空队伍。

一位当年担任航空教员的老兵说：“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正式开课，经过一段共同的航空理论知识学习后，飞行班和机械班分开进行专业训练。飞行班从1938年4月8日开飞，到1942年4月毕业，先后飞过苏制乌—2双翼初教教练机、埃及5双翼侦察轰炸机、伊15双翼歼击机和伊16单翼歼击机等四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9作战水平。机械班经过1年半的学习和实习锻炼，于1939年9月毕业，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这些学员到飞行班毕业时已熟练地掌握上述几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这些在新疆学习航空知识的人员，首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的关怀。

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摔伤的胳膊途经迪化时，还特意接见了学员吕黎平和严振刚。对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去航空队看望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位代表，请你们转达。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们学习情况，当他听说大家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已能操纵、维护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次年2月，周恩来伤愈回国路过迪化，又接见了吕黎平和机械班负责人朱火华，再次勉励他们说：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很差，体质明显下降。接替邓发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经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请示，确定从新疆的共产党组织历年来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他们的伙食补助。这是一种少有特殊照顾。面对党和上级的关怀，哪一个人不为之动情呢！10

3 延安创办工程学校，共产党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

正当这批航空学员深怀远大理想之时，却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磨难。

1942年春，德国侵略者深入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困难时期，蒋介石加紧拉拢盛世才，给了盛世才国民党中央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等头衔。曾经高唱亲苏联共调子的盛世才，此时公然撕下伪装转向亲蒋反共。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突然把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工作、学习和从苏联归来路过新疆的人员先是先几处软禁起来，后又将他们投入监狱施行残酷折磨。他们不愧为在艰苦环境中磨练出来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身陷囹圄，但不忘飞行技术，在寒冷的囚室里，徒手模拟飞行，以待日后创建人民空军显身手。

在那漆黑的漫长之夜，党中央几经伸出大手，多方设法营救，并情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但均无效果。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与国民党政府达成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并正式写入《双十协定》。1945年冬，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的身份，亲自访问国民党政府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市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张治中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他的代表到狱中对大家进行慰问，并发给伙食补贴，改善生活待遇，然后三次致电蒋介石，提出11放人。经张治中向蒋介石再三督促，这批关押3年零9个月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释放。为保证返回延安的安全，张治中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车辆，并委托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一路护送。7月11日顺利地回到延安。

这一天，整个延安沸腾了，为了欢迎这批共产党人，延安党政军民隆重集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接见了从新疆航空队归来的全体人员，关照他们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以迎接新的任务。回来了，这批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航空骨干力量终于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

1938年前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益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布置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共产党员报考国民党空军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自己培养航空人才。还通过地下党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的航校和工厂的进步青年航空技术人员投身到革命队伍中来，在历史的扉页上，我们应当记住他们的名字：梁帮和、吴恺、魏坚、张开帙、杨劲夫、郭佩珊、熊焰、徐昌裕、顾光旭等人。他们是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在我军空军最早成长发育的道路上，记载着许多曲折、复杂的细节，它们向人们展示了空军之初的真实情景：

1940年4月，王弼、常乾坤向中共中央提出在延安成立航空学校的建议。毛泽东加以肯定，并对他们寄予很大期望。1941年1月，中央军委作出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筹备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选调了100多名学员，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

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为政治委员，常

乾坤为教务主任。3月10日，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县正式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先学数学、物理，提高文化，尔后学习航空理论。……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12学校改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3分校，后来抗大3分校又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编为军事学院第3大队。他们除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

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随之撤销。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了航空组，担负有关航空方面的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由王弼任组长，常乾坤任副组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曾经接受了张北、灵丘两个机场和张家口的两个机场，还有两架飞机和一批航空器材、油料。9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王弼任站长，下设场务科修理厂，管理张家口市郊的两个机场，负责保管飞机、器材和油料，保障来往飞机起降。后因形势恶化，国民党军队逼进张家口，航空站于1946年10月奉命将飞机、器材、油料和其他物资运走向，撤离张家口，其使命亦随之结束。

4 “九九”式飞机首开驾机起义的先例，毛泽东握着刘善本的手说：“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谁都不会忘记，在中国革命处于转折关头，有一批仁人志士，投向光明、壮大我空军力量的史诗般的举措。

镜头之一：1945年8月20日，汪精卫伪政权的1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黄哲夫等人驾驶，少尉飞行员管序东、空勤机械士沈时槐、黄文星等3人随同，从江苏扬州机场起义飞抵延安。周致和等人起义后，受到朱德、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人的热情接见和欢迎。参予这次起义的还有汪伪空军航空处主任白景丰少将、汪伪空军参赞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士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他们由共产党地下组织指引，携带眷属从陆路抵达解放区。这架飞机是日本政府送给汪伪空军“国府专机班”使用的，被命名为“建国”号。它是第一架由敌人营垒起义飞往延安的飞机。因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所以后来被称为820号。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敌对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引起很大震动。

镜头之二：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上尉飞行员刘善本，毅然驾驶刚从美国接收过来的B-24型轰炸机1架从成都飞抵延安，同机起义的有副驾驶员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信士唐玉文等人。这是国民党空军第一起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出一则大幅标题——

《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安号召空军拒运军火，拒炸同胞》。消息传开，平日冷冷清清且没有起降过几架飞机的延安机场热闹得像赶集一般。刘善本带过来的那架美制B-24重型轰炸机，简直成了延安的一大名胜。

中共中央的，八路军总部的，还有延安各界的头头脑脑，一个接一个，一拨接一拨地看飞机。方圆十几里，甚至上百里的干部、军人、姑娘、小伙子、婆姨、老汉……像正月十五闹花灯一样鱼贯不歇，在延安机场排起几天不散的长队。

这时的刘善本精神饱满，他和机组人员自然成了讲解员，无论是总司令，还是老百姓，他们有问必答，嗓子都哑了，心里却冲撞着一阵阵的热浪。

14

人们望着刘善本和他的伙伴们激动的样子，脑海又闪回到那个不同凡响的日子——1946年6月26日。

那天，乌云低垂，好似一场暴风骤雨就要来临。已经接到任蒋介石专机——美龄号机长调令的刘善本，驾驶B-24轰炸机从新津飞往昆明。这或许是他作为第八大队飞行参谋执行的最后一次普通任务，也是他应该作出重大抉择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前一天，他趁从昆明起飞运送一批通讯器材的机会，做好一切准备，决心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直飞延安，却因天气恶劣而没有成功。无奈飞机落在新津，当大批珍贵的通讯器材被一车车运走，他懊恼透了，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愤懑。

新津的夜，来得很迟，窗外哗哗地降着倾盆大雨，雨声中，刘善本难以入睡。

《华西日报》的新闻映入他的眼帘：

——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

——上海各界举行反对内战大游行；

——和平请愿代表在南京车站遭特务毒打；

千里之外的浪潮汹涌着他的心。

翌日，B—24 顶着漫天的乌云，再一次起飞了。

刘善本高高的身躯坐在驾驶椅上，自如地操纵飞机穿云上升，那张端庄英俊的脸显得非常沉稳，肃穆之下却掩饰着万丈狂澜。

机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刘善本早已定下的决心。为了避免惊动他人，也为了自己再次考虑一下此行的全部构思，他把罗盘航暂指昆明，又调好自动驾驶仪，让飞机平稳地飞着。

在云涛雪海中航行，刘善本突然觉得它很像自己以往走过的路，飘摇跌宕，纷乱迷茫……

20 岁那年，他怀着“航空救国”的一腔热血，投笔从戎，考入笕桥航校，然而抗战八年，他却一直没有接到一次作战任务。1943 年春，他随着第八大队前往美国学习 B—29 轰炸机驾驶，本想在对日的最后一战中大显身手，但等待他的是又一次失望：机群从美国飞回，被扣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待命，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准许启程回国，他的报国之心，无法实现。

困顿、失落，刘善本深感救国有志，报国无门。更令他忿懑的是回国后，已经和平了，抗战胜利了，他却接到一次又一次起飞命令，执行的任务竟是运送准备内战、消灭共产党的军用物资！他终于明白了，当初把他们阻在国门门外，不让回国抗日的所谓“留作建国用”的方针，原来是为了挑起内战，把中国再次推入深渊！

此时，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到上海机场的八大队“训话”句句响在耳边：“我们有 40 个美式机械化师，有美国给的几百架作战飞机，3 个月内一定可以消灭共产党。”

刘善本听着，拳头攥出了汗。

回寓所的途中，他经过四川北路的三民书店，想买本杂志翻翻，排解一下胸中的郁闷。突然，他发现书架上有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论》，翻开第一个标题——《中国向何处去？》，他的心震撼了，当即买下带回家中，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中国向何处去？毛泽东指点出一条光辉灿烂的路。刘善本该向何处去？忽然延安这个名字跳到他的眼前，砰击他的心，到延安去！为了反对内战，为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到延安去！那才是最理想的去所！

刘善本从回忆中回到现实，他微微合眼定了一下神，缓缓从驾驶椅上站起身，独自穿过炸弹舱，走进后舱里。

关于刘善本驾机起义的事实，在一本书里做了生动的描写：

后舱甲板上横竖歪躺着 6 个人，是通讯学校毕业生，搭便机回昆明。刘善本扫视了他们一眼，威严地虎着脸对他们说：“诸位，我宣布一件事。本机组为反对内战一致决定飞往延安。到达目的地后，你们或走或留，悉听尊便，安全由本人负责。现在，务请 16 诸位老实坐着，不得擅离一步。否则，”……他停顿片刻，转动了一下手枪：“休怪本机组的手枪不客气。”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6名搭乘人员呆若木鸡，一下子被慑服

刘善本心中有了底，重新返回驾驶舱，关紧舱门，飞机在云海里掉转180度，完成了重大的转折，罗盘航向直指延安。

一个多小时的航行，几乎全在云里雾里，快到延安时，前方突然出现一个云洞，刘善本一推机头，冲了下去。

巨大的B-24绕宝塔山盘旋一周，而后庄重地对准跑道，降落在坚实的大地上。

当天下午，八路军秘书长杨尚昆看望了刘善本和机组成员。听了刘善本报告飞来延安的前后经过，杨尚昆笑得眯起眼睛，连声说：“欢迎，欢迎，你们做得对！有一个情况，你们还不知道。今天上午，就在你们飞来延安的途中，蒋介石公然撕毁停战协议，调动30万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他们如意算盘是3个月消灭共产党，可他没想到算盘刚刚拨动，你们几个算盘珠子就跑到共产党这边来啦。哈哈……这真是——蒋公妙计夺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哟！”

刘善本被杨尚昆风趣、轻松的语言逗笑了，他从中体味到了共产党的自信与力量，同时也感到内心的不平静。蒋介石发动内战，这是他早已估计到的，正是基于这点他才毅然飞往延安。但他没有想到历史会有这般惊人的巧合，竟把他的起义与内战全面爆发的日子安排在一起，戏剧性地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6月29日，延安举行晚会，欢迎刘善本机组。灯火通明的中央大礼堂门前，并排站着中国共产党的三位巨人，身穿土布补丁衣服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

毛泽东伸出大手，微笑着：“欢迎你们到延安来！”

一时间，刘善本的脑子里出现空白，事先准备的许多话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抓住毛泽东的手摇了半天，泪水才和声音一起迸出：“毛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

一条长长的板凳，坐着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也坐着刘善本和他的机组成员，自愿留在延安的张受益、唐世耀、唐文玉。彼此一律平等，都是普通观众。

开演前，毛泽东对刘善本说：“今天晚上，本来是要演平剧《逼上梁山》的，因为蒋介石打内战，我是被逼上梁山的，你们也是逼上梁山的，可是剧组却在外面赶不回梁山了。只好演些小节目。”

毛泽东回过头问后排的人：“是什么小节目呀？”

后排的人回答：“有秧歌剧《兄妹开荒》。”

“哦。好。好。”毛泽东继续他的随意说笑：“《兄妹开荒》也好么。上得梁山，就要开荒，先开一片新地，再开一片新天。天上开荒，要靠你们这些飞将了。”

刘善本立刻提出：“主席，我有两个要求。”

毛泽东认真地一挥手：“且说无妨。”

“第一，我想尽快向国民党官兵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反对内战。第二，请主席尽快给我们分配工作。”

毛泽东听完，关切地用手指了指舞台的大幕：“你们飞来延安，亲属还在那一边，我的意见，不要着急，还是等那里的党组织把他们安置妥当，再发消息。至于工作，当然请你们四位继续搞飞行这一行。不过，那是要挨冻、

受苦的，你们怕不怕呀？”

刘善本立即说：“不怕。主席，怕我们就不来延安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连声说了几声好。

大幕拉开了。

毛泽东带头鼓起掌来。18 第二章 艰难航程

1 审时度势，筹建空军摇篮。战俘林弥一郎和日本航空大队全部归降，东北老航校中的日本人。

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刺耳的炮声、枪声停止了，笼罩在华夏天空的战争乌云渐渐散去，广阔的中华大地上又繁忙起耕种的人群。这一天，近似神圣和美好，电波从大洋彼岸飞越惊涛，穿越云层，传到古老的城镇和乡村，传到战场上的每一个战壕和阵地：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投降诏书。它庄严地正告全世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很快，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杨尚昆等中央19首长接见了王弼、常乾坤等人，把建立航校的任务交给了他们。王弼、常乾坤静静地听着各位首长的讲话，从中寻找智慧和办法。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记录下中央首长这样的指示：“在东北创办航校是党和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开端，是为建立人民空军做准备，无论如何要把它办好。”刘少奇、任弼时还亲自给他们交代了任务和注意事项。刘少奇说：“东北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主要基地，估计该地航空器材很多。这是着手兴办航空事业的一个有利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航空人员去东北，先摸清航空方面的情况，接收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校做准备。”任弼时说：“中共中央决定派干部去东北，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的是给将来的人民空军建设培养一些种子。”

此时，在王、常的心灵上，已勾画出航校的蓝图。王弼、常乾坤两人带领30多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军人，告别了宝塔山，日夜兼程奔赴东北。1946年1月，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接见了他们，要求他们尽快赶到吉林通化，抓紧筹建航校，注意争取日、伪航空技术人员，埋头苦干，培养干部，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散落的航空器材收集起来。于是，王弼带领魏坚等人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往通化、东安等地。

半年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东北三省的30多个城市、50多个机场。

共搜集到各种日式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多台，油料2万多桶，航空仪表数百箱和各种机床设备等航空军用设备2800多马车。

当人们喜不自禁的望着摆在广场上的各种飞机和零部件时，心中也充满了辛酸。就是为了搜集航材，有的同志误入日本细菌部队的试验室，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脸麻了，落下终身残疾。有的人在搜集途中惨遭敌人毒手，有的人在转运器材时轧断

20了双腿甚至牺牲。

在战争的废墟上，创建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航校，谈何容易！然而，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他们的行动。那时的东北，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日军拆毁，仅有的几根钢轨东歪西扭的躺在那里，根本运输不了什么东西。偶尔有完整的地段也只有几百米或几里路远。火车不能运，他们就肩扛马拉，有时途中遭到土匪、特务的袭击，便不得不停下来作战。他们的行动吸引了不少老百姓，这些饱受日军摧残的平民百姓，往日只有钻山洞，跑敌情的份，哪有看景致的心情呢！今天不同了，有的听说共产党找飞机用来打国民党，就凑上来说：“同志，俺家有三个汽油桶，一副胶皮轮子，你们拿去。”当地政府也组织民工队、马车队，支援航校。1946年3月1日，航校在通化成立，对外番号是“三一”部队，老百姓听不真切，又见拉的都

是破烂飞机，零七碎八的东西，就称他们是“垃圾”部队。

这支“垃圾”部队在转运途中像一支宣传队，沿途发动群众，又搜集和买到散落在老百姓家中的一些宝贵航材。在小火车能够开通的地段，他们把这些“垃圾”装上小火车，小火车马力不足，翻越山坡的时候，全体人员推着火车前进。常乾坤风趣地说：“人推火车，马拉飞机，写到空军史也是一大奇观。”

“三一”部队不仅搜集航空器材，还收编航空人员。

在一本描写这段历史的书上，这样记录着这件传奇色彩的事情：

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侵华日军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大队由队长林弥一郎带领，遗弃飞机和机场设施向南奔逃，打算以日本难民的身份回国。当他们被和平缴械后，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了解到这是一支航空部队，便把带队的林弥一郎召到沈阳，提出请他们参加筹建航校工作，帮助共产党训练飞行人员。²¹

作为俘虏，这是林弥一郎决没想到的。他沉吟良久，怀疑一支俘虏部队能否对战胜国的军人进行培养飞行员的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求严格，可是一个俘虏能对共产党的官兵发号施令吗？再者，培养飞行员不是一两个月所能完成的，而他的急迫愿望是归国还乡，返回自己的祖国。

彭真十分恳切地说：“林弥一郎教员，你如果感到一时难以应诺，可以和部下商量后再决定。”

林弥一郎听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称他为教员，又是大吃一惊。告别的时候，伍修权发觉林弥一郎几次注意他腰间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便从腰间取出，放在林弥一郎手中，说：“这支手枪伴我参加了万里长征，它保护过我，是一支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手枪，现在我把它赠给先生。”

不久前被缴了械的林弥一郎紧握着那支手枪，注视着伍修权诚挚温厚的目光，他的心一下子热了。作为战败国的军队，如果令其与中国方面协作，只要用枪口对准他，单凭武力就可以办到，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是如此以礼相待，他还能说什么。

返回时，林弥一郎几乎忘了自己俘虏的身份，他登上去沈阳的一辆军用卡车，发现副驾驶位上坐着一个人，就一挥手，说了声：“让开！”把那个人赶出来，自己坐了上去。那人显得莫名其妙的表情，默不作声地上了车后厢。后来负责护卫的战士说出那人的姓名，林弥一郎又吃了一惊，那人正是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吕正操。

一件件事情的发生，林弥一郎感到过去在他头脑中形成的对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像“揭下一张纸一样地”发生变化。

林弥一郎说服了他们的部下，同意帮助中国共产党创建空军。于是“三一”部队收编了这支近300名航空技术人员的部队。

后来，中共东北局决定将这个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22航空队，任命蔡云翔为航空队队长，刘风为副队长，黄乃一为政治委员。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后来在东北老航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国民党空军大出动。萌芽中的航校举步艰难，逆境生存，共产党人打破了航空史上的规律。别出心裁，飞行员独辟新境，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表。

抗战结束，内战风云又起。

正当航校准备开始飞行训练之时，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大举进攻，侵占了沈阳、辽阳、铁岭，直逼四平，形势骤然恶化。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频繁地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东总”决定通化地区所有军事学校立即向北转移。航校即于1946年4月全部转移到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

这里虽地处后方，但条件很差。摆在大家面前的是：机场里设施破烂不堪，跑道上散布着许多炸弹坑，营房只是个空架子。这些曾穿越敌人炮火的男子汉们，扬起眉头，抡起手臂，很快清除了残破的机窝，填平了跑道。修整了营房和教室，建设了必要的设施，新的航校里，又响起了高亢的歌声。

为了迅速培养一批教学骨干，航校将过去学过飞行的刘风、吴恺、魏坚等10人首先组织起来，由留用的日本人和起义人员担任教官，加强训练，以便充任教员。同时根据飞机、器材情况，将

23 延安来的一部分和现有的学员编成两个飞行班，一个机械班。飞行一期甲班12人，乙班31人，机械班40人，在飞行教员训练班进行飞行训练的同时，对这批学员进行了基础理论教育。航校初建，即无成熟的教员队伍，又无现成的教材。为了适应教学需要，航校组织全校所有懂得航空理论和技术、能够担任教学工作的干部，边学习提高，边编写教材，边进行教学。学员文化程度低，学理论有困难，教员们就把一些不能使用的器材、发动机和报废的飞机搬到教室来，进行形象化教学。建设人民空军的急切愿望和迅速掌握航空技术的坚强决心，激发起这些工农出身的战士废寝忘食的学习热情。他们从早到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在学习上。熄灯号早吹过了，有些人还留在教室里，围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埋头自修。经过一段突击学习，他们终于克服了文化程度低等困难，基本上掌握了与飞行有关的基础知识。飞行一期甲班学员开始飞行训练。按照世界各国通常组织飞行训练的方法，首先要飞初级教练机。然后才能飞中级教练机和高级教练机，当时航校只有4架破旧不堪的“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但是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还能继续使用。面对这种情况，航校领导提出大胆的想法：能不能打破常规，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这个想法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反对说：“这在航空史上未见过，是违反科学的！”也有人担心地说：“一开始就飞高级教练机，是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学员们则普遍拥护这一措施，他们说：“人民希望我们早日飞出来，战友们盼望我们早些飞到前线去和他们共同作战，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就敢闯出一条上天的路来！”航校领导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发动群众摆问题、想办法。针对“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行速度较快、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刹车系统陈旧、飞机在飞起和着陆时方向不好保持、易打转等情况，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加强地面准备、反复进行座舱练习、着重24重训练掌握起飞着陆要领、严格考核制度、直到确有把握才放单飞等等。经过反复研究、试验，终于闯出了一条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的路子。

飞行训练又出现了新矛盾，汽油一天天消耗，库存越来越少，又无别的

来源，全校上下都为之焦急。怎么解决呢？他们查到日本投降前，因海上运汽油的船只被美军炸沉和封锁，一度被迫改用无水酒精代替汽油。他们对酒精的比例、燃点、燃速和能量进行分析比较，对使用酒精作燃料，飞行燃料系统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一一作了细致的讨论。经过多次地面试验表明，由于酒精的燃点、燃速和能量与汽油不同，为保证发动机输出功率能满足飞机起飞的需要，酒精的纯度低于95%，气化器喷嘴的口径、进气和排气阀的间隙，点火的时机，都要作适当的地面调整。他们按照试验所得的数据，精确地调整了有关部件，地面试车和空中试飞都获得成功。

时局更加紧张，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侦察、扫射，航校乃于1946年11月迁到兴凯湖畔的东安。但还是摆脱不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袭扰，为了躲过国民党空军飞机的袭击时间，他们在上午10点前和下午4点后分两班，坚持进行飞行训练。

抗日战争期间在新疆学习航空技术的人员由延安来到东安。他们参加了教官训练班，掌握日式飞机技术后，充实到航校下属的各级领导岗位，方子翼、夏伯勋、袁彬、吕黎平、张毅、刘忠惠、方华、方槐、安志敏、赵群、胡子昆、黎明、李奎等人担任了飞行教员。教学力量增强了，飞行一期一班也开始了飞行训练。航校的训练全面铺开。

训练课目由简到繁，困难接踵而来。在飞行编队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互相通话联络，只能用晃动飞机机翼的办法互相示意。在飞行转场课目时，飞机上没有计时表，有的学员只好把教室里的闹钟绑在腿上，有人打趣地说：“嗨！好大的航空25腿表啊！”没有航行地图，学员们只能对照普通地图描绘航行图。长途转场飞行，没有航行调度，没有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没有准确的天气预报，弄不好就会迷航，他们硬是用沙盘作业的办法，把方圆一二百公里飞行区域的城镇、山峰、河流、桥梁等地标成实物，印在脑子里，变成活地图，保证转场飞行任务的圆满完成。

频繁的转场，紧张的训练，使本来就陈旧的飞机、器材更加陈旧不堪。地勤人员便夜以继日加强对飞机的维护和保养，想方设法延长飞机的使用寿命，保证飞行安全。飞机的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赶紧拆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去，把一副轮胎和螺旋桨当成几副用。

当时前方正在打仗，后方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学员们没有棉衣，就自己动手用面袋来缝制；供不上细粮和蔬菜，空勤人员就吃高粱米，啃窝窝头，就咸菜疙瘩下饭。为了保证大家身体健康，航校领导发动群众，开荒种菜、养猪、磨豆腐，改善生活。他们就是这样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保证了飞行训练的实施。

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3月航校又搬到长春。环境比较安定了。条件有了改善，训练规模和开设期班也随之扩大，继飞行教员班、飞行一期一班和一、二期机械班毕业之后，又开设了二、三期飞行班、三、四期机械班，还创办了领航班、场站班、通信班、气象班、仪表班，在校学员达320余名。5月，这所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0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人才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后来建设人民空军的骨干。人们亲切地称呼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它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我军最初的飞行员及航空干部都是从此迈开雄壮的步伐的。26

第三章 绘画蓝图

1 毛泽东望着蓝天在心中描绘蓝图。紧锣密鼓“中国”、“中央”航空公司起义。

历史的车轮行进在浓烟迷雾中，华夏的天空透出一线瓦蓝。1948年底，当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我军统帅部的会议室里，铺开的作战地图上标示出这样的情景：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战线已经崩溃，东北的敌军被全部消灭，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处于我军的团团包围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已濒临绝境。但是，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仍纠集残部，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²⁷

1949年的春天来得早了些，当东北大地还寒气袭人的时候，地处冀西的西柏坡已是山花遍野了。伴随着春风传来毛泽东的指示：立即通知常乾坤、王弼来冀面谈。毛泽东召见这么急，这么突然，使常、王二人心里忐忑不安。

西柏坡。3月8日的晚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全部到齐，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位领导表情上均显得有些亢奋。

原来，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专门研究令人神往的问题——如何建设空军？

共产党28年的历史上，专题研究空军的会议，这是首次。

毛泽东被常乾坤和王弼的汇报深深吸引，听得非常入神，随着汇报人的手势，毛泽东已勾画出空军的未来。

东北老航校所走过的艰苦而悲壮的历程，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百感交集。

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经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名，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毛泽东忘情地站了起来：“了不起！了不起！”

周恩来兴奋得剑眉飞扬：“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

陈毅幽默地一挥手，“诸位老总，你们莫跟我抢，这空军司令，我是当定！”

贺龙爽快地说：“你当司令，我给你当政委。”

这时会议里显现出异常活跃的气氛，常乾坤、王弼被老总逗笑了，神经渐渐松弛。

毛泽东望着常乾坤：“你们现在的飞机，有没有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

常乾坤回答，“现在的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

毛泽东笑着说：“等以后吧，以后我只坐你们开的飞机。”²⁸

朱总司令忙插话说：“常乾坤同志，我也算一个哟！”

9天后，1949年3月17日，党中央作出成立中央军委航空局的决定。并任命常乾坤为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3月30日，中央军委航空局正式宣告成立。

资料卡之一：航空局的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同时，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技术队伍，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军委航空局成立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立即从东北航校抽调干部组成3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

和接纳航空技术人员，在此之前，东北航校曾奉东北军区命令，派接收组随第四野战军部队进关，负责华北地区的航空器材接收工作。在各军区的直接领导下，从1949年3月至7月间，各航空接收组先后在北平、济南、南昌、长沙、汉口、上海、西安等地设立了航空办事处，在天津、徐州、青岛、杭州、南京、太原、张家口等地设立了航空站。随着航空业务的增多，为使一个地区的航空工作由所在军区统一实施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以军委航空局和东北航校派赴各地的接收组为基础，由各军区调配部分干部，于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先后组建华北、中南、华东、西北、东北、西南军区航空处。

资料卡之二：军委航空局、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及其下属机构成立后各项航空业务工作迅速展开。

接管航空器材、设备，接纳起义和报到的航空技术人员。到1949年10月，共接收飞机113架，飞机发动机1278台，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各种炸弹7.4万颗，枪炮弹5.8万余发。在军委航空局成立后，由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接管华北、华东、华中的工厂20所，其中包括飞机修理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降落伞厂、通信器材厂等。接管华北、华东、西北地区的一批机场，

29 接纳国民党空军起义和报到参加工作的航空技术人员共2266名，其中1949年10月底以前驾机起义的共25架次73人。

资料卡之三：开辟空中航线，恢复航空工厂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经过各级航空人员的努力，在各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到1949年10月底，各地已恢复机场40个，先后开通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的赤塔，北京——太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之间的空中运输线，解决了当时地面交通困难条件下的紧急空运之需。接收的航空工厂经过短期整顿后，大部分已经开工，承担了修理飞机和制造零件的任务。

资料卡之四：加速航校训练，大力培养航空人才。1949年3月，东北航校部移驻长春，规模已发展到3500余人。4月，第一、二大队4个期班开始飞行训练，第三大队机械三、四班混合大队进行航空理论教育，第四大队由原国民党空军人员组成，进行政治教育。到9月30日止，第一大队50名飞行员已有半数可担当任务，第二大队61名飞行学员初步掌握了日式教练机驾驶技术。进入战斗机、轰炸机训练；第三大队和混合大队的机械、场站、气象、通信等学员全部毕业；第四大队也完成了教育计划。在此期间，航校曾派大批干部参加各地接收航空器材和收编旧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为早日建立人民空军准备条件。

资料卡之五：保障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起义工作顺利进行。指定天津、青岛、石家庄、徐州、济南、潍县机场为主要着陆场，上海、南京、武汉等机场为备降场，各沿途机场做好陆空联络和后勤保障，使“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12架运输机由香港顺利抵达京津两地。

资料卡之六：制定空军机徽、军徽。各地接收缴获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日益增多后，为统一标志，军委航空局组织人员精心设

30 计了人民空军机徽和军徽，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于1949年10月1日实行。机徽是在“八一”军徽两边衬以镶金黄色边沿的红带。空军军徽是在“八一”军徽两边衬以鹰的两翼，象征人民空军英勇果敢，翱翔无阻，肩负起捍

卫祖国领空的重任。

建设空军的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关注的问题。这里有一封毛泽东于 1949 年 7 月 10 日，写给周恩来的信，信中对建设空军做了十分详细的计划。他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 6 个月至 8 个月，同时购买飞机 100 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

同样的思想还表现在 1949 年 7 月 26 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电报中，“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成熟，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

而在 1949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郑重向全世界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这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揭开了空军建设的序幕……

2 周恩来关注，南苑机场上首次出现了担负要地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

栖身在上海滩的蒋介石连日来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使他如丧考妣，痛心疾首。他忧愤、暴躁、焦灼，一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滴水未进，任何人不见，包括宋美龄。他神经质地踱步，什么都不顺眼，不知摔了多少可以摔和不能摔的东西。他需要宣泄，他需要雪此奇耻大辱。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力加傅作义的明智之举，北京和平解放了。

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里，住惯了窑洞的毛泽东毫无睡意，他站在窗前，透过玻璃眺望云天，胸中卷起层层波澜。进京后的谋划在袭扰着他。

5月4日，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秘书送来这样的通报：6架美制B—24轰炸机从蒋介石栖身的上海，直飞北平。8时57分，6架飞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轰炸，低空投下了30枚重磅炸弹。

蒋介石的举动像催化剂，再次把空军建设的步伐推向前进。

为了确保北平的安全，保证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周恩来面示常乾坤：迅速建立一支空军的作战分队，以加强北平地区的防空。

于是，新中国第一个飞行队在紧急之中诞生。

军委航空局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立即进行研究，并于7月7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组建一个飞行中队，从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燕北航校选调10名飞行员和相应的战斗机，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必要时协助陆、海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为了迅速落实，军委航空局于7月31日至8月8日召开第一次航空工作会议，研究飞行中队的具体编组问题。会议确定组建一个混合飞行中队，其中包括2个战斗机分队、1个轰炸机分队、1个地勤分队；从各军区航空处和东北航校中抽调的飞行和空勤人员，尽快集中到北平。飞行中队建制上属于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作战指挥统一由军委航空局负责。

经过紧张的准备，8月1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建。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第一战斗分队长赵大海，第二战斗机分队长杨墙光，第三轰炸机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闫磊、潭汉洲、刘卓生、王延州、毛履武、王玉珂，任永荣等。地勤分队长刘平凡，地勤人员40余名。飞机共10架，其中P—51型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型教练机2架。为了增强该中队的实力，不久又陆续从东北航校抽调孟进、林虎、刘玉堤、马杰三、阮济舟、吉世堂、徐登坤、矣敦康、李宪刚、李汉、刘跃西、陈亮等13名飞行员和19架飞机，其中17架B—51型战斗机、1架蚊式和1架B—25型轰炸机。同年10月又增编一个空运分队，分队长谢派芬，飞行员有王洪智、于希骏英、王恩泽等，还有领航、通信人员10余人；飞机有2架C—46型、1架C—47型运输机。

第一个飞行中队组建后，经过短期训练，于9月5日正式开始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每日昼夜在南苑机场保持2—4架飞机战斗值班，一声令下可以立即升空作战，这是人民空军建立前，最早担负要地防空任务的飞行中队。他们还担负了空中巡逻、警戒，掩护大沽港的安全，配合地面部队演习，紧急空运物资，接送中央首长等任务。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第一个飞行中队的建立十分关心。9月中旬，朱德总司令在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总参作战部李涛部长、军委航空局常乾坤局长等人陪同下，检阅了飞行中的飞机和机组人员。33

3 怀仁堂里面对吃惊的政协委员，周恩来说：我们的飞机在预演。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挥手致意。朱德说：我今天真正成了三军总司令了。

1949年8月，全国大部分省区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天安门广场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欢庆人民的胜利。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召集驻北平各军事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具体布置开国大典的阅兵工作。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任务下达后，飞行大队的全体官兵激动得彻夜难眠。机群组成分列式，飞越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是何等的光荣啊！

最紧张的还是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受命之后，军委航空局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准备参加受阅。为了万无一失，分工十分精细：这17架飞机，按照机种的不同，组成6个空中分队。空中受阅飞行的总领队，最初由南苑机场飞行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在受阅训练中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决定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本善负责。

从受阅任务下达到真正编队飞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好紧张

34 哪！航空局的领导们聚在一起，掐指计算着，个个心中既兴奋又为此捏了一把汗。

由5种不同机型组成的混合编队，需要周密安排。在队形排列和各分队的间隔上，既要显示出整个编队的完整。壮观，又要保证安全；在飞行高度的选择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以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由于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有空滑到郊外迫降的条件，不致危及人民群众的安全。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必须全力以赴。方案、计划确定后，紧张的训练开始了，先是组织各分队分练，尔后组织4次模拟合练，还进行了两次预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代表们聚集一堂，讨论建国后的国家大事。这时，一阵轰鸣声从头顶掠过，代表们惊奇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周恩来副主席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说，刚才通过上空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担负着保卫政协会议安全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现在正在进行预演。代表们听说人民军队有了自己的飞机，个个都眉飞色舞，心中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这一天，终于降临在中国大地上，来到中国人民的心中，更来到空军健儿的心坎上。

10月1日下午3时，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时刻。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涌动，30万群众翘首企盼。倍受黑暗之苦的中国人，一代接一代的摸索、奋争，才迎来了舒心的今天。空军——这一天之骄子，也伴随国家的新生而降生并壮大起来，谁人不为之感慨万端呢？

历史终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纪元——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伟岸于天安门城楼，以其惊天动地的声音，向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阅兵式威武的步伐中，朱德总司令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命令人

35 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一切残余武装，解放一切未解放的国土。那声音和毛泽东主席的声音在全国震响，更震响在雄鹰展翅的天空里。

下午4时，空军阅兵指挥部接到受阅飞机起飞的命令，17架雄鹰拔地腾飞，先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机群接到分列式开始的命令，受阅机群排列整齐的队形，由东向西飞往天安门。描写空军战史的书上这样记载了这一伟大时刻：西斜的太阳，照射在飞机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首先是9架P—51型战斗机，编为三个“品”字队形，高度920米，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三个战斗机分队分别由邢海帆、杨培光、赵大海率领。紧接着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的第四分队，高度760米，排着“一”字队形飞来，由邓仲卿率领。再后面是3架C—46型运输机组成的第五分队，编成“品”字队形，由刘善本率领。最后由2架PT—19型教练机和1架L—5型联络机组成的第六分队，由方槐率领。17架飞机组成完整的受阅编队。飞在最前面的9架P—51型战斗机通过天安门后，又绕到东郊再一次通过天安门，其编队正好衔接在教练机分队后面，因此，群众看到通过天安门上空的飞机是26架次。

当检阅机群通过天安门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领导人，仰望着飞驰而过的机群、频频挥手致意，露出欢快的笑容。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欢呼雀跃，飞机发动机发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使整个天安门广场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这情景充分体现党和人民对空军的建设、成长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开国大典的当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宴会，宴请受阅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干部和陆、海、空军人员。朱德总司令兴奋他说：“今天我成了真正的三军总司令了！”席间充满了阵阵由衷的笑声……36

第四章 绿鹰呼啸

1 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人民空军。天降大任，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刘亚楼说：我们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

在毛泽东主席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高个子军人，浓眉大眼。体态魁梧，正全神贯注地聆听毛泽东的谈话。他就是即将被任命空军司令的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刘亚楼受中央之命要到莫斯科与苏军会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事宜。临行前，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1949年7月26日。毛泽东电告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空军。

斯大林欣然答应中央的请求。37

当刘少奇从苏联回电要求选派人员赴苏会谈时，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担当此任。

毛泽东边谈话边分析我军的发展形势。他说：“我们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起，就和蒋介石打交道，依靠小米加步枪，历经了长期的战争，我们打赢了，快要打出一个新中国了，全部是靠陆军打的地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万架以上的飞机，现代战争中空军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可是我们呢？既不能制造飞机，也没有汽车工业，当然就谈不上建空军的问题。”

刘亚楼称赞地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我们过去是依靠自力更生战胜蒋介石的，没有向苏联提出过援助空军的问题，即使提了也不一定能给，我们穷嘛！所以一直没开口。今后面临的作战对象，除蒋介石以外，还有美帝国主义，现代战争的样式是地面、空中、海上的立体战。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们仍然单靠陆军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建设三军协同作战的人民解放军。”

“中央认为，现在请苏联援助我们建立空军的条件已经具备，有全国性政权，可以做生意，有偿还能力。我们让现在莫斯科的少奇同志试问了一下，他们答应了。你认为怎样？刘亚楼同志？”

刘亚楼早就做好调查和准备，于是一五一十地向主席做了详尽的汇报。

主席说：“你们这次出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啊！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中央决定，这次到莫斯科去的除了刘亚楼外，还有王弼、吕黎平二位同志。为给他们壮行，毛泽东特意请他们吃晚饭，饭桌上，毛泽东破例让取了瓶葡萄酒，然后亲自给每人斟满一杯，满面春风、举杯祝酒：“亚楼同志，中央指派你们三位同志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38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8月13日，莫斯科以风和日丽的晴朗天气欢迎北京来的客人。

刘少奇率刘亚楼等三人向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驶去。

当刘少奇他们走进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办公室时，朴素、庄严的气氛映入眼帘：会议室的正中挂有列宁、斯大林的并肩肖像。离肖像约3米处横放一张4米长、1米宽的长方形桌子，两端呈工字形摆放两张同样宽度、约5米长的长条桌。桌面上有一支铅笔，一本纸簿。简洁而有序。

华西列夫斯基热情地和刘少奇握手，欢迎中国客人。

华西列夫斯基微笑着对中国同志说：“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

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谈谈建立空军的方案、要求与设想，以便根据你们的意见，定出援助的具体计划。”

刘少奇点点头，并指着刘亚楼说：“我党中央已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党中央谈谈关于组建中国空军的方案与意见。”

在苏联曾吃过8年奶油面包的刘亚楼用流畅的俄语讲述了中共中央有关组建空军的设想。

这既有风度又有口才的中国未来空军司令员显然深得华西列夫斯基的好感与尊敬，他灰色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刘亚楼，仔细听着，并不时地点点头。

王弼做了补充，也是一口标准的俄语。

在座的苏联空军司令维尔希宁元帅问道：“请你们提出第一步训练300—500名飞行员的根据是什么？歼击机轰炸机的比例怎样确定？哪里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毛泽东的原意是派中国飞行员到苏联接受培训，斯大林倾向

39 于派苏联专家和飞行教员到中国实施教练。就这样提出了一个机场的问题，吕黎平作了回答。

华西列夫斯基点点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我们原则同意这一方案。为把援助计划搞得更具体细致，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同志进行一次更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下步会谈和安排有何意见？”

“我同意。元帅同志。”刘少奇说，“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次日，举行第二轮会谈。

气氛随和，会谈内容更加深入、细致。

大约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维尔希宁空军司令说：“你们党中央建立空军的目的是我们已经明白，你们目前的家底也清楚了，你们的愿望也谈过了，我们遵照斯大林元帅的指示，按照昨天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面谕，现在可以告诉中国同志：你们建立空军的方案可以实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实现这一方案的具体援助计划，再过3天即可以拟制出来，届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

身材魁梧、长着鹰钩鼻子的维尔希宁元帅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你们很辛苦，这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4天莫斯科的生活，感到的是友谊、是尊重。

在苏联当过少校参谋的刘亚楼对此感受最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会有国际地位，才有可能被人尊敬。

3天后，8月18日，在中苏第三轮谈判中刘亚楼代表中国方面，维尔希宁代表苏联方面，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从此，中国空军建设，尤如雨后的庄稼，日新月异地成长和健全起来。

资料卡之一：由参谋处长何延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的第

40 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2515人，于8月19日从武汉抵达北京，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17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长。同时，中央军委决

定建立航校。

资料卡之二：对航校地址的选定，确定了四条原则：一是便于争取时间，及早开训；二是节省经费开支，尽可能利用原有的机场设备；三是有较好的气象条件，保证有较多的可飞天气；四是受敌空袭威胁小，有较安全的训练环境。根据这些原则，空军派出专门工作组，会同先期来华的苏联专家一道分赴各地进行考察，提出了航校校址选定方案。1949年10月30日和11月1日先后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审查批准的这6所航校的校址是：第1轰炸航校在哈尔滨，第2轰炸机航校在长春，第1歼击机航校在锦州，第2歼击机航校在沈阳，第3歼击机航校在济南，第4歼击机航校在北京。此外，鉴于东北老航校尚有一批日籍航空技术人员和飞机、器材，经中央军委11月18日批准，在牡丹江再建立一所航校，培训运输机空、地勤人员。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将上述航校依次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至7航空学校。

资料卡之三：对航校校长的人选，经中央军委批准，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为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为刘凤，第3航校校长为陈熙，第4航校校长为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为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为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为魏坚。各航校的政治委员，由于当时空军缺少适合入选，于1949年10月21日报请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中选调。毛泽东主

席批准这个报告，指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认真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要各野战军提出所需人数3倍的名单交中央军委挑选。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共提出了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涛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5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斌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委员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选调来的。

资料卡之四，整修遭受破坏的机场，营房和教室，是建校的又一项紧迫的任务。这一建设工作，得到了东北、华北、山东军区当地党、政机关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个月后，教室、宿舍准备就绪。航校学员及地勤人员，军委领导要求从部队和学校中选调。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经过认真选拔，后经空军全面复查，共接收飞行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980名，这批学员绝大多数为工农出身，经过战斗锻炼，其中不少人是英雄模范人物，具有良好的军政素质。

资料卡之五，中国聘请的苏联专家按照中苏双方的协议，于1949年11月中旬陆续到达各航校。根据中央军委规定，空军对各航校服务的苏联专家均委以顾问职务。如校长顾问、飞行顾问、地勤顾问等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要教学第一线担任飞行教员或航空理论教员。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给予了中国空军真诚的援助。中国向苏联订购的飞机、器材，也于1949年底陆续进口。为了做好这些物资的接收、

转运工作，空军成立了长春后勤分部和满洲里、绥芬河两个办事处。空军的接运人员在铁道、外贸部门干部和职工的全力协助下，顶风冒雪，装车编组，得到地方政府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1949年11月，第3航校的领导干部到锦州时，面对弹坑累累的机场和不足千米的跑道，立即组织干部、战士抢修。人力不足，营房不够，就向当时的中共辽西省委、省人民政府求援。辽西省省长杨易辰表示，为建立空军可相助，要啥给啥。当即把锦州师范学校的校舍让给第3航校作教室和学员宿舍，把省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沙发搬到航校接待苏联专家。同时组织当地驻军和群众赶修机场，在断垣残壁上重新垒起营房。经过一个月的努力，除机场跑道外，急需使用的营房、教室等都简陋地准备就绪。第1航校要在哈尔滨马家沟机场进行飞行训练，但该机场当时已为东北农学院占用。农学院的师生听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动员他们搬迁的来信以后，为新中国即将有自己的空军而欢欣鼓舞，立即行动起来，三天之后即全部迁出，并将房舍打扫干净，迎接航校人员进驻。

资料卡之六：从中央军委1949年10月6日正式批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算起，仅用50天的时间，6所航校即全部筹建完毕。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参加了第6航校的开学典礼。第7航校也于1950年1月5日开学。43

2 “外籍教练”教中国空军在蓝天上写下了弯弯曲曲的象形文字。

新中国空军的诞生，斯大林是有功的。

早在1949年7月，周恩来提出航校第一期学员最好能在1950年9、10月份毕业的要求。同年11月，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航校应在开训后的6个月内速成训练出2个歼击机团和1个轰炸机团所需的空、地勤人员。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归来路过沈阳时，特地召见第4航校校长吕黎平，听取了他的汇报，指示要加速培养空、地勤人员。

尤如春风催柳绿，中央领导同志对空军的成长寄予殷切的希望啊！

为了加速完成训练任务，空军采取应急措施：将原在东北老航校学习，已有一定技术基础的89名飞行学员，20名空中领航学员，分配到各航校组成速成班，进行为期6个月的掌握苏制作战飞机的速成改装训练，同时将东北老航校107名地勤学员和刚从陆军选调来的460名地勤学员，分配到各航校组成地勤学员速成班，进行突击培训。与速成班同时开训的还有一期甲班学员2366名，这批学员全部来自各野战军和各地军政大学等单位，其中空勤学员930名，地勤学员1436名，学制一年。

在航校简陋的教室里，坐着战争硝烟依然染身的学员，他们在战场上可以纵横驰骋，可是在课堂上却摸不着门路，加之苏联教师语言不通，连比划带口说，学员们还是不理解啥意思。为了帮助学员们闯过这一关，空军和航校的领导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一

44 是选调一批过去搞航空技术的人员和新参军的大专学生到航校任教。给每位苏联教员配一名翻译、一名中国助教，形成“三位一体”的教学组，进行集体备课，授课时由苏联教员讲解，翻译当场口译，助教在旁听讲，发现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及时进行纠正或补充。经过一段实践，又改为由苏联教员先帮助中国助教备课，再由助教给学员讲课，苏联教员在场旁听，发现有不妥之处，当场纠正或补充。采用这些方法以后，教学进度加快，学员对所学课程也比较容易接受。二是开展实物教学和形象化教学。组织学员在飞机旁上课，边讲、边操作。助教们亲自动手制作大量图表。模型和求教设备，使许多抽象难懂的问题形象化、简明化。同时还建立了200多个专修室和实习室。三是在学员中广泛开展互助活动。组织互相学习、帮助，取长补短。由于采取以上措施，经过教员、学员共同努力，终于突破了航空理论教育这道难关，并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经过1个多月航空理论学习，学员们掌握了一定的基础理论知识，1950年1月16日，第3航校首先开飞。开飞后遇到第一个困难是教、学员语言不通，为解决语言障碍，除规定用手势、中俄文对照卡片联络外，主要在加强飞行地面准备上下功夫，并仿效航空理论教学的方法，建立飞行助教制度。由起义和收编的原国民党飞行员担任飞行助教，与苏联专家、翻译一道，参加飞行前准备、飞行后讲评以及学员的飞行预习等全部活动，较好地解决了语言不通的困难，并逐步从飞行助教和学员中培养一批自己的飞行教员，充实了教学力量。但是大家梦中都渴望的心情是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看密密麻麻的仪表，手指一动，飞机就发生变化，乃至飞上蓝天，这比死背书好多了。组织飞行训练紧张而又艰巨，只要天气允许，全天练飞行大家都没意见。虽然1名教员要带8名学员，飞行只有一两顶飞行帽，四五名学员共用一套飞行服，在严寒空旷的机场上你脱我穿，轮流使用，学员们也不怕麻烦。飞行学员不仅要紧张地飞行，一下飞机

45 还要参加一些保障工作，收场后还要擦飞机。机务人员为了争取时间，经常夜以继日地奋战。由于各航校全体人员的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按期或提前完成了飞行 30 小时，轰炸学员飞行 23 小时 25 分的预定全部训练课目，于 1950 年 5 月毕业。由于组建部队的急需，一期甲班的歼击学员于 1950 年 10 月提前毕业；轰炸机学员除 10 个机组提前毕业外，其余学员于 1951 年 1 月毕业。

这些经过专门训练的“雄鹰”，个个士气高昂，他们驾机巡航在万里蓝天，谱写着空军崭新的历史。

金秋 9 月，空军首长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空军应设法在航校第二期学员毕业后，组建一个编有 3 个团的喷气歼击机航空兵师，根据这一指示，对空军于同年 9 月 28 日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提出各航校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加以扩充，同时将第 4 航校首先改建成喷气式歼击机航校。自 1950 年 12 月第二期起，增加培训班次，每年接收和毕业两批学员，每个歼击机航校增加培训飞行学员 126 名，每个轰炸机航校增加培训飞行学员 112 名，并相应增加培训地勤学员的人数。按此方案，到 1953 年底，空军可增加 23 个航空兵所需的空、地勤人员。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对再次扩大的航校培训规模所需的干部、学员和飞机，器材、营房、教室等，根据航校实际情况，作出了具体安排。

空军虽然采取了三次扩大航校培训规模的措施，培训能力有了显著增长，但仍满足不了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从 1951 年开始，空军便决定增建新的航校，并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1951 年 5 月将第 4 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 8 航校负责培训。翌年 8 月，又将 1、2 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人员分出来，由在长春的新成立的第 9 航校负责培训。同年第 3、5、6 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太原新成立的第 10 航校负责培训。46

随着空军部队的发展，1953 年 1 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 11 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1953 年 2 月，在山西临汾成立了第 12 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任务。

空军初建时期，参战任务紧。航空兵部队的指挥员主要在实战中学习战斗指挥。在部队不断发展和急需提高指挥员实战与指挥能力的情况下，1953 年 3 月，在北京南苑成立了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该训练班主要负责轮训航空兵部队大队和团一级指挥干部，以学习战术为主，并有重点研究部队急需解决的飞行技术问题。

经过 4 年的艰苦努力，到 1953 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 5945 名，机务人员 2.4 万余人，军事干部 396 名，政治干部 690 名，后勤干部 310 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同时通过消化苏联空军的办校经验，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学会了独立自主地办航校。

1953 年 5 月，又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到了北京南苑机场举办的空军航校教具模型展览会上，一件件教具模型、一串串普通的数字吸引了领袖的眼睛，感动了两位领袖的心。47

3 中国独特的“三八”节，第一批女飞行员飞过天安门。毛泽东问刘亚楼：他们都成器了？刘亚楼说：都成器了。毛泽东说：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

在世界航空史上，天空历来是被认为是雄性的世界。航空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国家军队中有女飞行员。

新中国刚刚诞生，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也随之诞生了。这可是开天劈地的大事情，这一壮举，是随着中共中央决定而产生的。

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中国妇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翻身解放。为提高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女飞行员。

1951年4月初，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备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进入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在途经北京时，她们受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亲切接见。在会议大厅里，齐刷刷坐着即将入校学习的女飞行员，她们英姿飒爽，俏丽而精悍。刘亚楼司令员提高嗓门对她们说：你们不要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刻苦学习，不怕困难，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人民空军女战士，祝你们早日飞上蓝天！

从女军人到飞行员，从陆地到蓝天，这偌大的差距要靠勤奋和毅力去缩短。

当时，第7航校的教员主要由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和日籍航48空技术人员担任，使用的教练机是美制PT—19和日制双发“九九”式，飞机陈旧，器材短缺。加上女学员的生理、心理特点，面临着比男学员飞行更大的困难。请听陈志英是怎么说的：“咱们是女人，体力上有点欠缺，可智力不比男人差，要争口气飞出来，决不让一个姐妹掉队！”上海姑娘施丽霞表示：“男人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做到！”就是这个意志坚强的姑娘，第一个由教员带飞上了蓝天。起飞前，教员告诉她：飞行中要是感到不舒服，支持不住，就用手拍拍脑袋示意，好早点着陆。施丽霞在飞行中真的呕吐起来，吐出了黄水，可是她坚持飞完了课目。飞行得跟汽油打交道，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汽油的味道敏感，于是她们就把汽油洒在手帕上，经常闻一闻以逐步适应汽油味。操纵驾驶杆，拆卸发动机气力不够，她们就刻苦锻炼自己的臂力。一次，同场训练的男学员在飞行时发生了事故，在生与死面前，他们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而是更加坚定地学习飞行技术。

航校的各级干部和教员对培训新中国的女学员十分精心。当时，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有趣的是为了区别女飞行员的飞机，就特意在飞机尾后挂上红布条，用这种标志提醒空中其他飞机和地面指挥员给他们以特别关照。

奇迹终于在她们身上产生了。1951年11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正式毕业。空军史册上闪烁着她们的名字：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周映芝、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王坚、伍迪、秦桂芳，就是这14位军中女杰，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闯过学习关。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从此，中国广阔的蓝天上，有了红装女性的身影。

1952年3月8日，早春的京城。西郊机场，彩旗猎猎，人头攒动。7000名各界妇女代表，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聚集在这里，迎接一个划时代的时刻。49

两辆美式吉普疾驶而来，嘎然停在观礼台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满面春风走下车来。朱老总握着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手问：“都准备好了吗？”

“报告朱总司令，都准备就绪了。”

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机场东头。

草绿色的“里—2”运输机，齐刷刷地一字排开；一列女飞行员，英姿飒爽，正待命起飞。

12点45分，啪！啪！啪！三发绿色信号弹划破长空，女飞行员们迅速登上飞机，犹如矫健的勇士跨上战马。顿时，引擎飞转，马达轰鸣，大地震撼。一架架绿鹰呼啸着掠地而起，直射长空。

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他领导人一起仰望蓝天。

6架绿鹰成梯形编队，向天安门上空飞来。广场上欢声如潮，领导和人民一同挥手，向高度550米的女飞行员们致意！

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批女航空员，克服了世人难以想像的困难，经过刻苦训练，顺利地飞出航校，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再次证明了新中国妇女的伟大！

从此，中国空军的女飞行员一批又一批地飞上天空，为世人所瞩目，她们的飞行技能可以和任何先进国家的女飞行员相媲美。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女飞行员戚木木汇报了她们学习航空技术的经过。她激动地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我们培养成飞行员，是人民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只有在新中国，妇女才有广阔的道路。”她代表女飞行员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50

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员。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

领袖简短的话语，是对她们历史地位的进一步肯定！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飞遍了祖国各地，执行空运、空投、抢险救灾、人工降雨、航空测量、科研试飞和专机飞行等任务。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民空军赢得了荣誉。许多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乘坐了她们驾驶的飞机，对她们的精湛技术表示钦佩和赞赏。

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编入部队服役以后，空军又先后培训了多批女飞行人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培养女飞行员最多的国家之一。51

鲲鹏展翅

1 首战告捷，何中道、李永年空中献艺，美国空中堡垒空中开花。

人民空军建立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作战。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一些岛屿和台湾还被国民党占据，并经常派飞机对大陆沿海要地进行骚扰破坏。

我空军对国民党空军作战，可以说是以弱对强。人们不会忘掉这样一个事实：国民党空军产生于北伐战争中。20年代后半期，蒋介石为灭绝共产党，铲平地方军阀，建立蒋家一统天下，开始着手发展已在世界军事舞台上初露头角的空中力量，组建自己的空军。从1927年到30年代初，他借北伐之机，打着建立统一武装力量的旗号，软硬兼施，分化瓦解，先后从北伐军东路军、原52北京政府、桂系军阀、东北军阀那里接管了一批航空管理机构、飞机工厂、飞机和飞行员，逐渐积攒起一笔家业，组建起若干中央统辖的飞行部队，并派它们参加了内战和1932年“一·二八”抗战。1933年2月，蒋介石政府正式打出空军大旗，其时共有4个航空队。精于权术的蒋介石深知培植自己势力的重要，从组建空军之初就下大力气抓教育培训，自己培养飞行人员，以改变空军队伍的成份结构，排挤地方空军势力。

1928年5月，蒋下令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开设了一个空军营，以后改成航空队，从陆军学员中招生培养成飞行员。1931年4月，航空班独立改校，1932年9月，航校正式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址设在杭州览桥。该校第一批招收200名学员，其中一半是飞行学员。学校聘请优秀飞行人才任教，并由美国人担任顾问。进行全套正规化航空教育和严格训练。

蒋介石对这个培养嫡系空军的大本营极为重视，亲自兼任第一任校长，以外甥毛帮初为副校长，堂侄蒋坚忍任训练处主任，牢牢把住各项大权。他多次到校视察，过问学校事务，与学员、军官及其眷属举行“恳亲大会”，笼络人心。1933年2月，他又亲自为校题写《空军训务》，内容为“至高无尚，为国捐躯，有我无敌，服从命令，再接再厉，冒险敢死，精密周到，亲爱精诚，素质朴实，自强不息，克服天然，坚忍不拔”。由此可见，蒋介石对空军建设用心良苦。

这就是说，国民党的飞行员当时无论是飞行技术和机种都比刚建立起的中国空军略胜一筹。

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后，其空军不断对大陆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徐州、广州等城市进行轰炸破坏。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像乌鸦一样盘旋在上海天空，在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目标地投弹60余颗，炸毁房屋

532000多间，死伤居民1400余人，使发电遭到破坏，造成大部分工厂停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仅国民党空军飞机对大陆的骚扰活动频繁，而且美国军用飞机也不断侵犯我中国领空。除侵朝美空军飞机侵入中国东北地区外，美国空、海军飞机还经常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

采访备忘录之一：那时，空军正全力创办航校培训飞行员，还没有组建部队的条件。因此，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派空军部队协助防空。1950年2月，苏联空军部队先后来华。第一批到达中国的混成航空兵集团，3月13日至5月21日，在上海、杭州和徐州地区接连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5架。该部于同年10月回国。相继到中国担负防空的还有苏联空军11个歼击航空兵师，分

驻鞍山、辽阳，沈阳、安东、吉林、公主岭、北京、唐山、青岛、广州等地。这些苏联空军部队于 1951 年 7 月陆续回国。

采访备忘录之二：组建起来的中国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先后接替了各要地的防空任务。空军第 4 混成旅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担任了上海地区的任务。这支部队驻上海时，上海市人民政府特地组织盛大的欢迎，让空军部队的指战员乘车经过繁华四川路。南京路、淮海路，意在宣告：上海的天空有了自己的保卫者了。后来第 4 混成旅的一部分北上参加抗美援朝，所属的一个歼击团调入新组建的第 2 师，继续担负保卫上海的任务。其他空军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在 1951 年 11 月也都先后担负起防空任务，如第 3、4、6、9、15 师担负东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的防空任务；第 14、17 师担负北京、天津、唐山的防空任务；第 12 师在上海，第 16 师在青岛，第 18 师在广州担任防空任务等。

采访备忘录之三：1952 年 9 月 20 日 5 时 30 分，防空警戒雷达在上海南东 133 公里处发现美 B—29 轰炸机 1 架，高度 1500 米直逼上海。空军第 2 师 6 团 5 时 45 分起飞 2 架米格 15 歼击机截击。长机飞行员为何中道，僚机飞行员为李永年，他们在指挥所 54 引导下飞至崇明岛陈家镇上空时，在左后侧方发现美机，距离 4 公里。美机首先开火射击。何、李双机急剧转弯到美机尾巴后投入攻击，从高度 1500 米打到 200 米，先后开炮 4 次，将其击落。何中道的飞机中弹一发，双机安全返航。空军领导机关赞扬这次战斗指挥机动，引导正确，飞行员勇敢机智，并决定给何中道、李永年各记一等功一次，以示表彰。

采访备忘录之四：1952 年 11 月 22 日，第 2 师飞行员杨木易在上海佘山附近上空击伤入侵美军 PB4Y—2 海上巡逻机 1 架；1953 年 3 月 6 日，第 14 师飞行员何亚雄在青岛崂山附近上空，击落入侵的美军 F4U 战斗机 1 架；4 月 23 日，第二师飞行员宋中文击落侵入上海地区领空的美军 P—2V 反潜巡逻机 1 架；7 月 25 日，第 2 师飞行员宋中文、中队长杨宝海在海上奉贤附近上空，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 F—47 战斗机各 1 架；10 月 2 日，第 14 师中队长林钧才在青岛附近千页岛上空击落美军 PBM—5A 海上巡逻机 1 架。这些空战，多数是在海上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有的距海面高度仅 100 米左右，由于指挥引导正确，飞行员勇敢机智，各项保障得力，因而取得了战斗胜利。

2 试与天公比高，在世界屋脊上飞行，年轻的中国空军突破了飞行禁区。

1950年1月，中央军委将进军的箭头指向西藏。西藏人民昼夜盼望人民解放军前来解救他们。受命的第1军骑兵大队和第2军独立骑兵师已向西藏挺进。

中共中央西南局确定进军原则是：“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55战斗。”原则中非常突出地把“补给”摆在战斗之先，没有粮食、衣物，再强的部队也会不击自溃的。进藏先遣支队顺利向前推进，但3月20日攻占康定以后，由于当时公路只通车到雅安，物资运往康定十分困难，部队粮食筹措无着。西南军区于3月29日致电中央军委，请求空投支援。3月20日，毛泽东指示空军迅即派出飞机空投粮食。当时，空军将这任务交给华北军区航空处所属的一个空运队。该队仅有的C—46、C—47运输机12架，大都非常陈旧，少数勉强可用。华北军区航空处挑选较好的飞机3架（2架C—46，1架C—47）和相应的机组，于当天下午即从北京起飞次日抵达重庆，4月2日转至四川新津机场。这3架飞机连同西南军区航空处接收的4架C—46飞机，以及后来又从北京增调的3架C—46飞机组成空运队，归西南军区航空处领导，迅速投入空运任务。

满载生命希望的飞机升入高空，飞入号称“世界屋脊”的康藏高原上空，对于年轻的空军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这里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气候变化无常，高峰终年积雪，云雾弥漫，要在这里开辟航线，就像在海里寻找一条合适的航道一样困难。当时的主要困难：一是飞机高空性能差，缺乏适应高原飞行的必要设备；二是飞行机组没有高原飞行和空投经验；三是没有康藏地区的气象资料和准备的航行地图，航行区域没有完备的导航设施和可供备降、迫降机场，飞机一旦出现大的故障，很可能造成机毁人亡。

困难摆出来了，试航的任务摆在空运队队长谢派芬身上。谢派芬原系国民党空军上尉教官，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1月从杭州驾机回到解放区。他飞行技术熟练，经验丰富，困难面前他毅然接受了任务。

谢派芬心里明白，从川西飞向康藏高原，过康定山口是第一关。由新津到康定，空中航线虽然仅180余公里，但中间横亘着56邛崃山脉，康定山等雪峰海拔在6000米以上，如果有适宜高空飞行的飞机，当然可以轻易地从山峰上飞越，当时自己使用的飞机性能很差，很难飞到6000米以上高度。要通过康定山口，就必须找出顺着山峰间峡谷穿行的航线。1950年4月3日，谢派芬机组驾驶C—47飞机进行首次试航。按当日的气象预报，云量5—10成，云高600米。但飞机起飞以后，却发现漫布浓云，上升到4200米时才穿出第一层云，而上面还是厚厚的云层，他们驾着飞机继续升高，用了15秒只升高210米，把发动机油门加到最大，还是上不去，被迫返航。接着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试航，都因为气象条件恶劣，C—47飞机高度又上不去，连遭失败。第四次试航，改用C—46飞机并装上氧气设备，高度上去了，而且成功地飞到康定上空，可惜因为有云遮住了地面目标，未能进行空投，目的仍未达到。4月15日进行第五次试航，真是天公作美，当日康定天气转晴，终于获得成功。当飞机顺着山谷徐徐飞行，将粮食和其他用品空投到地面时，在场的陆军指挥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欢呼声。

身负重任的陆军第18军先遣支队得到给养补充以后，又精神百倍地继续西进，4月28日抵达康北重镇甘孜。5月初，先遣支队粮食告急，空投任务

也必须随之西进到甘孜。

这一任务落在副分队长王洪智、飞行员李嘉谊的身上。5月3日，他们驾驶C—46飞机向甘孜试航。由于越向西飞行条件越恶劣，第一次试航失败了。此时，地面部队供应的困难情况已相当严重，有关资料这样记载了陆军第52师师长吴忠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部队携粮已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挖地老鼠、捕麻雀充饥……。”虽然空投心急如焚，但两次试航又失败了。5月7日第四次试航，终于克服种种困难，飞越大雪山，顺利到达甘孜。接着，空运队以最大57的出动量，连续两天向甘孜、康定空投粮食2.3万公斤，解救了地面部队。

进藏部队胜利结束昌都战役之后，于1950年10月，集结于昌都、江达、巴塘等地进行休整，准备向西藏的首府拉萨进军。部队继续西进，空投地区扩大，而且空投物资数量增多。为了适应进藏部队的需要，空军采取了许多措施，首先扩编空运部队，加紧训练空投力量。

日记上这样记载着：1950年11月，以空运队为基础组成高空运输团。1951年4月，扩编为空军第13师。除继续使用C—46飞机空投外，积极组织飞行人员在苏制伊尔—12运输机上进行换装训练。到5月底，已有少数飞行员掌握了伊尔—12飞机上进行的基本驾驶技术。

6月16日大队长王洪智机组驾驶伊尔—12型飞机执行空投任务。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开辟新航线，扩大空投范围。

1950年10月9日、23日分别开辟了新津至邓柯、江达、巴塘的航线。

1951年2月8日、5月1日，新津至丹巴，卡贡的航线也相继试航成功。

5月24日，由大队长徐骏英、中队长刘耀宗机组驾驶C—46飞机又开辟了新津——昌都的航线，从而使进军部队的军中供应线延伸了280公里。12月12日，由飞行员金逸群、黄熙、杨兴满等8人组成的机组，驾驶C—46飞机向边坝试航空投成功，开辟了新津——昌都——恩达——硕督——边坝航线。空投任务的加重，必须在甘孜修建机场作为空投的前进基地，使空投地区继续向西延伸。在高原修机场，勘察设计、组织施工有很多困难。当时空军尚无修建机场的工程技术力量，对机场的勘察设计是聘请中国建筑公司张汝刚等4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的。施工由陆军第18军派出部队担任，并动员了部分民工，参加施工人员共1.4万

58人。经过7个月的艰苦努力，完成土石方147万立方米，于1951年11月建成一条长3200米、宽60米的碎石跑道。该机场海拔3380米，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个高原机场。空军第13师于同年11月11日派出伊尔—12飞机试行降落成功。随后进驻一个小分队，以甘孜机场为前进基地，执行向昌都地区的空投任务。

到1951年下半年，共建立通信、导航、气象台站54个，改善了空投区的航行条件。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建议》。为保障协议的贯彻执行，7、8月间，陆军第18军的部队分别从昌都、甘孜等地向拉萨进军。空军第13师调集20余架运输机，以四川广汉为基地，向昌都、卡贡等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突击空投。进藏部队战胜了重重困难，同时也从地面和空中得到了补给，进军比较迅速，先遣支队于1951年8月29日进抵拉萨。10月26日，由张国华军长、谭

冠三政委率领的第 18 军主力部队顺利抵达拉萨。

1951 年 10 月，进藏部队先后进驻太昭、拉萨、日喀则等地，运输线大大延长，公路尚未修通，物资供应仅靠牦牛输送，远不能满足需要，要求空军向西延伸航线，除继续向昌都空投物资外，主要支援嘉黎、太昭、拉萨等地部队的供应。空军第 13 师即开始组织向太昭试航。

根据研究计算，完成向太昭的试航任务，困难很大。突出的是机场和飞机问题。当时康藏地区除甘孜机场外，没有别的能供使用机场。可是 C—46 飞机由于性能限制，不能在甘孜机场起降，而伊尔—12 飞机，又因载重不够而不能完成任务。

随后进一步研究从新津机场起飞直接试航太昭的可能性。根据研究计算，如使用伊尔—12 型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最大起飞重量可以增加至 6000 公斤，但新津至太昭航程 1129 公里，机上装载必需的油料、工具、设备和空勤人员总重量达 6314 公斤，不 59 装载空投物资还超重 814 公斤。因此，伊尔—12 飞机使用新津机场也不能完成任务。

然而使用 C—46 飞机从新津机场起飞，其起飞重量可达 7180 公斤，有可能执行这一任务。但是顾虑到这种飞机的机体老旧，加之航行区域地势高，气象变化迅速，无备降场可以利用，因而感到把握性不大。尽管如此，西南军区空军还是决心一试。为此他们精选人员组成试飞小组，驾驶 8051 号 C—46 飞机，装载物资 260 公斤，从新津机场起飞，飞行高度 6500 米，总航时间 9 时 38 分，往返航程 2247 公里，胜利完成了至太昭的试航空投任务。至此，新津至拉萨的航程 1327 公里，仅余最后的 198 公里还未经过试航。

试航太昭虽然成功了，但在试航过程中，飞机多次发动机震动，仪表失灵、滑油系统漏油等问题，仅能勉强维持飞行高度，同时，沿途航线多高峰，飞机常在雪山的鞍部穿行，航线附近缺少导航设施，又无备降场，安全确无保障。为了继续有效地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空军曾向中央军委建议，设法购买性能较好的飞机，并在拉萨修建机场和改善飞行保障设施，但因限于当时条件，一时难以做到。1952 年 11 月，康藏公路通车到昌都，进藏部队的后勤供应开始好转，空军支援进藏部队空投物资的任务遂告结束。

1952 年 6 月 7 日，西藏的雪山永远记下了这一天。这一天中队长魏雄英机组驾驶 C—46 飞机执行向昌都空投物资任务返航途中，天气恶劣，飞机失去操纵，不幸撞于康母山的主峰上，机组 9 人全部牺牲。在另一次空投中，空投员程广嘉，因过于劳累，被甩出机外不幸身亡。他们的英名不仅载入胜利进军西藏的史册，而且活在共和国人民的心中。60

3 势如破竹，解放全国剿匪中的空军外科手术。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军南下势如破竹。国民党如惊弓之鸟，其政府先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逃往四川，妄图以西南为基地“待机反攻”。在解放军席卷川、滇之时，又准备内迁西昌，后见大势已去，才决定渡海东迁台北。国民党的这些如意算盘虽未实现，但在这些地区留下了许多匪特武装，经常进行骚扰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以相当的力量执行清剿，人民空军随之派出部分兵力执行空中侦察、空投空运和轰炸扫射土匪巢穴等任务。

剿匪日记之一：四川黑水地区，众匪盘踞，是我军必剿之地。它位于四川西部黑水河的中上游，又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这一地区，东西宽约 120 公里，南北长约 15 公里，地势险峻，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国民党军统特务傅秉勋为头目的上匪集团 3000 余人盘踞于该地区，梦想建立“陆上台湾”。1952 年 7 月，川西军区奉命对这股土匪进行清剿，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以及台湾当局有可能派飞机空投武装人员和物资接济，中央军委决定由空军派出轰炸机、歼击机各一个大队及运输机部队予以支援。7 月 5 日，空军令第 8 师以图—2 轰炸机 6 架，第 9 师以拉—9 歼击机 5 架组成混合团，分别从齐齐哈尔、吉林进驻四川广汉机场执行这一任务，归西南军区空军指挥。同时，以驻四川新津机场的第 13 师担负战区空运粮食和作战物资的任务。

川西军区与西南军区空军 7 月 12 日联合发布作战命令，确定 61 空军在这次作战中的任务是：实施空中侦察、轰炸，配合陆军围歼敌人；空投传单，开展政治攻势；拦截可能从台湾来的敌机；对地面部队所急需的粮食、弹药、实施空投补给。

为了保证对空军部队统一指挥和有效地进行陆空协同作战，西南军区空军在广汉机场组成基地指挥所，由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傅传作任指挥员，同时在茂县设立辅助指挥所。

经过紧张的准备之后，进剿部队于 7 月 20 日发起进攻，8 月 20 日以全歼敌人宣告战斗结束。

在一个月作战中，空军出动轰炸机，歼击机 17 架次，对本疏衙门、杂窝等地之土匪集结区多次轰炸扫射，投弹 72 颗，发射枪炮弹 1300 余发；出动运输机 237 架次，给进剿部队空投粮食和其他物资 49.6 万公斤。空军部队的战斗活动对于震撼土匪，为陆军部队提供补给，起到了重要作用。

剿匪日记之二：1952 年底，西北大部地区的大股土匪已被歼灭，但盘踞在甘肃、青海、四川三省边界地区的马良、马元祥股匪，纠集散兵游勇、土匪特务，已扩充到四五百人，企图建立“游击根据地”。1952 年 12 月，西北军区决定以 8 个团的兵力进行清剿。西南军区亦以部分兵力向川西北草地进军，配合西北军区围歼这股残匪。1953 年 3 月 27 日发起全线攻击，歼灭了马步芳匪徒的主力。然后又分兵进行驻剿，反复搜捕，至 7 月底结束，取得了全歼马步芳匪徒的重大胜利。

剿匪日记之三：为进剿部队空投物资，陆军部队要求在三个月时间内，空投可供 1 万人一个月食用的给养 15 万公斤，以及其他急需的军用物资。空军决定由第 13 师 39 团派出伊尔—12 运输机 5 架，归西北军区空军指挥，以兰州机场为基地，空投支援甘南地区的进剿部队；同时第 13 师以四川新津机场为基地，出动飞机空投支援西南军区向川西北草地进军的部队。第 13 师

39团5架运输机于1953年4月2日从兰州起飞，首次向索格藏试航、空62投获得成功。以后随地面部队的前进，边试航边空投，直到7月底全歼土匪后结束空投。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7月，空军出动运输机169架次，空投粮食、弹药等34.3万公斤，完成了给陆军部队空投物资进行后勤支援的任务。

剿匪日记之四：这次甘南剿匪，空投地属于高原地区，海拔在4000米左右，有些地方是草原沼泽地带，无明显标志，而且进剿部队流动性大，空投场不固定。在这种条件下，所以能够完成任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组织工作严密。特别是在空投区设立固定与流动相结合的气象台站，派出随进剿部队行动的目标引导组，给保障空投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飞行机组高原空投经验丰富，准确性高，各种物资空投的命中率达到99.5%，这就保证了进剿部队能够及时通过空投得到补给。从而保证了战斗力的发挥。

63 第六章
泪水欢歌

1 斯大林电告北京：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中国出兵朝鲜，举步艰难的中国空军。

1950年10月4日午后，一架银灰色的苏制民航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着起飞了。当时，古都西安还沉醉在建国一周年纪念日的氛围中，没有什么人注意这架特殊的飞机。然而，细心的机场塔台工作人员还是觉得奇怪：几分钟前，这架由北京突然飞来的客机刚刚降落，机械师匆匆对飞机进行了一番例行检查，紧跟着，飞机又驶向跑道，疾速起飞。来接什么大人物吧？塔台工作人员用惊奇而不安的目光，注视着这架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的飞机。若干年后，这位塔台工作人员从刚刚出版发行的《彭德怀自述》才明白：40年前他在西安机场见到的那架匆匆来去的飞机，机舱里坐的是当时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

飞机从西安机场呼啸而起，穿云破雾，飞往东方。

偌大的机舱里，端坐着彭德怀，还有他的一位随行秘书。机舱里显得空荡荡的，这使彭德怀多少感到有点寂寞。

10月1日，彭德怀出席了西安市人民庆祝国庆一周年和谴责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和我国领土台湾、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示威游行大会。一个会两项内容，又要欢度国庆，又要示威游行——既要和平，又要备战，这本身就使国庆的节日气氛添加了一股火药味儿。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和西北军政首脑一起，紧张研究开发建设大西北的规划，满脑子都是玉门的油田、河西走廊的交通、八百里秦川的农业发展……就在这时候，中央从北京派来专机，命他火速赴京。一切就像打仗时那样紧张匆忙，他甚至没来得及回家向夫人浦安修道个别，没来得及带上洗漱用具，便和秘书一起收拾了一摞有关西北经济建设方面的资料，匆匆登机出发了。

……彭德怀靠在飞机座椅上，脑子里一时无法安静下来。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大举推进，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继而从空中，地面向鸭绿江的新中国示威撒野。

战火烧到了国门。

在汉城出现欢庆时刻的前两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其军事目标是摧毁朝鲜军队，但在任何情况下，其军队都不得越过满洲和苏联边界。

但麦克阿瑟心目中的目标远在北平以北，他要的是整个朝鲜或更大的中国。

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是疮痍满目，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新中国刚刚诞生，偏远的省份尚未解放，几十年战争的创伤尚待医治，土地改革正在进行，通货膨胀急待消除，国民经济急需恢复和发展。

中国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战争。

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预感到战争将给新中国带来的阴影。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麦克阿瑟：我们希望，在你今后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再作解释或者声明，一切服从作战需要。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告诉麦克阿瑟，杜鲁门希望降低越过三八线之影响，任何公开声明都可能“使联合国一下子陷入窘境。”东西方世界已经有所反响，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10月2日提出一项计划，呼吁在朝鲜实行停火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近午夜时分，在北京，印度驻华大使贾瓦拉姆·潘尼迪被叫醒，说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庚正在客厅等他。在表示歉意后，

陈请潘尼迦立刻去周恩来的住处见这位总理。

半小时后潘尼迦离开其住所时，北京的街道上一片寂静。他猜想突然叫他可能与朝鲜有关，急不可耐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有什么新建议要转达给尼赫鲁？中国人已经参战？他发现周和往常一样谦恭和富有魅力。在照例上茶后，周先对潘迪特·尼赫鲁对和平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然后说，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干预。

你已经听到美国人已经越过分界线的消息了吗？潘尼迦问。周回答说已有这方面的消息，但他不知道在何处越过。

10月3日凌晨1点半，潘尼迦用电报把这次会谈的要旨发回新德里。虽然麦克阿瑟在当天早些时候才宣布大韩民国第3师已越过三八线，但潘尼迦当时料想他们已经过线了，而且他肯定集结在满洲的中国军队也已经跨过鸭绿江。那天下午，他把情况告诉了英国驻印公使。⁶⁶

当这消息传到艾奇逊耳朵里时，这位国务卿并没有认真对待，因为他信不过潘尼迦。“他不是个好通讯员。”对于周最近发表的如果北朝鲜遭入侵中国不会袖手旁观的讲话，艾奇逊也没有给予重视。

然而，潘尼迦的确是位消息确切的通信员。周恩来的警告可不是开玩笑，而且就在那一天，毛泽东已经决定派军队赴朝鲜同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作战。东北有中国80%的重工业，不得不要受到保护。被称为志愿军的中国军队。

彭德怀到达首都时已是下午4点过后，在颐年堂举行的会议已开了一会儿。在听了大家坦率地举了出兵的困难之后，主席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尽管毛泽东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但彭德怀感觉到会议的大多数人反对开战。彭德怀相信毛主席是对的。

休会后彭德怀由中央管理科的同志送往北京饭店用餐。彭德怀仍然没有发表意见，但当晚他怎么也睡不着。他以为是沙发床，此福受不了，搬在地毯上，也睡不着。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掉会上的情景。美国入侵北朝鲜且与中国隔江相望，威胁中国东北。美国又控制了台湾，威胁上海和华东沿海一带。“美国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借口，老虎迟早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他的肠胃。”

彭德怀得出结论，必须进行抵抗，以保卫国土。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要建设社会主义就永远不可能。“如果美国决心向我作战，它利速决，我利长期；它利正规战，我利于对付日本那一套。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支援，比抗日战争时期要有利得多，为本国建设前途来想，也应当出兵。”

“邻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彭德怀把毛泽东在会上讲的这句炽热的话一直记在耳边。他⁶⁷认为出兵支援朝鲜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英明的决策，他想通了，拥护主席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下午，中央又在颐年堂开会。在其他同志表达了不同意见之后，彭德怀最后一个发言，而且讲得慷慨激昂：“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国把兵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已经开始问中央能派多少飞机参加战斗，苏联怎么在军事上配合。

彭德怀已经开始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从金日成的电报看，他们很吃美

国空军的亏，需要有飞行部队，但我们的空军还没有搞起来……

“这个问题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了，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我们陆军是没问题的。你看呵，德怀，我考虑过，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当然就是我们的有利因素……”毛泽东站在彭德怀前面，扳着指头数道：“第一，美国战线太长，从北冰洋、黑海、波罗的海、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一直搞到东方来，战线从西欧拉到东亚，比希特勒和日本的战线都长。美国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动弹不得。第二，后方太远——必须横渡大西洋与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而且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大都是驻日本的占领军，过惯了舒服的日子，据称是什么‘榻榻米’部队。第四，美国的同盟国都不强，可派的兵寥寥无几。第五，美国依靠原子弹也并非一国独有，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就打破了它的核讹诈；而且，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弹作用也愈小……我预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毛泽东说到这里，将手臂扬起一挥。68

这时，彭德怀深为毛泽东的判断周密而打动，连说：“有道理，有道理。”彭德怀又想起高岗对他说过的：“要点你的将喽。”心想，毛泽东单独叫他来，莫非真是考虑……

“主席，如果出兵，第一批入朝的13兵团兵力是否够？”彭德怀问。

“现在13兵团有4个军，我想再给他们编入2个军，把50军和66军调去，你认为怎么样？”毛泽东征询地问彭德怀，不等他回答，又说，“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的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我们是要和平的，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希望打起世界大战来嘛！”

毛泽东把话扯来扯去，暂不点正题。当然，这些话他也是必须对彭德怀谈的。他将彭德怀从西安急召进京的目的，是想让他带兵入朝，但这是件大事，不宜采取直接任命的方式，何况，他深知彭德怀的脾气，刚直不阿，又倔又犟。在井冈山反“围剿”时，谁都惧怕三分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彭德怀因不满他的瞎指挥，曾跟他大闹一场，甚至不怕撤职杀头。几十年征战过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脾气摸透了，知道他无私无畏，作战勇猛，敢于临危受命。毛泽东当然记得，在吴起镇战役中，彭德怀受命率数千红军，一仗击溃马步芳、马鸿逵的4个凶悍的骑兵团，而且歼灭了1个团。还有解放战争时，毛泽东为解除后顾之忧，命彭德怀去拔掉太原和归绥这两颗硬钉子，彭德怀二话没说，只要50门火炮，便掉头奔赴前线，和徐向前一起，把这件事漂漂亮亮地解决了。毛泽东想起当年吴起镇之役大胜后，他曾乘兴挥笔赋诗一首赠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是的，彭德怀的勇猛善战的确使毛泽东很看重。现在，朝鲜的山不可谓不高，路不可谓不远，沟不可谓不深，而美国的坦克车正纵横驰骋——那么谁敢横刀立马？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彭德怀……69

杜鲁门、麦克阿瑟不相信毛泽东有迎战的胆量。

斯大林也有同样的认识。

当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苏联，在黑海海滨见到正在休假的斯大林时，斯大林为毛泽东的出兵决策大为骇然。

这位钢铁伟人，已经意识到毛泽东是个比他还强硬的人。1949年12月21日他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紧握毛泽东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想

不到你这样年轻！这样健康！”毛泽东回答：“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

毛泽东所说受打击排挤，没指明是国内还是国际。斯大林却实实在在感到被刺了一下，没等毛泽东言毕，忙接过话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当时在场的翻译被这些言不对题的对话弄得莫名其妙。但是，毛泽东敢摸老虎屁股，出兵迎战世界头号强国，这着实又让斯大林大吃一惊。

周恩来说为挽救朝鲜局势，维护亚洲和平，中国已决定出兵朝鲜。他与斯大林磋商，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的支援。

斯大林犹豫不决，顾虑重重。他担心中国出兵会引起世界大战，他甚至主张朝鲜失败了，让金日成到中国东北组织“流亡政府”。毛泽东接到周恩来从莫斯科发来的报告，10月13日再次召开紧急会议。

再议的结果仍然是一个结论：没有任何援助也要出兵。

一切都在紧张地进行着。

1950年10月19日17时30分，昼短夜长的东北已是夜幕降临，安东一派肃穆，一派寂静，没有灯光，没有闲杂行人，一阵阵车轮的滚动声，马蹄声、脚步声在夜色中悄然响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开始通过鸭绿江铁桥，进入朝鲜战场。

70

空军也开始北上，到天津军列停下来，晚上又开了。飞行员们天亮一看，又回到了上海。

苏联的米格—15大批量由苏联运抵上海，空军党委决定全部完成改装后，再拉上前线。

志愿军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成员虽有丰富的陆军作战经验，但空中作战对他们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面对强大的敌人，应该采取什么作战方针，如何使用兵力，选择什么时机，以什么方式和步骤参战，都是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最大的努力加速组建新部队的步伐。绝大多数师、团的架子才搭起，飞行员刚调来，就开始了飞行训练。经过短期的训练，基本掌握了飞机的操纵性能后，立即加入志愿军空军，分期地开赴安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1950年10月至11月间，继组建第一批部队——第4混成旅之后，空军组织和扩建了第二批航空兵部队，共3个旅。

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旅部和所属的第7、8、9团，以原步兵独立第209师师部及所属第625、626、627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10月下旬，该旅先后接收第6和第4、5航校一期甲班毕业的飞行学员88人，开始飞行训练。接着第7团调给歼击第4旅建制，遂将第8团番号改为第7团。

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这时，周恩来指示将空军部队的编制由每旅三团改为二团制，故歼击第4旅组建时下辖2个团。

同年10月30日，空军第2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原属第4混成旅的第11团划归第2师建制，改番号为第4团。同时，将以步兵第208师第624团团部为基础新组建71一个团划归第2师建制，番号为第

6 团。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

这些部队在苏联空军部队帮助下，加紧训练，准备迎接战斗任务。

人民空军既要担负国内防空任务，又要组成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仅靠上述几支航空兵部队显然不够的。因此，从 1950 年 11 月下旬至 1953 年 3 月，又分四批组建了 24 个航空兵师 56 个航空兵团。同时，又开始将每个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

2 杜鲁门担心中国参战，麦克阿瑟说：中国没有飞机。朝鲜战场上的中国战鹰。李汉首场空战之谜，美国空军谅解这种打法，没有战术的战术。

朝鲜战局对美国越来越有利，一切都在他们意料之中，美国并没有太注意中国。

华盛顿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一事有“可能性”，但大概不会实现。麦克阿瑟也持这种看法。10月15日，他在威克岛向杜鲁门总统解释说，他预计大约在感恩节的时候结束朝鲜的军事行动不会有很大困难。麦克阿瑟说，“不幸的是，北朝鲜人正在北朝鲜进行绝望的战斗。他们大约有10万受过作为补充人员训练的军队。这些人员的训练、领导和装备都很差，但却很顽固，我不得不将这些人消灭掉。”杜鲁门总统直率地问道：“中国和苏72联干涉的可能性如何？”麦克阿瑟回答说：“可能性很小。”他又说，“如果他们在战争的头一两个月内进行干涉，这种干涉就会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怕他们干涉，不再对他们以礼相待了。中国在满洲境内有30万人，沿鸭绿江部署的不会超过10万到12.5万人，只能把5万人到6万人送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现在我们的空军既然在朝鲜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企图南下到平壤，他们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次伤亡。”

麦克阿瑟所说的中国没有空军的话和美国远东空军关于中国军队至少有300架作战飞机的估计是矛盾的。由于不断接到发现敌机的报告，包括发现喷气式飞机的报告，斯特莱梅那提醒帕特里奇说：“保持绝对空军优势仍然是第一航空队在作战地带内最优先的任务。”

朝鲜上空处处是美国飞机，在强大的美军飞机面前，北朝鲜少的可怜的飞机只几天功夫便失去了抵抗能力，美国飞机开始轰炸北朝鲜的重要目标。

当第8集团军挺进部队主力进攻沙里院时，“蚊子”飞机的空中控制员们从海州起飞向东至开城进行侦察巡逻。然后折回海州飞往戴宁和院里进行侦察巡逻。这些“蚊子”飞机警戒着第8集团军的左翼，当发现目标时，就召唤来战斗机将其摧毁。10月17日，以“锤子”为代号的一架“蚊子”飞机在沙里院和密驰之间发现了一列由3个火车头牵引的列车，随后4架F—80迅速地击毁了列车，并把北朝鲜士兵打得四散奔逃。也就在这同一天，另外3个小分队的战斗机对另一个新德里以北公路上的部队集结点实施了攻击。

当第1骑兵师以一天10里的速度往北推进时，山间公路给他们带来的困难更堪于敌人的抵抗，他们在到达平壤以南约10里的黑桥之前，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抵抗。金日成首相在离开平壤时，北朝鲜人在黑桥里临时凑起了一支配备在约25辆坦克，8门自行73火炮和一些重迫击炮的部队，准备在他们首都的大门前作最后一次抵抗，经过一整天的战斗，美国战略轰炸机的8次攻击和美国坦克和大炮火力摧毁了这些武器。10月19日，得到英联邦第27步兵旅的加强的第1骑兵师进入了瘫痪的平壤市。除了还遗有一些狙击手外，平壤实际上是座没有防御的城市。第1骑兵师师长写道：“只有在第5航空队的提供了卓越空中密切支援条件下，我们才能突破黑桥里防线并随后进占平壤。……”

在以后的岁月里，南朝鲜军队在美国飞机的掩护下，顺着沿海公路向清津北上。

1950年10月下旬至12月间，中、朝人民军队连续发动第一、二次战役，迫使美军向南退却。美军遂增调两个空军联队，以“空中封锁交通线”和“密

切支援”等方式，加强对中、朝军队的封锁攻击，使中、朝军队的战役行动和后勤支援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

斯特莱梅那及其幕僚作出了一些作战上的决定。他授权帕特里奇，允许他下令对朝鲜任何地方进行事先对飞行员有详细交待的昼间武装侦察任务。一连串的作战命令紧急下达给了欧唐奈耳：11月4日轰炸江界，11月5日轰炸朔州和北镇，11月7日轰炸新义州。这些城市实际上都是朝鲜生产或储存军火的地方，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中心。为了这个理由，同时又由于当时在远东的B—29的实力已经有所削减，因此就允许欧唐奈耳将军使用燃烧弹。帕特里奇要求欧唐奈耳将军把上述城市化为灰烬。

当斯特莱梅那到第一层大厦去阐明他的轰炸计划时，麦克阿瑟不仅授权他使用燃烧弹，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比斯特莱梅那所设想的要激烈得多的空军活动的方案。在11月5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麦克阿瑟下令空军以最大的力量进行分为两个星期的战斗活动。如果需要的话，作战飞行员应全部出动，并尽可能地多次出动。斯特莱梅那的飞行员们应摧毁在满洲边界上的、朝鲜这一端74的全部桥梁。

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麦克阿瑟给远东空军司令的电报副本后，对这个命令颇为惊奇，因为麦克阿瑟在他给远东空军的命令中，表现了非常关心中国人的干涉问题，其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他过去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反映过的。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1月6日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命令麦克阿瑟推迟对距朝鲜边境线5里以内的目标的任何轰炸。华盛顿方面担心的是这种轰炸可能牵涉到满洲，并且美国政府希望有时间对情况作更充分的研究。但麦克阿瑟立即回电答复道：“大量的人员和武器正从满洲源源不断地通过鸭绿江上的全部桥梁。”制止这种增援的唯一办法是摧毁这些桥梁，摧毁支援敌人前进的其它一切设施。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到这个答复以后，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授权麦克阿瑟使用他的航空部队轰炸在满洲边境上的鸭绿江上各个桥梁，但务必不得侵越满洲领土。而且，该项命令仅仅是对满洲边境而言的。在与西伯利亚边境毗邻的地区，仍可以把空军的战斗活动一直扩展到鸭绿江，但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将炸弹投在满洲领土上或者攻击满洲领土上的目标。

斯特莱梅那将军研究了计划中使用B—29中型轰炸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将要遇到的情况之后，据说他会对此表示棘手，并会对麦克阿瑟说：“这是办不到的。华盛顿一定也知道，这是办不到的事。”斯特莱梅那无疑地认为，既要攻击这些桥梁而又不准侵犯满洲领土，这是一项困难到无法办到的任务，因为在上星期里，共军飞行员利用他们在安东的避难所性的机场，一直在和美国飞行员进行着“猫捉耗子的游戏。”当美国飞机出现在鸭绿江上空时，共军飞行员就从安东起飞，在江那边走到优势高度，并从约3万尺的高空越过边境对美国飞机进行俯冲攻击，然后赶紧逃回鸭绿江那边的安全地区；他们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从那里重复地进行这样的攻击。米格和雅克的飞行员们都采用这种同样75的战术。但雅克式飞机的速度太慢了，然而速度较小的美国飞机对迅如闪电的米格—15的打了就跑的俯冲攻击毫无办法。在11月7日这个特别紧张的日子以后，麦克阿瑟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问题给予指示。他说，这个问题在削弱空军和陆军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和总统找到了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有利先例，可以根据这些先例来允许联合国飞行员对敌机进行“穷追”或者说有权

用“2至3分钟”的飞行时间在边境以北追击。但是这样会牵涉到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因此美国国务卿于11月13日通知有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各友邦说，美国将允许他的飞行员在鸭绿江上空战斗。

1950年12月，志愿军空军第4师奉命率先出征。

那天，4师礼堂里欢呼声足足沸腾了15分钟。

东北大地风雪弥漫，朱德、刘亚楼乘坐伊尔—14飞机，直飞前线机场，为出征的4师10团28大队送行。

28大队全部是东北老航校毕业，后又经新航校改装训练的飞行员，新中国空军的精华。大队长李汉代表发言，发言毕，他激动异常地甩起两条长腿，走到讲台边上，对着坐在台下第一排的28大队全体飞行员喊道：

“有决心没有？”

“有！”气势排山倒海。

“有孬种没有？”

“有”！声音洪亮整齐。

礼堂轰地爆出笑声。朱德、刘亚楼也笑了。

每根神经都处于高度亢奋的28大队如梦初醒，齐刷刷全体起立，立正，大声吼道：

“有好汉，没有孬种！”

大会结束后，28大队为朱总司令、刘司令员做飞行表演。没有经验的地面人员把观看表演的主席台设在停机坪上，米格—1576飞机一滑上起飞线，朱德就被它吸引了，霍然站起，探身观看。一阵气浪从机尾喷出，顿时狂风搅起漫天积雪，遮天盖地，刹那间主席台上桌倒椅翻，朱德，刘亚楼全被掀翻在地。机场的人们吓坏了。

朱老总哈哈大笑：“好厉害的喷气式哟！”

28大队落了地，朱老总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细眯着的眼睛里透着慈祥 and 威严：

“为祖国争光，前方部队正盼望着你们呢！”

刘亚楼说：“我们跟美国飞行员打仗，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关公能耍，别人也能耍，你们就耍给美国佬看看！”

1951年1月21日，迎来了第一次空战。

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空军投入了15个航空联队，1100余架飞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又从本土调来一个F—84E联队和一个最新式的F—86A联队。这些穷凶极恶的空中强盗到处狂轰滥炸，使朝鲜北部几乎所有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作为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他们恨不能立刻飞上天去惩罚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当天下午，美国远东空军F—84飞机20架沿平壤——新义州上空轰炸铁路线和清川江桥。李汉率领28大队起飞拦截。

6架米格—15跃上蓝天，直飞战区。无线电耳机传来地面指挥员的通报：“敌F—84正在你们附近，发现目标，立即攻击！”

空战再不抽象，它从课堂、训练场，猝然来到跟前。

对于只有几十个小时经历的飞行员，的确是勉为其难！

6架米格机，6双眼睛上下左右张望，6双手拉杆蹬舵紧忙着和眼配合。战区。

“你们已和敌机接触。”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右侧发现敌机两架。”随着三号飞机的报告，李汉也在右下77方发现了敌机。此时，20架骄横的F—84喷气战斗轰炸机正兜着圈子，肆无忌惮地对清川大桥进行轰炸扫射。看着大桥周围冒起的缕缕浓烟，李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大吼一声：“攻击！”猛一推操纵杆，不顾一切地向敌机俯冲下去。

他太激动了，以致于动作过猛，“刷”地一下从敌机腹下冲过了头。

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慌了手脚，立即四下鼠窜，李汉敏捷地扭转机头，迅速咬住了右后方正在逃窜的两架敌机，他一按炮钮，对准敌人的长机“咚！咚！咚！”就是几炮，敌机像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斜斜地向南逃去。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是我人民军队第一次在空中与敌机交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这时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二百来小时，在喷气式战斗机上飞行的时间更短，仅15小时左右。面对敌有着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敌人，他们凭着高度政治觉悟和勇敢的战斗精神，不仅和帝国主义的第一流空军交锋了，而且夺得了胜利！

对于这次以少胜多的战斗，李汉并不满意，他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只注意了自己攻击，忽略了空中指挥。”他和战友们都盼望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机会来了。8天过后，也就是1951年1月29日，李汉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的战绩。

这天下午1点34分，16架敌机企图袭击安州车站和清川大桥。李汉奉命率领8架战鹰迎敌。

“——注意！敌机方向120度，距离80公里，高度6000米以下！”地面指挥员及时地发出指令。

“——明白！”李汉一边回答，一边思索着作战方案……

两个中队，一前一后，保持着整齐的阵容向战区疾进。高高低低的山峰，曲曲弯弯的河流在机翼下一一闪过。

78

6分钟后，耳机里再一次响起了地面指挥员急切的声音：“注意前方！”8名飞行员的视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仔细巡视着机身周围的每一个方位。

“——！左前方发现敌机，高度比我们低。”绰号“千里眼”的孙悦昆兴奋地叫起来。

这一次李汉没有忙于攻击。

2架……4架……8架……李汉清楚地看到分作两层的16架F—84。

敌人也发现了我机，开始向着太阳飞去，好狡猾的敌人，妄图想借阳光甩掉我机！李汉将计就计，继续前进，把敌机让到我机群的右下方。

“投副油箱！二中队掩护，一中队攻击！”随着攻击命令的下达，4架战鹰右转120度像4支银箭朝上层的8架敌机疾射而去。

遇到突然打击的美国飞机，七零八落地慌忙扔掉副油箱。4架敌机转头扑向我机。

“好小子，想打对头。”李汉一压机头，勇猛地迎上去。狭路相逢勇者胜。敌人胆怯了，相距还有1000多米，为首的敌机一个侧翻，急忙向右躲避。好！要的就是你来这一招。李汉敏捷地向左一侧，从敌机飞行弧线的内侧截了过去。

这时，另外4架飞机溜到李汉的后方，企图偷袭，我一中队另3架战鹰

立即扑了上去，吓得敌人慌忙掉头逃走了。

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李汉稳稳地把敌机套进了瞄准光环。600米、500米、400米，李汉猛地一按炮钮，一下子打出了40多发炮弹，敌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个跟头栽进了大海。

与此同时，又有8架飞机冲了上来。一直在高空担任掩护的副大队长李宪刚，立即带了二中队迎了上去“咚咚咚”一顿炮弹，吓得敌机仓皇向海上逃去。李汉率领机群追到海上，波光粼粼，将敌机黑乎乎的影子映得十分清楚。一架敌机正准备转弯逃走，李汉一带机头，瞄准敌机尾巴打出了一串炮弹，这个丑恶的家伙又被击中了。

喷气式飞机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朝鲜战场上首次大规模作战使用。我年轻的人民空军一开始就要面对强敌打一场现代化战争。初试锋芒，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3架，我无一损失，3:0的成绩，在人民空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朝鲜战争，开创了世界航空史上喷气式对喷气式的新时代，后来，有一个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说：

“我们费了很多功夫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共军用的究竟是什么战术？研究了很久，终于明白了，原来中共的空军没有战术！”

“这种没有战术的战术”美国空军想在空中模拟，但他们很快就明白，这种战术是无法效仿的。

美国远东空军对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术大加研究，似乎老行家遇到新问题，志愿军空军老虎嘴里敞了象牙，自己也吃了一惊。

人民空军蓝天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3 美国空军司令斯特莱梅耶的忧郁，失去了空中优势。忽如一夜强大起来的中国空军。

4 月的东京是樱花的世界。

顺治大楼沐浴在春光和鸟语花香中。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员斯特莱梅耶，用修长的手指习惯性地梳理着他那颇有学者风度的头发，一下接一下，不轻不重，很有节奏。

杯子里的水早凉了，吃药的时间已过，卫士不敢打扰他。

医生再三提醒他不宜情绪波动太大，他的心脏已经承受不了这种折磨。对此斯特莱梅耶自己也不清楚。他是个修养不错的人，温和，不易怒，对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充满信心。

进入 1951 年 1 月以后，他的情绪开始大幅度地升降。每次他的副手，远东空军副司令员，第 5 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将军走进顺治大楼，他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美国官方撰写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记载着这一时期的战况：

总之，无论天空还是地面上，一切迹象均表明：1951 年 4 月将成为朝鲜战争中决定命运的一个月，帕特里奇将军说从他自己这方面来考虑，在任何时候担心共军会发动一次全面的空中攻击。因此，他在 3 月 31 日向他属下所有的联队长警告说，“目前的世界紧张局势表明，我们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应付突然的空中攻击。”4 月上半月所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能使我们有乐观的理由。4 月 12 日在鸭绿江上空进行的空战中，米格飞行员显示了他们日益熟练的技术。在以后有几天里，F—86 的飞行员评论说，米格飞行员的技术正在提高。他们是积极主动的，并且有决心把飞到家门口的 F—86 打回去。他们表现出良好的训练素养，和日益提高的飞机编队技术。共军的飞行员在 4 月 16 日和 18 日的空战中，互相掩护得非常好，以致于 F—86 的飞行员未能击落任何敌机……

斯特莱梅耶伸手抓住两粒白色药片，吞了一口凉水，将药送下。电话铃响了，他未理。双手交叉抱臂，移步至窗前。

卫士知道斯特莱梅耶的习惯，他喜欢以这种姿式站在窗前俯视裕仁天皇宫里的庭院，现在庭院里所有的樱花都在怒放，深红、粉红、雪白、色彩斑斓形态各异婆婆娑娑在轻风中摇曳，从上面 81 望去，恰似悬浮在低空中的彩色云团，轻轻漫漫飘飘逸逸，偶尔一阵大风掠过，欢笑一般洒落一层花瓣儿，好不潇洒。

斯特莱梅耶没有为樱花动容，确切地说，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唐诗名句“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斯特莱梅耶没有看花的眼，他既在病中又在愁中。

朝鲜战场的严峻使白宫骚乱不安，杜鲁门总统和其他华盛顿要员在 3 月份便开始筹划朝鲜停火停战协定。麦克阿瑟对这种“绥靖主义”、“投降政策”愤怒至极。不管他本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决心要拆杜鲁门的台了。3 月 24 日，他发表了不同寻常的声明，他丝毫不加掩饰地说：“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战争限制在朝鲜的容忍态度，把军事作战行为扩大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的话，那必将会使赤色中国面临极大的危险。”

这一声明使华盛顿大为吃惊。麦克阿瑟公然的反抗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

同一月里，麦克阿瑟又点燃了另一枚炸弹的导火索。他在给约瑟夫·W·马

丁的复信中又一次叫嚣扩大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共产党，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而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我们必须赢，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代替的。”

麦克阿瑟又一次令世界震惊。

杜鲁门和华盛顿的军政官员再无法容忍麦克阿瑟这种病态的疯狂了，麦克阿瑟作为功勋军人的历史已经告终。4月11日，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指挥权。

斯特莱梅耶是深受麦克阿瑟器重的人，他和蔼谦逊的外表与麦克阿瑟是那么不同，而内心深处却有着与麦克阿瑟十分相似的傲慢和对功勋不惜任何代价的疯狂追求。朝鲜战场上，任何地面指挥官对远东空军的指责，或者是一些善意建议，都会在他那极具魅力的微笑后面，得到回敬。

82

眼下，时局纷乱多变，斯特莱梅耶脸上再没有微笑了，他立在窗前，就那么双手抱臂，看了几个钟头的樱花。

不久，美国空军不得不承认：“由于联合国飞机不能在朝鲜西北部与共军飞机在同等或近乎同等的地位上作战，因此远东空军便完全主动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然而，这种方针实际上是默认了共军在这个重要地区内拥有空中优势。这个地区的重要交通线目标没有遭到轰炸，共军的空军日益强大

联合国军从其所获得的一系列综合敌情报告中，最令人吃惊的一份是关于在中国及满洲日益壮大的空军总实力方面的报告。中国空军在1950年12月的时候，有650架作战飞机，以后每月都有增长，到1951年6月它即将拥有1050架作战飞机。每个月都有更多的后掠翼的米格—15战斗机交了货，因此，到1951年6月间，中国就将拥有445架这种第一线飞机。

联合国军从东京收到的其它情报得知：在大邱的第5航空队指挥所里注视着共产党空军的活动。虽然有一个分遣队的F—86于1月14日回到大邱，来试验它们攻击地面的能力，但是帕特里奇没有距鸭绿江很近的机场，以便使F—86能够重新进行反航空兵活动。去年12月，第5航空队曾经有一次请求远东空军派遣B—29去轰炸新义州机场，但是，远东空军暂时不考虑进行这样的轰炸。1月20日，帕特里奇请求詹姆斯·E·布里格斯准将派B—29去轰炸平壤，原轰炸指挥部司令欧唐奈耳已离任返国，布里格斯准将将于1月10日接替他担任该职务。布里格斯准将认为，只要第5航空队能派出战斗轰炸机去压制平壤的高射炮，轰炸机指挥部是愿意安排这次轰炸的。轰炸平壤的计划正在制订的过程中，艾舍里·B·派克德上校明显地提出了他所指挥的第27护航战斗机联队愿意去攻击新义州机场，第27联队打算派出8个F—84小队，每一架飞机都装载大量的弹药，但外部不带炸弹或火箭，83两个小分队去俯冲扫射新义州机场，而其它小分队则在上方担任高空掩护，第5航空队批准第27联队于1月23日执行此任务，轰炸机指挥部也预定在这一天出动轰炸平壤。

1月23日清晨，平壤的天空霞光灿烂。第27护航战斗机联队的30架F—84型雷电喷气式战斗机从大邱的钢板跑道上起飞，编成战斗队形向北飞去。当F—84到达新义州上空时，F—84飞机与30架米格机进行了30分钟激烈的空战。结果2架飞机被打下去了。远东空军希望能够在朝鲜西北部所保持的空中优势的程度日益减弱。截此，帕特里奇将军打算将他的喷气式飞

机联队撤出朝鲜。所以第 5 航空队转场到日本的计划继续进行，而且第 49 联队于 1 月 26 日撤至日本筑城，但在大邱仍然留下一个加油挂弹分遣队，为临时驻在该地执行战斗任务的 F—80 飞机服务。在 1 月底以前，派克德上校将所有第 27 联队的部队全部从大邱撤走，把 F—84 飞机集中在板付。第 5 航空队所有喷气机都疏散到日本南部以后，不得不通知远东空军说，要想在朝鲜最西部活动的 B—29 进行护航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2 月间，第 5 航空队在一般的情况下避免在朝鲜西北部进行空战。志愿军的飞行员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地区内占了几乎是绝对统治地位，第 5 航空队的人把这个地区称为“米格走廊”，这一名称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一直被沿用着。尽管如此，RF—80 型照像侦察机还是继续有时单独地在 RF—80 的护送下冲到鸭绿江地区，拍摄中国共产党空军活动的照片，但是，在 2 月份当中，至少有四次活动的结果是悲惨的，侦察机遇到了米格机群的攻击。每一次，那些侦察机飞行员都仅仅是幸免于被米格击落。由于采取了谨慎的战术，再加上所发现的米格式飞机中实际上只有四分之一左右企图攻击他们，这才使得远东空军在 2 月份的空战中并没有遭到重大损失。

斯特莱梅耶吸了一口凉爽的空气，四周很静，这正好有利于 84 他的思维，那个令他头疼的问题又浮在他的眼前。

由于在 2 月间联合国军飞机不能在朝鲜西北部与共军飞机在近乎同等的地位上作战，因此远东空军便完全主动地尽量避免使其部队进入被称为“米格走廊”的地区。然而，这种方针实际上是默认人民志愿军在这个重要地区内拥有空中优势。这个地区重要交通线目标没有遭到轰炸，志愿军的空军也日益强大。为了朝鲜西北部能够重新进行空战，第 5 航空队必须将其喷气式战斗机调回朝鲜，而且最好驻到原来的水原和金浦基地。水原机场破坏得太厉害了，以至不能作为 F—86 的临时性基地。虽然 F—86 于 2 月 22 日从大邱起飞开始了空中战斗巡逻活动，但是，到此刻为止他们还不能飞到比平壤更北的地方。

布里格斯准将急于重新恢复对朝鲜西北部的桥梁目标实施轰炸，因此他规定轰炸机指挥部的第 98 轰炸机大队在 3 月 1 日轰炸米格走廊内的目标，由第 5 航空队派出 22 架 F—80 为轰炸机护航。3 月 1 日早晨，担任护航的 F—80 准时到达了预定的会合点，但是，从日本起飞的 18 架 B—29 遇上了事先未料到的逆风，因此到达会合点的时间过晚，F—80 不久就不得不放弃护航返回基地。这样一来，B—29 就没有护航的飞机了。当他们向定州附近的高句宁桥梁目标投弹之后不久，就遭到 9 架米格截击机的攻击。B—29 当即改变为密集的防御队形开始返航，但它们毕竟不是高速喷气式飞机的对手。虽然 B—29 的射击员击落一架和击伤了两架志愿军的米格飞机，但是，那些勇敢善战的米格飞行员击伤了 B—29，其中有 3 架伤得很厉害，以致于不得不在南朝鲜作紧急着陆。当第 5 航空队的军官们看到那些受了伤的 B—29 摇摇晃晃地在大邱着陆的情景时，他们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期在朝鲜西北部重新获得空中优势。

截至 3 月的第一个星期为止，水原机场还只不过是一条浸在一片泥泞里布满弹坑的混凝土跑道而已。由于没有滑行道，因此 85 当其他飞机正着陆时，F—86 飞机不得不也在跑道上滑回来。又由于没有被破坏的使用跑蹊过于狭窄，所以 F—86 就必须一个跟着一个地着陆，这样后面的飞机就有进入前面飞机的喷气流的危险。情况虽然如此，但是战术形势要求 F—86 进驻水

原，而它们也就这样做了。3月6日，第334中队开始以水原为中途机场飞往鸭绿江一带进行巡逻。4天以后，在水原修好了少量的停机坪并搭起了一些帐篷，第334中队就转场到了水原。此时，第336中队也从日本来到大邱，每一天都把F—86临时飞往水原参加鸭绿江的巡逻活动。

虽然第4联队在F—86恢复了在鸭绿江地区的巡逻，但是，它们一般都是在对敌机有利的情况下被迫投入战斗的。

3月末，规模巨大的、决定谁将占有朝鲜西北部天空的空中战斗正在酝酿之中。虽然对这些目标的轰炸因鸭绿江的封冻而延期执行，但是，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仍然要负责破坏几个横跨鸭绿江的大桥。在这些桥梁中，新义州的鸭绿江桥最为重要，它完全处于以安东为基地的米格式飞机的保护之下。如果速度慢而且易受到攻击的B—29要想在强大的空中抗击力量的面前能够成功地进行轰炸，那么B—29就需要第5航空队所能提供的最强大的兵力来进行掩护和护航。

夜色渐渐地暗下来，斯特莱梅耶感到心头很沉重，他怎么也想不通，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间就成了世界空中强国。86

4 杜鲁门发布命令。梦醒的麦克阿瑟说：珍妮，我们要回家了。志愿军空军调兵遣将，提高实战能力。

寒冷的冬天刚刚过去，被烟火熏得焦黑的柳树就顽强地抽出了嫩芽，炮火翻起的土地上，星星点点的绿草悠然而出，1951年的春天就这样悄悄地来到了朝鲜半岛。

历史极富于戏剧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查尔斯陆军上校——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在地图上选中了北纬38度线作为苏、美两军进兵朝鲜的军事分界线。数年之后，朝鲜半岛又一次爆发了战争，从而使得三八线附近这片地区再度成为世人目光集中的焦点。

朝鲜是个多山的国家，起伏不平丛林山地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矿洞。位于三八线以南不远的金化同样也有不少的矿洞。1951年4月6日，在金化的金矿洞，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召开了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着重研究和决定举行第五次战役的问题。

此时正值第四次战役的后期，志愿军继续以积极的运动防御，抵抗敌人的进攻；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新入朝的第二批部队（第19、第3、第9兵团）开进和展开。敌军连续作战已有两个多月，在顽强的防御面前，敌伤亡惨重，部队疲惫不堪，其地面部队进攻的势头越来越弱。但与此同时，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也相继传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到朝鲜战场的东线进行视察；敌海军加强了对我元山、新浦、清津等港口的封锁，并进行侦察活动；敌空军则对后方交通、物资屯积地、部队集结地域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敌拟将其在美国本土的2个师（国民警卫第40、第45师）调赴日本，准备用于朝鲜战场，在日本受训的南朝鲜的3个师已装备机械化，正加紧操练，退居台湾的蒋介石的军队也不甘落后，扬言要出兵朝鲜……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敌人正进行着某种准备，很有可能在我东海岸实施一场大规模的登陆行动！

早在1951年2月，志愿军为改变战场态势，已开始考虑新的大规模反击作战的设想，并进行了准备。当时的意图是：在敌人地面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我军暂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如敌大肆进攻，逼我应战，毛泽东主席在他3月1日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中讲得很明确：“……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批志愿部队9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在该电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在当时条件下，我军欲实施一场大规模歼敌的反击战役，将会遇到不少的困难，这个主要是因敌我技术装备上存在的悬殊差距而造成的，美军的一个师就有476门火炮，而我志愿军一个军的火炮才有198门，火力对比上我处绝对劣势；我军开进主要靠徒步行军，敌军则拥有大量的汽车和坦克，其机动性能也优于我，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后勤，虽然我大力加强了后勤保障力量，但随着战线的延长，参战部队的增多，运输落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三八线南北地区因敌我多次争夺，居民逃散，已形成无粮区，所以我进攻的部队仍要靠随身携带的粮弹来供应，因而只能保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此即敌人称为“礼拜攻势”的缘由；另外，我军人朝的部队虽士气高昂，但对地形不熟，与美军作战也缺乏经验。上述的这些困难和不足，如果不加以克服和弥补，将会大大增加我歼敌和达成战役目的的难度。

在志愿军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首先发言，他介绍了前四次战役入朝部队作战情况。

接着是彭德怀司令员的话。在谈到入朝以来对敌作战的基本经验时，彭德怀竖起两根手指头：“我们的经验教训有两条：在军事上，证明我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固守防御是困难的，积极运动防御中必须的。在政治方面说明，抗美援朝战争是长期的，以为突破了三八线，取得汉城后，即可一帆风顺地结束朝鲜战争，是一种幻想。”

彭德怀接着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指示。在分析战场形势时，彭德怀着重指出：敌人越过三八线后，在我军侧后实施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日益明显。因此，我军必须先敌发起进攻，以破坏其登陆计划，避免两面作战。讲到此，彭德怀环视了一周，对在座的几位兵团司令说：“这个仗怎么打，大家可以畅抒己见嘛。”

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杜义德等，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表示赞同彭德怀司令员的意见。大家信心十足地谈到，第三、四次战役时，我志愿军只有六七个军，还打了胜仗。这次增加到14个军，炮兵由4个师增加到11个师，工兵增加到19个团，还有4个坦克团第一次参战，志愿军的兵力成倍地增加，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完全有能力打一个胜仗。

在彭德怀的主持下，会议确定了我军实施反击战役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几个师，粉碎敌人的计划，夺取主动权”，实施反击的主要地域为西线汶山至春川间。会议对战役的打法和战役的准备工作作了具体的布置。

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和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也在会上发言，分别谈了关于战役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最后，彭德怀又一次强调：后勤工作再三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东线5个军的粮食供应。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4月10日，彭德怀把志愿军党委对第五次战役的设想和部署电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

4月13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同意，并作如下建议：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我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及其附近，确保元山。

随即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关于第五次战役指导与战术思想的指示》，我军上下动员，进行着紧张的战役准备工作。至4月中旬，在朝的志愿军已有14个军，其中第一线有11个军，加上人民军第一线的4个军团，我方第一线总兵力已达70万人。

正当我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战役准备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4月6日星期五那天，杜鲁门把马歇尔·布雷德利、艾奇逊和哈里曼召集到白宫，开会讨论有关麦克阿瑟的问题。杜鲁门显露出已作出解除将军职务的迹象，他首先询问与会者的意见。

“总统先生。”哈里曼说，“这个问题你去年8月就遇到了。你当时曾决定早些时候再解决的。”

马歇尔告诫总统，要谨慎从事，特别是国会正在讨论军事拨款问题，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作法，很可能对国会的讨论起到反作用。布雷德利同意马歇尔的意见。他对“麦克阿瑟”是否“真的违反军规，做了不服从军令的

事”深表怀疑。他建议慢慢来，他希望“能有时间进行思考，并与参谋长们讨论这个问题。”

尽管艾奇逊认为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但是他还是赞同布雷德利意见。“如果你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艾奇逊说：“您这届政府将面临着一场恶战。”

杜鲁门说：“让我再好好想一想。”

当天下午，4位顾问聚在马歇尔的办公室，讨论了两个小时，马歇尔建议大家给麦克阿瑟家打电话。进行磋商。其他人坚决反对，马歇尔最后收回了他的建议。

那天晚上，杜鲁门的情绪仍然非常激动。“麦克阿瑟通过乔·马丁又投掷了一颗政治炸弹。”他日记中写道：“这看上去像是让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了。我已经决定，必须免去我们驻远东的司令官。”

次日清晨8时50分，4位顾问又与总统会面。他们建议总统把采取行动的时间推迟到下一个星期一，到那时，乔·柯林斯就回来了，杜鲁门不情愿地赞同了他们的意见，但是过后不久，布雷德利便产生了疑虑：“作为总统和总司令，杜鲁门制定我们进行朝鲜战争的政策。而麦克阿瑟对他进行公开的、对抗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一个谁对谁错的问题。”

当天下午，布雷德利召集参谋长联席会议。他通报了总统正考虑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情况。并且希望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不太情愿，但还是一致赞同，应该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当天下午4时，一群表情悲痛而庄重的官员来到马歇尔的办公室，向他汇报讨论结果。作为一名当事人来讨论罢免一位杰出的军官的职务的滋味并不好受。每个人都发表了各自的意见。第二天应向杜鲁门汇报参谋长联席会议所达成的一致意见。

星期一早晨，在总统与他的主要顾问召开的会议上，布雷德利转达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曾认为应重新处理办法的哈里曼和艾奇逊，这时也认为应该解除将军职务。杜鲁门这时才透露，早在几天前他作出决定，一定要免去麦克阿瑟。那么谁来接替麦克阿瑟呢？

布雷德利说，他和柯林斯已经推荐李奇微为接替这一职务的必然入选。他们认为，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应接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杜鲁门对这个人选表示赞同。

就在人们对麦克阿瑟的命运作出决定时，他正在向难得能有一周休假的阿尔蒙德告别。他看上去郁郁不乐。“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那么，再见吧，内德，我已经陷入政治纠纷之中了，很有可能会被总统解职。”

阿尔蒙德，这位麦克阿瑟的真正崇拜者，不相信他说的话。“噢，将军，我认为那样做是荒谬的，我不信总统采取那种极端的行动。”

次日下午3时，4位首席顾问又与总统会面，杜鲁门同意让当时呆在朝鲜的国防部部长弗兰克·佩斯立即回到东京，当面向麦克阿瑟转达解职命令的建议。这样做，可以使得他避免由军方渠道直接传达命令而带来的难堪。让穆乔大使转给佩斯的电报已经拟好，并拍发出去了。

不凑巧的事，《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电台的一位记者给该报社拍回电报，说根据权威渠道的秘密消息，麦克阿瑟将要被解职。艾奇逊对《芝加哥论坛报》得到秘密消息一事不以为然，但是其他顾问们却对此事极为关注。担心麦克阿瑟对杜鲁门进行反击，并提出辞职。他们决定立即向麦克阿瑟传达这一项命令，同时决定于星期日凌晨1时召开前所未有的记者招待会。一

份公告也匆匆忙忙地拟好了：

我非常遗憾地得出结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已经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着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制订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职责，我已决定，必须撤换远东司令官。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任命马修·B·D·李奇微陆军中将为他的继任者。

不久，这一消息就通过新闻广播传到东京。在东京。麦克阿瑟正在午餐上款待客人。大家正在安静地进餐，突然，麦克阿瑟夫人发现麦克阿瑟的助手西德尼·赫夫站在门口，她朝赫夫走过去。当赫夫告诉她从收音机中听到的消息时，她的眼中充满泪水。

麦克阿瑟夫人走到桌边，拍了拍丈夫的肩膀。她悄声告诉麦克阿瑟这一消息时，声音轻得连同桌就餐的人都听不到。一时间，92 他的面孔呆滞了，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抬起头来望着他的妻子，温柔地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啦。”

他继续与来宾交谈着，仿佛未曾发生任何事情。当客人们离开后，他打电话给惠特尼：“考特，听说那件新闻了吗？”

在惠特尼听来，麦克阿瑟好像正在谈论一场重要的足球赛。

“是的将军，我马上就到。”在去使馆的路上，惠特尼费尽心机冥思苦想，他应该或能够说些什么。当他们见面时，他能够做的就是紧紧地握着麦克阿瑟的手，说：“将军，我可以肯定，结局会好的。”

但是，令惠特尼诧异的是，麦克阿瑟只想讨论当自己离任后，惠特尼会面临什么局面。“为什么？将军，”惠特尼以略带怀疑的口吻打断麦克阿瑟：“我陪你来到日本，我当然要陪你离开日本啦。”

“但是，考特，”将军平静地回答：“我积极服役的年头，足足以符合退休法定年限了，只需国防部批准。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今晚提出退休申请，是不会遭到政府的反对的。”

惠特尼对像秃鹫般聚在一起的记者们说：“我刚刚从将军那里来，他庄重地接受了解职令……我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刻。”

美国驻日本大使威廉·西博尔德是在参加日本首相吉田茂举办的花园宴会时听到这一消息的。吉田茂把他叫到一旁，问道：“你能证实这条消息是真实的吗？”西博尔德说，他没有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之后，西博尔德回到吉田茂的官邸，并在楼上的书房受到首相的接见，日本首相这时已换上和服。西博尔德想身为日本政府首脑的日本首相这样做，是为自己增添几分威严。西博尔德说，他希望首相和他的内阁不会为抗议罢免麦克阿瑟而辞职——这位大使知道，这是日本人一贯姿态，特别是考虑到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关系密切，所以他才这样讲。吉田茂看得出 93 明显地受到震惊，最后终于同意不辞职。

西博尔德来到第一大厦。麦克阿瑟将军面带礼节性的微笑接见了。西博尔德既紧张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顺着他的面颊滚下，在沉默了难以忍受的片刻之后，大使艰难地说：“将军，在处理这类事情方面，你是一个远比我出色的战士。”

“在陆军服役了 52 年之后竟会受到这种公开的侮辱。”麦克阿瑟忧郁地答道。他补充说，如果杜鲁门事先暗示要他辞职，他本人就会不加反对就退休了。在西博尔德看来，很显然，麦克阿瑟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也可能是暂

时被击败。“看着他，听着他讲话，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一次会晤。”

西博尔德问将军是不是会让日本人支持李奇微并与他合作。当麦克阿瑟说他不会那样做时，西博尔德请求他重新考虑一下。“日本的现状，对您来说，毕竟是个不朽的功绩，我希望应尽一切努力保持这一功绩。”

麦克阿瑟没有发表意见，但是他又重新评论说，罢免他是华盛顿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阴谋最终将瓦解美国在远东的地位，他否认曾有过不服从华盛顿命令的行为。

预定陆续参战的志愿军空军，有歼击、轰炸、强击等机种。为了实施统一指挥，1950年11月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11月4日，刘亚楼和刘震在北京进行商谈。他们认为，空军打仗是一个新鲜事物，但是只要努力学习，不但组建空军部队，组织空军部队进行训练这套可以学到手，而且也一定能够学会指挥空军打仗。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而且最好抽调整套的比较成熟的建制机构来担任。但是由于当时空军尚处在初建时期，军区空军以上的领导机构还不健全，不具备由一个单位组成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条件，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解决。于是确定以空军领导机关抽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94员为主，东北军区空军机关抽调干部和工作人员为辅，并从其他各军区空军机关抽调部分人员共同组成，奉调人员到齐后，刘震立即组织他们分别在东北军区空军各业务部门进行业务学习，并有计划地按照组织计划空军作战行动的要求，进行图上作业和实兵演习训练，使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初步掌握了作战指挥业务。

1951年3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在辽宁安东宣告成立。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受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双重领导。

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除司令部、政治部外，还设有工程部和后勤部。工程部部长为金生，政治委员为盛翼联，后勤部部长为杨尚儒，政治委员为李雪炎。志愿军空军航空工程和后勤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东北军区空军工程部和后勤部兼负。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成立后，以战斗姿态开展了作战指挥活动。一方面，抓紧熟悉即将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情况及朝鲜战场和美国空军的情况，拟定作战方案，并在作战地区部署雷达站和辅助引导站。另一方面，将指挥系统的各类人员、各种电台迅速组织起来，进行严密分工，明确职责范围，进行图上作业训练，并与航空部队的飞行训练相结合进行战术演习，使大家更好地掌握空军作战指挥的方法和要领。各业务部门也根据战时工作的需要，明确各自的任务，沟通上下左右之间的联系。

当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和保障部门具备了对参战部队实行全面领导和指挥作战的能力之后，从1951年4月25日起，参战各师的战斗训练即由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完全负责。从此，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担负起对参战部队全面领导的责任。

由于志愿军空军部队是很短的时间内陆续组建起来的，训练进度参差不齐，多数部队连一些战斗需要的课目还没有飞过，尚不具备作战的能力。为了加速部队的技术战术训练，争取在短期内达到参战水平，空军司令部于1951年1月16日召开了战斗训练会议，会议确定，以3月底完成参战准备为目标，抓住参战必要的重点课目进行突击训练，在两个半月内达到参战水

平。歼击机部队重点进行特技、编队、航行和双、四机空战训练，并练习战术协同，轰炸机部队在完成大队基本战斗训练之后，进行团编队轰炸训练，并选择部队技术好的飞行员进行夜间单机轰炸训练，强击机部队在完成大队基本战斗训练之后，重点进行中、大队的中低空编队，航行和对地面战术目标的攻击、轰炸训练。为完成计划，早日参战，各部队投入了紧张的训练，每个飞行日，飞行员一般飞行二三小时。地勤人员经常工作到深夜，以保证不误飞机出勤。这样，经过两个半月的突击训练，基本上完成了预定的训练计划。

在部队战斗技术有了初步基础之后，为适应作战任务的要求，又加强了战术训练。1951年4月8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召开了参战各师领导干部会议，根据各机种的使命、性能、数量、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研究制定也以战术训练为重点的战斗训练计划。要求在战斗训练中，注意练习迅速起飞集合、解散着陆和编队战术协同动作。会后，各部队积极组织实施，于4月底即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

在此期间，志愿军空军司令部还组织第4师参加实战演飞的飞行员，到各部队巡回讲课，介绍了出航、搜索、占位、攻击、特别是如何正确使用瞄准具进行瞄准射击等方面的实战经验。与此同时，针对机务人员技术不熟练，缺乏战时机务维护工作经验的情况，抓紧了机务人员的技术学习和战斗演练。各参战部队组织机务人员学习发现、判断和排除故障、野战外场作业和野外修理等技术。根据战时机务工作特点，把安装副油箱、快速装退炮弹、装挂炸弹。防空疏散、抢救战伤飞机、再次准备飞机、夜间维修作业等，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组织机务人员反复进行了演练。经96次突击学习和演练，机务人员的外场维护、修理技术及战斗保障能力得到了提高。各项维护工作时间平均缩短了三分之二。大部分部队在夜间可以同昼间一样地按时准备飞机。

1951年4月25日至28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于沈阳东陵组织了一次由参战部队飞行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试验性演习。演习课题是“空军集团军在进攻战役中的战斗行动”。演飞的目的是：考核各级指挥员、指挥机构的作战指挥能力和参战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由于没有经验，初次演习效果不好。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再次进行了准备。5月28日到6月16日，在沈阳、安东、辽阳之间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各种联合飞行战术演习。参加演习的部队有第3、4歼击师，第5强击师和第8轰炸师，共有飞机180余架。演习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各级司令部为首长准备定下决心的资料，实施指挥所转移；第二阶段，袭击敌方机场；第三阶段，抗击敌轰炸机群对重要目标的袭击；第四阶段，配合地面部队歼击被围之敌。演习历时19天，共出动飞机307架次。演习证明，各级指挥员已能在简单情况下指挥2至3批飞机起飞作战；雷达观测员能同时掌握4批飞机活动情况；航空兵部队再次起飞准备时间大大缩短；飞行员掌握了一些编队协同作战的方法，能注意利用云层、地形等条件隐蔽出航；对地面目标和空中目标的搜索识别能力有所提高，强击机能及时发现和辨别清楚需要攻击的目标，轰炸机能准时到达预定空域对目标实施突击。这是志愿军空军大批部队参战前的一次实兵演习，也是对志愿军空军战斗力的一次实际检阅。

在志愿军空军入朝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抢修机场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一个最大的难题。1950年12月中旬，空军首长派空军后勤

部政治委员杨尚儒率领部分技术干部先行入朝，勘察了解机场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实地勘察，杨尚儒等人于1951年1月回国。在向空军首长汇报情况以后，初步确定了修建97机场的位置。当时确定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的原则是：（一）充分利用原有旧机场，按野战机场标准修建。（二）普通机场只填补弹坑，碾压跑道，增修油库、掩体。（三）适当照顾到战线向前推进时能继续使用，各机场之间便于互相掩护与协同。（四）场址不过濒海。（五）能够就地取材，运输方便。总之，要尽可能减少工程量，以达到迅速建成的目的。

由于修建机场在材料、人力、工具等措及运输方面的困难，以及正处冬季尚未开冻等原因。不可能做到所有机场同时动工，中央军委确定采取逐步推进的方针经与朝方共同商定，第一步先在平壤以北，安州以南地域新建4个可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其中2个为水泥混凝土跑道，2个铺设钢板跑道；在平壤以南地区修建2个喷气式飞机的机场，均为水泥混凝土跑道。此外，补修8个旧机场，作为普通机场使用。其他机场则待第二步或第三步修建。

1951年3月初，中朝双方对如何抢修这批机场作了明确分工，平壤以北地区的4个机场，即水泥混凝土跑道有顺川、顺安机场，板跑道的永柔、南阳机场，由朝方负责修建。补修8个旧机场中的平康、新幕、沙里院等3个机场由中方负责，其余由朝方负责。

中方机场修建工作，以担任主要施工的陆军部队为主，空军及朝方派人参加，组成机场修建司令部或修建委员会负责。所有派往机场担任修建任务的部队和担负防空排斥任务的高射炮兵部队等，统归机场修建司令部或修建委员会领导。

在明确修建分工和组织领导形式以后，即迅速筹划人力、物力，抓紧时间抢修，由中方负责修建的4个机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从国内抽调陆军第47军负责，并成立了机场修建司令部。由第47军军长曹里怀任司令员，朝方派出的监工代表任副司令员，杨尚儒任参谋长。所需人力，开始从候补新兵中抽调2.3万人。由于人力不足，进度迟缓，后又调5.8万人加强。所需工程98机械，由铁道部工程队251人携带各种机械102部，负责修建顺川机场，由交通部工程队206人携带各种机械98部，负责修建顺安机场，由东北修建委员会2个工程队613人携带各种机械31部，负责修建永柔、南阳里机场。同时，从国内抽调2个活动站台，分设于肃川、渔波，负责卸装重型机械材料，从中南、华东军区抽调工兵第18团和第321团，负责铺设轻便铁道直达机场，以弥补汽车运输的不足。对安东到平壤沿线的铁路、桥梁、车站都加强了高射炮兵的部署，各施工机场均有高射炮兵部队担任对空掩护。在人员、设备到达后，相继于1951年3月下旬开始动工修建。经过两个月的昼夜抢修，到5月底，除顺川机场外，其他三个机场基本完成。6月初，第47军调前方执行战斗任务，未完工程改由第67军所属部队接替；6月27日第67军部队归建，又改为第50军军部及第149、150师担任。经第50军抢修，顺川机场于7月23日竣工，其他机场收尾工程亦于8月23日全部完成。

由朝方负责修的美林、平壤大街机场，除中方调东北军区空军部队第4、5工程大队和华东军区空军第1工程大队参加外，均由朝方部队、民工修建。3月下旬开工，5月底竣工。

8个旧机场填补弹坑、碾压跑道及一些附属工程，亦全部于5月份完成。

上述6个供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完工后，因这些机场距中国境内安东机场网过近，部队进驻后不易策应，为了朝鲜作战机场与安东一线机场能够互相支援，1951年8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在平壤以北安州地区第二批增修泰川、南市、院里3个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限定10月完工，争取供志愿军空军11月入朝作战使用。

第二批增修3个机场的任务，从国内调陆军第23兵团负责。由兵团司令员董其武任机场修建委员会主任，姚任政委，高克林、杨尚儒任副主任。除23兵团外，担任施工的还有参加修建第99一批机场的铁道部、交通部、东北修建委员会的4个工程队和工兵等18个团，以及从西南军区调来的3个补训团。从9月18日开始施工，到10月29日即全部完成水泥混凝土跑道等修建工程。

在朝鲜境内抢修机场十分艰苦。当机场修建工程展开后，美军很快察觉到志愿军空军有入朝作战的意图，遂对施工各机场有计划地进行周期轰炸。当机场接近完成时就进行集体轰炸，尔后再以较小兵力持续不断地进行骚扰破坏。《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空军》这书记载着当时的情景：“有一次，一个从米格走廊返航的F—86小队在平壤俯冲来并扫射了在该机场上的共军修建工人，在完全没有遇到空中抗击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远东空军飞行员们认为，攻击机场非常像射击不动靶子一样。虽然共军在耐心地不断地修复机场，但是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工作也进行得极为顺利。”

透过岁月的烟云，我们可以想像得出当年志愿军空军怎样渡过这段入朝作战前的准备阶段。而麦克阿瑟这段历史风云只想重演一次他在二战时的“英雄演义”，为自己的英雄形象再镀一层光辉，但就作战对象来说，他已时过境迁了。第七章 长空搏击

1 威兰就职时说：远东空军现在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证明其威力。李奇微的厚望与远东空军的蓝图。

朝鲜前线。远处不时隐隐传来炮声。联合国军刚刚任命的总司令李奇微正陪同陆军部长佩斯在前线视察，正是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当天上午，那时，由新闻界播发的杠鲁门声明尚未传入二人耳中，由于第8集团军已抵三八线附近，李奇微的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神色。尽管他所策划的这次“撕裂者行动”主要目的是在于俘虏和消灭中朝军队的有生力量，但是中朝军队迅速北撤，只实施了阻滞战斗，使他发动的这次攻击作战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然而，在他的指挥下，第8集团军毕竟收复了汉城，进抵三八线。要知道，这一切正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东京方面反复商讨何时将第8集团军撤出朝鲜半岛的困难形势下所开始进行的，这一奇迹当然要记在李奇微的名下喽！

李奇微常常表现出雄心勃勃的样子，也有几分当官的派头，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此刻已经是联合国军总司令了。

事情是这样的：李奇微和佩斯从936野战炮兵营视察回来后，又坐在陆军师的指挥部听取汇报时，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馆派专使赶来，亲手递交给佩斯部长一封信。那是马歇尔的亲笔信，信中要佩斯不要执行先前发给他的前往东京会见麦克阿瑟的指令，而要他将麦克阿瑟被撤职一事告知李奇微，由李奇微继任麦克阿瑟原职，立即赴任。

这天降的喜讯犹如室外风雨交加，雷电轰鸣，使李奇微不知所措。

“麦克阿瑟被撤职了！”佩斯告诉李奇微，“刚刚接到的消息，您现在已经是太平洋地区盟军最高司令官了……”

佩斯的惊喜怎么也扭转不了李奇微脑海中的现实。

“真难以置信，难以置信……”李奇微失声道，“总统为什么要这么干？”

最后，二人从最初的震惊后冷静下来。李奇微让佩斯谈谈他对此事的看法。佩斯耸耸肩伸出双手说道：“还不明白吗？3月24日，麦发表了那样一个声明——总统的政策是在朝鲜打‘有限战争’。而他却要彻底战胜中国……”

从麦克阿瑟的遭遇里李奇微得到了警醒。

“通过空军轰炸满洲工业基础来迫使中共屈服，这是麦的想法，其实，这是办不到的。布莱德雷压根儿就不相信中国的工业基础那么容易被摧毁。而且，那样会使我们的空军消耗殆尽。如果使用原子弹，牺牲者将数以百万计。况且，除非我们炸毁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否则，中国军队照样可以通过那条铁路接受苏联的军事补给。而炸毁西伯利亚铁路等于同苏联开战，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力，还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很难说我们的盟国能否跟着我们干……”

“按总统的意志干吧，马修。”佩斯这样告诫李奇微。

李奇微连连点头，二人心领神会的交谈着，几乎忘了大雨的降临……

麦克阿瑟被撤职的当天晚上，李奇微就飞到东京走马上任。

李奇微到达东京的当天夜里，立即驱车前往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官邸进行礼节性的看望。那时，麦克阿瑟已从当日最初得知这一消息的打击下恢复了常态，他把这么复杂的难言之苦，归结成一句幽默的话，对妻子珍妮说：“珍妮，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此时，麦克阿瑟十分镇静而有礼貌地接待了李奇微。

李奇微端坐在麦克阿瑟的对面，静静地倾听麦的陈诉：

“……有一位著名的医生告诉我，他从总统私人医生那里得知，杜鲁门患有严重的高血压。思想上的糊涂和混乱是他那严重病情所表现的典型特征。正由于此，他一会儿写信，骂海军陆战队是海军警察，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一会儿又给音乐评论家写信，辱骂对方。杜鲁门的女儿搞了一个演唱会，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对他的女儿的演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杜鲁门为此匿名写信给保罗·休姆说：‘我刚才读了藏在次要版面上你所写的卑鄙下流的评论，看来你好像一个从来就一无所成的倒霉的老头儿，一个全身长着八个烂疮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你，如果见到了，就需要一个新的鼻子和许多生牛排，或许下面还要一个护裆三角带……’看看，这就是我们美国的总统。你看，杜鲁门竟然愚蠢到用印有白宫字样的信笺写这匿名信，结果惹得保罗·休姆拿着这封信到处张扬，还登在了《华盛顿每日新闻》上。不久，白宫承认了这封信是杜鲁门写的。看，杜鲁门就是这样的人……”

麦克阿瑟向李奇微评论杜鲁门，脸上露出蔑视的表情，最后又补充说：

“据医生讲，杜鲁门活不过6个月了。”

李奇微对这话题显然不愿插嘴，等麦克阿瑟说完，他才引转话题，问道：

“回国以后，您有什么打算呢？”

“我离开美国15年了，想回纽约定居。从30年代以来，我就再没有去过纽约……”说到这里，麦克阿瑟向李奇微暗示，他已经接到各种邀请，“有一封邀请信提出给我15万美元，另一封邀请则提出付给30万美元，撰写50分钟演讲稿，大闹一番……还有一封邀请信提出给100万美元……”

“祝您回国后一切顺利，”告别时李奇微说，“您作为我的老上级和伟大的军事家，将永远赢得我本人的尊敬。”

几天以后——4月16日，李奇微为麦克阿瑟在厚木机场举行了一个虽然简短但却隆重的告别仪式。由士兵组成的乐队和仪仗队整齐列队站立。麦克阿瑟的高级军事指挥官——马修·李奇微、海军中将乔治和空军司令斯特莱梅那将军及他们的夫人们，还有外交使团及日本国会的成员们静静站立一旁。早晨7点，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徐徐驶来，麦克阿瑟夫妇走下车。

在军乐中，麦克阿瑟检阅了仪仗队。他面孔呆滞地从年轻士兵的队列前大步跨过。此时，早已准备好的空军和海军喷气式飞机编组上空掠过，向麦克阿瑟致敬。按照惯例，他在结束这一仪式的检阅时，同仪仗队的指挥握了手，之后大步向等候在飞机旁的高级官员们走过来，同这些人一一握手，当他走到李奇微身边时，握着李奇微的手微笑着说：

“我希望当你离开东京时，你会成为美国陆军参谋长。如果我被允许选择我本人的继任者的话，我也会选上你的。”

“谢谢将军！”李奇微听到麦克阿瑟这告别时慷慨的话，非常感动。

麦克阿瑟和夫人走到舷梯顶端，最后向人群挥动手臂，又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将伤感的目光投向人群。这时候，麦克阿瑟忽然感到一阵怅惘：没想到，自己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事生涯竟是如此结束的……

飞机轰鸣着升入云空，很快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李奇微接替了麦克阿瑟的美国军队的指挥权。

李奇微同他前任司令官有着同样的习惯，常常飞出东京，亲临战斗前沿，在同志愿军打交道时，最令他头疼的是中国志愿军的军号。他这样和同事们说起这件事：“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轰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像足球赛巡

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这是一种中国人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

在萨马附近的第10军指挥所里，李奇微的身影走来走去，时而和指挥员交谈，时而展开作战地图点画着什么。他是在就任司令官要职一个月之后，飞往朝鲜战场的。时为1951年5月19日。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进行第五次战役。显然，李奇微的到来，是为了组织大规模的反击。

当天晚上，李奇微视察第5航空队，在指挥所里会见了帕特里奇。两个人的对话充满阴影。

李奇微本想问第5航空队的情况，但还未开口，帕特里奇就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不幸得很，斯特莱梅耶将军今天下午心脏病发作，抢救后送回美国了。”帕特里奇皱起眉头，又缓缓地说，“病情严重，看来短时间难以返回远东。”

实际上斯特莱梅耶这架老机器，是让朝鲜战争给折腾散了架子，这位远东空军司令回美国医院治病，而后疗养，而后退出现役，直到告别了远东空军。

李奇微不得不要求五角大楼立即派最优秀的军官来掌握远东空军的命运。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派出了奥托·P·威兰担当此任。他一向被称为“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空军少将。

威兰是个脾气怪诞，性格粗暴，却又极端多疑和敏感的人。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曾担任过斯特莱梅那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

有材料这样描述了奥托·P·威兰的为人和他的治军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兰是第19战术空军指挥部司令。这个指挥部曾同美国陆军第3集团军合作，创造了诸军种联合作战新范例。他具有丰富的战术空军的作战经验，他对远东空军存在的问题进行过透彻的分析。他甚至还批评总司令部实施的封锁交通线的战术‘好像是想在瀑布底下堵住溪流’。”

范登堡对威兰十分欣赏。

1951年6月10日，威兰住进东京顺治大楼。就职的当天，他不可一世地宣称：“远东空军现在才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来证明空中威力，除了担任支援的角色外，它还具有别的效能。”

威兰不加掩饰地表明他在斯特莱梅那之上：6月接任，7月便开始着手更换新式的F—86E型飞机，按照以一换一的方式，更换掉现有的F—86A型飞机。与此同时，动手修建金浦、水原、大邱、釜山、群山5个战术机场。8月中旬5个战术机场全部竣工，8月底威兰命令他的战术空军联队全部配置到这些“规模可观”的机场上。基地放在朝鲜本上，无疑是离轰炸的目标更近，更方便。他还一再以极强硬的态度要求范登堡派一个联队驻日本，调两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到朝鲜，他要彻底摧毁“米格走廊”了！

威兰对空军的认识比其他人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他说：

“通过空中突击以对付施加压力的这种方法，已被及时地承认为航空兵进攻的重要目的了。”把空中威力既看作是一种军事武器也看作是一种政治武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观点。美国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日本进行的战略轰炸活动，显示出美国空军在日本统治集团和日本国民中间造成了一种心理影响，其重要意义也许并不亚于对日本本上目标的攻击所造成的物

质上损失。日本基本上经受了 B—29 轰炸机一年时间的任意轰炸以后，长期积累起来的财富大有遭到全部摧毁的危险，因此，日本领导人在其本土尚未受到地面入侵之前便投降了。但是，由于对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因此掩盖了持久的战略轰炸的作用，使人们看不到持久的战略轰炸的效果是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早在 1945 年 8 月以前日本政府就一直在寻求结束战争的方法。

威兰的分析不无道理。在朝鲜战争期间，艾姆未特·欧唐少将就曾经希望用美国远东空军轰炸机指挥部的飞机来对北朝鲜进行一次严重的打击，并预先提出警告，告诉他们，他们做得太过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1950 年 9 月底，斯特莱梅那将军也曾经建议先发出警告，然后派出 B29 对平壤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轰炸，以摧毁该国的军事目标，并使摇摇欲坠的北朝鲜政府更注意地接受联合国的停战条件。可是，所有这些企图利用联合国军优势的空中威力在心理战方面所具有的特点的建议，都被华盛顿方面的命令拒绝了。欧唐奈耳将军曾非常确切地描述过在朝鲜使用空中威力所受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限制。他说：“显然，我们是在重重束缚之下进行战斗的。”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联合国军的空中力量主要是用于战术活动。它保持了空中优势，阻滞了敌人的运动，也为地面部队进行了密切支援。然而，也就是主观上认为正把空中力量用于支援地面作战的时候，事实证明对志愿军作战地带的后方进行了空中突击是阻止敌人发动攻势和削弱敌人地面作战能力的一种主要方法。事实又证明，一支兵力很小、大部分装备都低于核定标准的航空部队，对于敌军的人员和装备确实具有极大的摧毁力量。在朝鲜战争以前，一直没有把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and 他们的支援部队作为空军应予优先执行的一项任务，但是朝鲜战争中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优越方法。在这种新观点的激励下，斯特莱梅那将军在 1951 年 1 月 19 日曾请范登堡将军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空中力量已被证明为进行战争的主要的和最经济的手段了。斯特莱梅那将军指出，我们在朝鲜的空军已经能够有效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他认为，空军在朝鲜所显示出来的消灭敌人武装部队的的能力，在保卫世界上其它地区不受共产党侵略的斗争中将具有重大的价值，在空军有权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1951 年 6 月 10 日，威兰将军也提醒过范登堡将军说，空军已经显示了它“作为摧毁敌人作战机器的主要工具”。这时候，威兰将军要求应该把美国远东空军的摧毁能力提高到“这样一个水平，也就是可以使得人们对空军在最后击败当前敌人的斗争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不会怀疑的水平”。

2 毛泽东亲自挥笔：向空三师祝贺！王海、王海大队蜚声中外。

1951年5月，北京。

1日清晨，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鲜花、彩带、标语牌，欢欣鼓舞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二个“五·一”国际劳动节。

广场上，庄重竖立着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最惹人注目的是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战争的讽刺画。杜鲁门手持炸弹，口含匕首，一副魔鬼凶神的样子。10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汇成欢乐的海洋、力量的海洋。

上午10点，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这是一个象征和平的神圣之门，他在这里检阅“五·一”游行队伍。毛泽东的身体很好，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进行活动，从未停止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在这里他和他的顾问们一起已经将兵布置到三八线附近。

朝鲜战局又是如何呢？从朝鲜归来的波兰大使的报告中可知一切。报告中说：“朝鲜的现状十分可怕，据他的估计，有85%以上的北朝鲜房屋被毁坏，平壤成了一片废墟，人们生活在地洞、地窖之中，但是，北朝鲜人士气高昂，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战斗精神。所以，我满意地认为美国人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尤其是中国空军成为一个重要因素以后。”

那么，“一个重要因素”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由俄国的米格式飞机组成的空中“米格走廊”。

虽然第一次春季攻势受挫，毛泽东还是下达命令，进行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在5月的第一周，美国飞机报告说，在敌后发现了近4000部车辆，其中一半以上车头朝着南方。这一消息吓坏了范佛里特的情报处长詹姆斯·塔肯顿，他劝范佛里特取消了“狂暴作战”计划，并通知李奇微，在未来的72—96小时内，敌人将要发起攻击，参加进攻的兵力包括9个师的中国军队和三四个师的北朝鲜军队。大约有10个师的中朝军队随后发起第二次进攻，以增援主攻部队向汉城推进。范佛里特坚信，他的新防御线“无名线”坚不可摧。

李奇微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他看来，对美军发动这样两次进攻是自取灭亡。中国军队怎么可能翻山越岭，以那么长的补给线发动一场重大的军事进攻？事实上，李奇微错了，身经百战而不衰的毛泽东神机妙算，毛泽东打算在“无名线”上消灭阿尔蒙德的第10军，然后便挥师南下至原州，再折向西部的水原。这个计划比范佛里特和李奇微所料想的还要大胆。该计划一旦成功，那么，釜山将门户洞开。朝鲜战争的胜利就牢牢握在毛泽东的手中了。

有关资料这样记载了那次不同凡响的战斗：5月16日，天气阴沉沉的，满天乌云使得侦察机无法飞越前线进行侦察活动。整个下午，中国前线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派出了它的穿插部队，9个师的中国军队以及4个炮兵团被悄悄地部署在华川水库以东靠近杨口的地方，准备对韩国第5、7、9师发起主攻。

黄昏时下起雨来。几小时后，进攻开始了，中、朝军队约17.5万人发起冲锋，军号震天，炮火闪烁，当时，范佛里特准备迎击首次进攻，但不是在偏远的东部，他的防务重点在汉城前面的西部地区。不过，更为糟糕的是，

在东部有个军的指挥官为了防区管辖权的问题，刚刚经历了一场纠纷。韩国第5师和第7师占据了阿尔蒙德第10军的右翼，而其右邻是韩国第9师，该师属于刘载兴准将指挥的韩国第3集团。对9师来说，唯一的补给线是一条山路，这条山路在转回到韩国第3集团防线之前，有几英里的路线蜿蜒在第10军的防区内。韩国第7师的指挥官对这段短短的入侵线路并未提出异议，但是阿尔蒙德则不顾刘载兴的恳请，坚持要控制这一狭窄的地段，并且命令刘的一个营保卫山路所经过的那个向外出的地区，这条山路是一条退往其防线的道路。

那天夜晚，中国军队钻了这个在韩国7师和9师之间的空子，他们发现，这要地几乎没有什么军队防守。几小时后，中国军队便出现在刘师的背后，现在，他面临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部队被切断补给线的问题，而且还不得不仓促应战，他简直一筹莫展。到第二天结束时，阿尔蒙德的右翼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暴露了“无名线”的后方，并且威胁到阿尔蒙德自己的第2师。

5月20日，由于雨水和山区地形的原因。霍格的进攻受阻。在这一天里，李奇微走访了第8集团军的每个军和师的指挥部，并走访了前沿阵地。他对4个韩国师的仓皇撤退极为恼怒，命令韩国参谋长钟日昆将军解散他的第3军团。李奇微走了，他不知道钟日昆是否还能重新组建起他的部队。

带着满腔恼怒的李奇微于那天夜间离开朝鲜前往东京，一到那里，他就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去电文：“我走访了所有美国军。师，还有韩国第1师，我希望你们为了崇高的精神，并为在战斗中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通令嘉奖所有这些军队。”4个韩国师的表现令人失望，这一点也十分明显，“我们正在继续努力以挽回这种糟糕局势。”

灰暗中，李奇微合衣躺在沙发上。

朝鲜战争进展到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五次战役，已把“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打退到“三八线”附近，并把战线稳定在这一地区。6月10日，美方被迫同朝中方面开始停战谈判。

显然，谈判是假，战争是真。美方范佛里特一边在谈判桌上轻描淡写他说着外交辞令，一边却在暗中部署空军多次向我交通要道轰炸。地面作战也在加紧准备。所以谈判桌上一讨论到第二项议程就僵持住了，对方公然宣称：“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敌人在其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依仗其空中优势，又以大量航空兵对半岛北部发动了所谓的“绞杀战”。

在志愿军空军指挥部，指挥员们分析着敌人的空中态势：敌人各型飞机，已由战争开始时的553架增加到1100余架。其中用于轰炸破坏我军后方的约占一半。它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我军集结地域、补给基地、公路和铁路桥梁、交通枢纽等，给我军造成极大危害。仅北方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带铁路运输枢纽地区，平均日出动5批100余架次飞机集中轰炸，三角地区有几段仅长73公里的线路上，4个月共中弹38186枚，平均每两米中弹一枚。

于是，我军的反“绞杀战”开始了。

我年轻的人民空军从8月26日奉命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安州地区机场修建的任务。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参战，不断与美国激战，很快迫使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撤到清川江以南。到12月底共出动飞机3526架次，击落敌机70架，击伤25架。

敌人的“绞杀战”没有成功，就连他们自己总结这一行动时也承认：“在

现代化装备同原始化人力对抗中，空军虽然大大削弱了敌人前线部队的进攻能力，但未能按预料那样彻底切断敌人补给，对谈判和作战没起到作用。”

朝鲜战场的形势在我第五次战役以后，已经形成了僵持局面，战局大进大出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志愿平方面已经取消了第六次战役的打算，而李奇微却要施展他的“才华”，硬要扫出威风来。无怪乎他以7.8万人伤亡的代价，才前进2至8公里了。

美国一位从事战史研究的知名学者拉塞尔·韦格利教授曾对李奇微这段战略行动作了一番描绘。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意寻求决定性的胜利，那么唯一可用的方式就是跟中国和北朝鲜军展开激烈的歼灭战。这场歼灭战势必要求联合国军付出极大的代价，从而使这场努力与其说是‘胜利的’，还不如说是‘悲壮的’”。

美同空军司令威兰预言道：如果停战谈判失败而战争继续打下去，“联合国所进行的这次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将取决于中共空军与美国空军之间的战斗。”

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已经拥有1050架作战飞机，其中约有战斗机。强击机和轻轰炸机共690架配置在满洲。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北朝鲜修建机场的最初活动遭到失败后，就开始在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地区修建机场。第一批新机场位于大东沟和大孤山。安东仍然是主要的基地。这三个机场很快就能保障300多架米格飞机的战斗活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早先就已经得到大批苏制米格飞机，现在又在修建更多的新机场，这表明它打算获得更多的喷气式截击机，以便在朝鲜决一胜负。

1951年6月10日，威兰将军鉴于志愿军空军在远东的兵力不断增加，开始注意到日本的防空，要求再增派两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驻扎在日本。但是威兰将军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华盛顿东京方面所完全接受。美国空军副参谋长纳桑·F·特文宁将军代表华盛顿方面的意见解释说，美国空军当局认为中苏空军兵力增加主要是防御性的。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威兰照理是应该得到一些增援部队的，于是美国空军当局就计算了一下自己的兵力情况。早在9个月以前，第116战斗轰炸机联队就已经从空军国民警卫队调服现役，并准备在1951年7月初派往欧洲。后来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美国空军当局命令该联队改变原来的计划而转赴远东。在这个问题上，李奇微将军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认为把第116联队派往远东可能是“不明智的”，因为共产党可能会说美国在进行停战谈判时还在准备战争。实际上，李奇微是主张等到“停战谈判的前途明朗化”之后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部署，并公开宣称这次调动是为了加强日本的防空力量。鉴于以前飞机在横渡太平洋时发生过受到海水侵蚀的现象，所以第116联队的F—84飞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被涂上了一层很厚的防腐油。当载运飞机的两艘航空母舰在7月10日和12日启航后，舰上维护人员每天都检查甲板上的飞机的防水情况，并进行修理工作。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75架F—84战斗机在渡洋的过程中仍有将近半数遭到结构损坏或者海水的侵蚀。

如果第116联队需要立即投入战斗，这种损坏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好在第116联队的这些飞机是准备用于防空作战的，因此还有时间来进行修理。第116联队在7月24日到达日本后，联队部所属的两个中队就驻在三泽空军基地，而第三个中队则驻在千岁空军基地。

第116联队派驻远东，仅仅满足了威兰将军的部分要求。到1951年7

月 12 日，威兰将军比一个月以前更加对志愿军空军的兵力部署感到不安。这时他通知美国空军说，他还需要一支联队驻日本，并且再调两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到朝鲜。在华盛顿的美国空军领导人对这个要求毫不理睬，因为他们再也没有多余的空军部队可以抽调了。从 7 月份开始，美国空军已经着手用更为新式的 F—86E 型飞机按照以一换一的方式更换远东空军现有的 F—86A 型飞机，这项工作将要持续好几个月，但是美国空军当局仍然表示无法为威兰将军再补充一个用以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斗机联队。F—86 飞机的唯一来源是美国防空空军，而防空空军的兵力也没有达到编制定额，因此确实不能再抽调出一个战斗截击机联队。范登堡将军说：“远东空军迫切需要增加 3 个 F—86 中队的情形，可以说与美国空军需要 3 个同样的 F—86 中队以加强美国本土防空的情形是同样的。”

1951 年夏季远东所发生的事件又一次说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年月里，美国由于富裕而自满了，并且放松了戒备。美国在大量生产用于夺取空军优势的后掠翼战斗机尖端技术方面，还赶不上苏联。美国驻远东的空军作战部队在数量上与中国空军比较起来简直有失美国的面子。在 1951 年 6 月，中国拥有大约 450 架新型的米格—15 战斗机，而美国远东空军在战区内仅有 89 架 F—86，其中有 44 架属于第 4 战斗截击联队派驻朝鲜作战的两个中队。志愿军空军也知道他们的米格在 35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上具有比 F—86 更好的飞行性能（F—86 的重量较大）。米格飞机由富有经验的飞行员驾驶时，是一种很好的飞机。1951 年 6 月担任第 4 联队的副联队长的美国著名王牌驾驶员弗兰西斯·S·盖布雷斯基上校在 7 月 8 日的一次空战返航回来之后，称赞米格—15 具有“极好的性能。”

通过对志愿军空军活动方式的研究，美军认为，志愿军在 1951 年 7 月下旬开始发动了一次新的空中战役，其目的是在米格走廊建立空中优势。志愿军飞行员凭着自己在数量和高度上的优势，避开在鸭绿江一带巡逻的 F—86，然后在 35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向南一直飞到平壤，在那里调头回来，降低高度攻击他们在返回安东基地的途中所发现的战斗轰炸机。远东空军司令部早在 6 月 1 日就已正式命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战斗机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现在共产党的新战术又给没有战斗护航的喷气式侦察机和战斗轰炸机造成很大的威胁。

米格飞机避开 F—86 的巡逻，攻击了性能较差的喷气式飞机。在这两大空战中，战斗轰炸机安全逃脱没有受到损失，但在 8 月 9 日那一天，4 架米格飞机截击并严重地击伤了一架 RF—80 侦察机。另外在 8 月 18 日、19 日和 24 日的几次空战中，F86 也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击毁了几架。

美军感到，志愿军空军利用他们在过去两个月所取得的经验和逐渐发展到 525 架的兵力，于 1951 年 9 月 1 日发动了一次来势凶猛的全面空中攻势。为什么选择这个日子发动空中攻势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从 3 月 18 日以来，远东空军的战斗轰炸机一直在轰炸北朝鲜的铁路交通线，8 月 23 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宣告破裂了。现在飞入朝鲜的米格飞机一次就多达 90 架，而且志愿军空军实际上也能够把空中这样多的飞机编成任何一种他们所需要的队形。在 9 月 8 日和 9 日的空战中，米格飞行员采用了过去从来没有在朝鲜使用过的几种战术：一部分米格飞机以单机跟进队形实施攻击，而且一部分飞机则采用卢夫伯雷圆战斗队形。

为朝鲜局势的发展而大为惊恐的威兰将军在 9 月 15 日坦率地对范登堡将

军说，他对共产党空军即将无法控制，共产党空军米格飞机向南可一直飞到平壤来阻击联合国的空对地攻击。威兰将军还说，远东空军“非常紧急和迫切”地需要再得到一个F—86联队。他还建议，如果美国空军不能提供一个联队，那么应该把远东空军的一个F—80联队改装为F—86。威兰将军提请范登堡将军注意，“如果现在的局势继续发展下去，敌人肯定能在朝鲜建立基地，进而威胁到我军在前线上空的高度优势。”在华盛顿的范登堡将军是知道志愿军空军实力在满洲日益增长的严重情况的，但是他的作战部长却告诉他，美国空军如果再给远东空军更多的F—86，就会严重影响美国本土防空空军的实力，并对范登堡将军说：“我们目前在远东空军中保持一个F—86联队还成问题，而保持两个联队则根本办不到。”根据这种意见，范登堡将军在9月20日通知威兰说，美国空军不能提供更多的F—86中队赴朝作战。

谈判破裂后，美国企图凭借空中优势以取得战场上的主动。8月18日，侵朝美军发动了“夏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军开始执行“空中封锁”，即所谓的“绞杀战”计划。此时，美国已增到19个大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空中力量明显增强，空中活动更加嚣张，给中朝地面部队作战和后勤供应造成更大的困难，因此，反敌空中封锁，成为志愿军空军的首要任务。

经过实战考验的第4师，在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后，由师长方子翼、政治委员谢锡率领全师56名飞行员、55架米格—15型歼击机，于1951年9月12日再次开赴安东前线。9月20日担负战斗值班。刘震司令员在战斗动员时指出，第4师这次参战，应积极打敌大机群，以求得进一步提高战斗力。最初几天，虽然天天战斗起飞，但没有和美机遭遇。从9月25日起同美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清川江上的新安州大桥是连接前线和后方的咽喉要道。几条铁路和公路在这里汇合，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从桥上通过，大批军用物资、粮食，药品通过这里运往前方。美空军把这一地带列为轰炸封锁的重点之一，经常派飞机狂轰滥炸。大桥几经破坏，几经修复。因此，保卫这一地区铁路和公路桥梁的安全，成为对保证地面战役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

志愿军空军深知保卫大桥的责任重大，时刻密切注视着美机的活动。9月25日下午，发现美机5批112架以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编成的混合机群，向新安州地区进犯。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立即下令出击。第4师12团副团长李文模奉命率领空中编队飞至安州上空时，突然与20多架美机遭遇，相距仅1000米，已经来不及区分兵力，就一齐投入了战斗。1大队大队长李永泰率先带领本大队冲向左下方8架F—84战斗轰炸机。美机见势不妙，慌忙四散逃去。这时，有2批8架F—86战斗机从左，右后方袭来，李永泰驾驶飞机迅速左转上升，准备占位反击，不料被美机击中。僚机权太万冲过来将美机驱逐。李永泰驾着受伤的飞机向另一架美机扑去，可惜军械系统已被打坏，不能开炮射击。这时，4架F—86又向李永泰围攻过来，李永泰勇敢机智与美机格斗，终于摆脱了美机的攻击，驾驶着中弹30余发、负伤506处的飞机，安全地返回了基地。这次战斗，李永泰虽然没有击落美机，但是表现了临危不惧、英勇顽强的气概。后来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空中坦克”的美称。

在李永泰、权太万与美机格斗时，5号机陈恒、6号机刘涌新奋不顾身地进行掩护。他们看到另一批美机向李永泰的飞机袭来，便勇敢地冲上去。刘涌新发扬孤胆作战精神，与6架美机格斗，将其中1架击落，首创志愿军空军击落美空军F—86战斗机的记录。后遭5架美机围攻，刘涌新飞机被击落，

壮烈牺牲。

这次战斗从战果看是失利的。但是，参战的飞行员个个士气很高，打得勇敢顽强。9月26日，空军首长致电第4师，对他们勇敢作战的精神给予高度赞扬。电报指出：第4师飞行员虽然都是新手，但敢于参加上百架飞机激烈空战，这就是胜利。尤其对飞行员的战斗锻炼，更有极大的意义。电报并对李永泰驾驶中弹30余发飞机安全返回基地，特别提出表扬。

继9月25日空战后，26日、27日两天第4师又连续出动，同美空军展开激战。志愿军空军与友空军协同作战的行动，使美空军的“绞杀战”计划遭到严重阻碍。美空军对此大为震动。美军第5航空队宣传：“这三天战斗是历史上最长最大的喷气机战役，而且，也显示了共产党空军的飞行技术已经改进了。”美空军承认“战斗轰炸机除了扔掉炸弹、四散逃命之外，别无他法”，因而被迫决定“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此后只能对清川江与平壤之间地区我铁路交通实施攻击。1951年10月2日，毛泽东主席看到空军送上的关于第4师作战情况的报告后批示：“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的家属应予以安慰。”毛泽东主席的嘉勉和关怀使参战部队受到鼓舞。10月份，第4师又连续打了6次大规模空战，一次比一次打得好，尤其是10月5日和10日两次战斗最为出色。这两次战斗，第4师共出动飞机80架次同美机空战。由于指战员们勇敢战斗，长僚机密切协同和战术动作有一定进步，共击落美机8架，击伤3架，而自己仅被击落1架。大队长华龙毅在10月10日的战斗中，抓住战机连续攻击，先后击落美机两架。10月16日的战斗，他在飞机被击中、座舱盖被打穿、手臂中弹的情况下仍坚持战斗，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由于战绩突出，华龙毅荣立特等功。

10月20日，第4师奉命转回沈阳休整。从9月12日至10月19日，他们在38天的作战中，共战斗出动29批508架次，参加敌我双方200多架飞机的大机群空战达7次之多，取得了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的战绩。

在第4师奉命调回二线休整的同一天，第3师50名飞行员，驾驶50架米格—15型歼击机，在代师长袁彬，政治委员高厚良率领下开赴安东前线，担任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至安东一线交通运输的任务。他们学习了第4师的作战经验，研究了美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11月2日至10日，连续与美空军分散活动的小机群空战5次，击落击伤美机8架而自己仅轻伤1架。战斗中，第7团1大队队长刘玉堤击落击伤美机2架，3大队副大队长赵宝桐击落美机2架。

初次参战取得这样大的战果，主要是由于他们具有积极求战、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但从组织指挥和战术上来看，暴露的问题不少：一与敌机接触，空中指挥员只顾自己投入战斗，而放弃了指挥责任，空战中大队与大队、中队与中队、长机与僚机之间，没有做到在攻击中有掩护地密切协同作战；个别人未经允许擅自脱离编队，单枪匹马与敌恋战。师、团领导对此进行了讲评，并且总结了对美空军小机群作战的经验。

在打了几次小机群以后，志愿军空军首长认为第3师可以开始执行打大机群的作战任务。空军首长致电予以鼓励，指出：第3师应大胆细心地参加大规模空战，至于战斗损失通常是免不了的，但如果能够提高组织和战术动作，损失是可以减少的，这方面不必顾虑太多。从1951年11月16日起，第3师开始与美空军大机群作战。

11月18日14时许，发现美机9批184架，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即令第3师起飞迎战。14时24分，第3师9团副团长林虎率领16架米格—15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F—84战斗轰炸机的盘旋活动，有的正向清川江桥投炸弹，地面上冒起一股浓烟。王海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降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了攻击。双方的飞机混成一起，美机虽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一时无法施展兵力。王海充分发挥米格—15歼击机优势的垂直机动性能，忽而疾速爬高，忽而急冲直下，经过几次上下冲击，使美机队形大乱，他们抓住有利战机，连续猛攻。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在五六百米的距离内，瞄准美机开炮，各击落美机2架。4号机孙生禄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抵近美机，在300米距离用猛烈的炮火把一架美机打得凌空开花。

第3师9团在这次空战中击落美机6架，其中5架是1大队击落。

王海、王海大队是人民空军的一个里程碑。

朝鲜空战，王海大队打了美国一个150，使军威大振，可是后来的几次空战，却没有那么顺利。

那是一段冲动、痛苦、焦的交织在一起的日子。

空战打响了，3师首先是赵宝桐旗开得胜，接着兄弟团队每仗都有战绩。王海和他的9个团1大队却连敌机的影子都搜索不到。

每天他们憋足了劲去打，起飞、降落、空战变成了空忙。每一次落地飞机的机械师、军械师、特设师……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提着红漆桶朝他们奔跑过来，可他们没有好消息告诉他们。

击落过敌机的飞机上都喷上了鲜红的五星，有的一仗下来连喷两三个，9团1大队的飞机却还是一派银灰。维护飞机的人敲着红漆桶讪笑着，连连说：“下一仗，下一仗准行”他们听了这种安慰和鼓励更不是滋味，头都不敢抬。

夜是那么长，又是那么短。闭上眼，一会儿是云、一会儿是海。一会儿是地面指挥员急促的通报。猛地睁开眼，什么都看不到了，已经是半夜了。想到天亮还要升空作战，又忙闭上眼。依然徒劳，丝毫没有睡意，早上起来，脸、眼肿胀胀的。

一片药不顶用，就再加一片、二片……一天早晨，同志们发现大队长深眠不醒，推了、摇了，捏住鼻子，还是不醒，他们吓坏了，赶忙去叫医生。

王海明显地瘦了，飞行落地也不休息，全大队围在一起分析自己，解剖自己，为了解决第一个难点——搜索，他们训练自己的眼睛，远方的山峰，近处的树梢、地上的昆虫、天上的飞鸟，都成了他们跟踪的目标，乘汽车到机场去，也意识到沿途捕捉目标，用眼睛紧盯，直到汽车转弯或目标消失。

11月8日，1大队接到命令向战区飞去。

这次一过清川江，王海就发现了敌机，先是4架，又是一个4架，后面还有4架……

王海全身的血呼地点燃了，忙向带队长机报告：“右下方发现敌机！”

双方速度都很大，两个机群很快擦了过去，王海带着1大队右转弯180度，加大油门尾追敌人。性能优良的米格，在全速疾飞中和敌机群的距离越缩越短了，1大队占好了有利位置，准备攻击。

“1大队，跟我来！”耳机里传来带队长机的命令。

王海放弃了对敌机的攻击，左转180度，率领大队直奔带队长机。被迫

赶的敌机却反过来咬住了1大队，情况非常危急。

敌机正全速追赶米格机群，马保堂一个转身，正和敌机头对头，疾速冲刺的敌机在马保堂的眼前猛然膨大，像一座倾倒的大山压了过来。显然，敌机得到的感觉和他一样，猛地一抬机头，贴着马保堂的座舱窜了上去。

这种打头的强刺激造成的心理恐惧是很能震慑人的。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谈到中国空军的这种打法，均表示十分头疼。

马保堂的一个“打对头”，冲散了12架敌机，他自己的心脏也超速地跳动着，全身的神经麻绳一样拧在一起。一个念头，准备拼了！

冲散的敌机有两架咬住了中队长张滋。眼看敌机逼近，马保堂来不及瞄准，咚咚咚！开炮了。敌机也开火了，放开米格机群，一起朝他围过来。

12架F—86成批次在马保堂身边穿过来，冲过去，马保堂想：完了，头一仗我马保堂就“光荣”了。又一想：舍得一架保住整个大队，这“光荣”还是够本的。于是喘气均匀了，一抖精神继续和敌人“缠”。

越缠，马保堂越镇静：美国大鼻子也没啥了不起嘛，打了半天，连我们飞机皮毛都没有蹭破呢。再说，他美国佬知道我马保堂是谁？他知道我在飞机上飞了几小时？今天我这张老膏药就贴上你们了！

米格飞机已经转移，马保堂心里更踏实了，为了自卫，他又向敌机连续反击，攻完就迅速上升，而后再攻。这种“马氏战术”大约让F—86头疼了，对马保堂放了一通空炮，收了阵向海上飞去。

马保堂经过一场激战，安全返回机场。

王海看着马保堂落地，长长出了口气，他走过去，用手摸马保堂的飞机。机头都黑了，空战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终于和敌机接上了火，战绩却依然是0 0。王海沉默着，腮上有肌肉被牙关咬成一棱一棱。

次日，王海率领他的大队又出征了。

在11000米高空，1大队和联合国军的飞机遭遇，王海顿时心头火起，一声：“攻击！”全大队扑了过去。

来势凌厉，风搅云起，敌机一招未试，掉头便逃。

王海一加油门，追赶不放，对着敌机尾巴猛地按钮——咚咚咚！咚咚咚……无尽的仇恨喷射着，喷射着，射击的炮钮几乎被王海捏碎了。

敌机晃了几下，中弹了。

“继续攻击！”王海打光了炮弹，命令大队依次攻击。

紧护在王海身后的僚机焦景文冲上前，按响了炮钮。敌机摇晃得更厉害了，3号机周风性接着攻击，再次命中，敌机的尾喷口上腾起浓浓黑烟，黑烟中裹着桔红色的火苗，可是还没掉下去。飞在最后面的刘德林火了，瞄准它又是一顿射击。

敌机变成了一个大火球，急促地坠落下去。

1大队首开纪录，同志们纷纷祝贺，王海躲了。他在飞行记录本上写道：“这次空战的教训，首先是攻击时不是有掩护、有攻击地进行射击，而是轮流射击，形成了‘车轮战’的攻击方法。其次是不注意节约弹药，在攻击的4人中3个人都把炮弹打光了。谁攻完谁走，本来是可以掩护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没有子弹了。”

空战，对于空中历程如此短暂的人民空军，不只是一场艰难的攀登。他们一边反击敌人，一边克服自己的弱点，修正自己，超越自己。

晚餐的时候，一个从战斗前沿回来的同志讲了一件事。他说：前线的志

愿军看米格的飞机翅膀向后背着，都亲切地叫它“燕子”。有的没见过，日夜盼望看看自己的“燕子”，那天空中响起飞机的马达声，一个小战士从防空洞里探出头，一看飞机的翅膀背在后面，就激动地跳出防空洞，一边喊：“燕子！燕子！”一边使劲挥动手臂向“燕子”致意，4架“燕子”突然下降高度，俯冲、射击。小战士倒在血泊中，那只挥动的手臂炸飞了，甩在十几米远的山坡上。那是4架跟米格—15相似的F—86……

夜深了，窗外小虫在草丛里低吟，室内铺位上同志们扯起甜甜，那样宁静，似乎战争从没有发生过。

王海头枕着手臂躺着，眼睛望着窗外的明月。

前线来的同志讲的不是故事，那是志愿军对自己空军的渴望、呼唤。王海来自陆军，这种渴望的情感他是十分清楚的。建设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兵种，是多少中国人长期的渴望。我们军队从诞生之日起，一直以单一的兵种面对残酷的战争，抗美援朝中我们的军队实现了诸多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转变，从而使小米、步枪伴随着飞机、大炮一起迈进了现代化战争的新阶段。

新型的战争，高度现代化的新对手，使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进行的任何一场战争。战争从平面变为立体，对手的空中威力使前方、后方都遭受着炮火的攻击。前方的作战部队只能在夜间行军，在燃烧的土地上穿行。太阳一出，白昼降临，敌机就呼啸着一群群布满天空，千军万马只能躲入防空洞、山洞、树林中宿营，不能生火做饭，饥寒交迫中冻伤人员3万人。东线部队因急需换装的单衣在车站全部被炸毁，以致5月份还穿着棉衣作战……

王海一跃而起，再躺不住了。借着月光，他一页一页翻着飞行记录。

现代战争，不仅是战争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分析两次空战，教训就在于没有使思维跟上超音速的空战变幻。空战，既是勇敢的决斗，又是思维、技术、战术、判断力的较量。作为空中指挥员，他应该是空中全体战斗员智慧的集中者，空战对指挥员的要求是迅速判明情况，敏锐抓住战机，果断下达命令。

天放亮的时候，1大队的一个同志起来方便，看到大队长仍在床头上摆弄着电筒、墨水瓶、钢笔、计算尺……王海在琢磨着空战。

11月18日下午，清川江畔烽烟四起，60余架F—84正向光桥投弹、射击。重磅炸弹呼啸而下，一层层，黑压压，清川江冲起一排排水柱，高达10余米，江桥在稍烟、烈火、激浪中摇晃。

万米高空横冲出6架米格机，霍然而下。

F—84仓皇应战，米格—15直捣敌阵。F—84眼见不妙，立即布成“圆阵战术”，几十架飞机围成一个大圆圈，推磨一般地转、转、转……这一手很滑，圆阵战术既可以互相掩护，逐步摆脱我机攻击，又能寻找机会向我机反扑。

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混在F—84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王海的脑子里也迅速地翻腾着：破阵！迅速破阵！

如何破这个圆磨阵呢？

焦景文发现长机王海猛拉起机头，急速跃升，焦景文也猛拉一杆，紧随其后，转瞬间，王海又刷地对圆阵俯冲而下，焦景文也贴着长机的翅膀猛冲下来。如此左冲右突，几下子圆阵给冲乱了。

“三中队掩护，一、二中队攻击！”

随着王海的命令，大炮小炮，弧光迸射，米格如道道银色闪电，在 F—84 机群中飞舞。

王海的瞄准具里套住了一架 F—84，正要开火，另一架 F—84 昂起机头，瞄准了王海，焦景文眼疾手快，当即瞄准这架 F—84，这时焦景文又被后面的 F—84 咬住了。前面是瞄准敌机的敌机，后面是向自己猛烈开火的敌机，危急中的焦景文奋力掩护长机，狠狠套住前面的 F—84，猛追猛赶按下炮钮，大小炮口吐出团团火球，齐向敌机倾泻过去。顿时，迫击王海的 F—84 轰然一声凌空解体，就在这一刻，动作果断干脆的王海一炮击落前面的敌机跃升翻转过来，又把攻击焦景文的敌机套进他的瞄准具中。

米格与 F—84 在高空搅成一团，烟、火、炮弹、金属碎片在机群中飞进。4 号机孙生禄翻上覆下，一机对 8 架，左攻右杀勇不可挡。另 3 架米格也在乱了阵的敌机群中奋力格斗。激战结束，击落敌机 5 架，战斗中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有战术，大队长王海和他的僚机焦景文各击落敌机 2 架，孙生禄击落敌机 1 架。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打了一个 5 0，自己没有任何伤亡，王海一下飞机，亮亮地喊了一嗓子《火烧赤壁》。王海的京剧唱得着实不错，立时博得一片叫好声。

9 团 1 大队的飞机喷上了 5 颗红星。

机场宣传栏内，1 大队的照片放得大大的，贴在光荣榜上。空 3 师的战斗小报刊出了 1 大队激战长空的长篇报道。

这样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到空 3 师结束第一次轮战，9 团 1 大队的战绩是 15 0。赴朝采访的记者们把目光投向王海大队，他们为这支年轻的鹰群倾倒。

这天，王海的飞机刚滑进停机线，记者们便跑了过去。绘着一串红星的 2249 号飞机，机头蒙皮打得漆黑。一拉开座舱盖，王海头上蒸腾着白白的热气，脸上几道黑灰色的油迹，圆睁着的瞳仁里分明还印着硝烟炮火，望了记者半天，才醒过神来，跳出座舱。

记者们追上去问：“王海同志，这次实战打下敌机了吗？”

王海愣了一愣，停住脚步，答了一句：“打下 7 架。”便匆匆向指挥所奔去。

“你呢？你打下几架？”记者紧追不舍。

王海双眉虬结，甩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对着记者望了一阵子说：“我取得成绩，主要原因之一，是我有一个出色的僚机。记者同志，你应该多写写他。”王海说着，眼睛不自觉地向天空望去。一双大手摸紧松开，松开攥紧，脸上透着焦的与不安。

“他还在空中？”记者问。

“不，他跳伞了。”说完，王海又朝指挥所走去。

原来，王海大队这天是盘旋在高空掩护兄弟部队作战。空战结束时，兄弟部队一架返航的单机被 4 架敌机追上了。

王海和焦景文从高空全速冲下，扑向敌机，正在激战，焦景文突然发现右后方又有 8 架敌机凶神恶煞地追过来。

“后面有我，你尽管攻击前面的敌机！”焦景文报告长机。

在焦景文有力的掩护下，王海加速，勇猛迫击，终于把前面的一架敌机击落。就在这时，焦景文迅速抓住战机，敏捷、猛烈、准确地射击，把攻击

王海的敌机揍掉了。

又有2架敌机扑向王海。

“102！向右脱离！快！”焦景文大声急呼。

王海来不及回答，机警地将机身向右一偏，只见一串红色光弹噓噓地从他机翼下飞过。紧接着，又一排光弹射了过来，王海马上侧转机身，敌机的炮弹又落了空。

焦景文为了让长机摆脱敌机的威胁，不顾身后射过的一排排炮火，紧护长机，左拦右挡，使王海安全脱险了，他的机身突然剧烈震动了几下，一股烟雾窜入机舱，飞机起火了！他迅速打开灭火装置，摇动了几下操纵杆，蹬了几下舵，飞机摇摇晃晃已经不听使唤。

一团灼热的空气猛扑到他脸上，着了火的飞机顷刻间就会爆炸。焦景文在万分危急之中呼叫：“102！102！我不能掩护你了！注意警戒！注意警戒！”

王海刚击落一架敌机，急速上升转弯。回头迎敌，一转机头，看到了起火的僚机，他心猛然一揪。只见大火迎着风势，拉出几米的火舌，四五架敌机正盘在左右。“103！103！跳伞！快跳伞！”

王海呼喊着，倏地冲到焦景文上空，上下翻飞。击退了围攻焦景文的敌机。

焦景文的机舱里已经大火熊熊，飞机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长机的掩护下，他无限恋惜地离开了他心爱的战鹰，跳伞向地面飘去……

记者第二天走到焦景文的宿舍，焦景文已经安全返回。

记者打量焦景文：长方脸，细眉秀目，紧抿的嘴唇透着恬静。9团的人都说焦景文不爱说话，胜利的时候，他总是不声不响地站在别人后面，战斗激烈的时刻，他总是和长机密切配合，战斗在最前锋。他办事周到精细，性情温良，喜欢画画儿，画得也不错。

记者询问了焦景文跳伞后的情景，又问起他的身世。焦景文微微一笑，搓着双手说：“我是穷小子。砍过柴、放过牛，上了几年学。村里的小伙子都抓了壮丁，父母就送我到县城成衣局，做了缝衣匠。”

记者笑了：“难怪你把长机掩护得刀枪不入，原来你是童子功，把缝衣匠的紧针密线带到天空去了。”

焦景文腼腆地抿了抿嘴：“在志愿军部队里有很多这样的事，你想必听说过：当指挥员跳出掩体，冒着敌人的炮火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时，警卫员总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旁。如果敌人的炮弹在他们附近爆炸了，警卫员会一下子扑在指挥员的身上，他随时都准备用自己的生命保卫指挥员，因为他知道，指挥员关系着整个部队的胜利。我也是这样想的。”

记者点着头，焦景文继续说：“我常想，我既然当了王海大队的僚机，忠实完成我的掩护职责就是祖国交给我的任务。我的誓言是：你忠于祖国，就要忠于自己的职责，你爱祖国，就要爱自己的长机……”

记者被英雄的精诚感动了，紧握焦景文的手，突然发现枕头边上一个精致的小袋子。什么东西那么珍贵呢？职业习惯使记者们有一种超常的好奇。

“这么精致的布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焦景文犹豫了一下，把小袋子递给记者：“你看吧。”

记者接过来。这是一只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赠给志愿军的小糖袋，袋子里装着一个小日记本，本子上记载着每天空战的情况，画着空战图解。

焦景文在旁边解释说：“现代化的空战要求我们保持双机作战，开始我们认识不足，一窝蜂打乱仗，吃了不少亏。刘亚楼司令员常到机场来，关于双机编队的必要和重要的问题他一再强调，还以舞场上配合默契的舞姿舞步打比方，道理讲得非常透彻。可是由于空战中动作猛烈，飞机速度那么大，天空又是那么广阔，两个人的动作只要有一两秒钟的误差，就可能失去目视联系。因此，我在这上面想了很多办法，首先就是熟悉王海同志的一切，哪怕是极细小的事。譬如他说话的声音。语调、节奏，我都仔细琢磨过。空战中，哪怕在嘈杂、混乱的无线电台里，我也能从中听出哪个是他的声音。尤其是他的思维方式、战术动作，这种种的特点我都仔细观察体验后，记录在日记本上。同志们都说我们这对长僚机飞起来就像有一根神经拴着，无论多猛的跃升和俯冲，编队就像一个人一样。其实功夫就在平时的留心，没什么高深的学问。”

记者起身告别，目光落在焦景文床头墙壁上。那里端端正正贴着一幅王海的彩色照片，大概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细致地裹着边儿。

3 美国远东空军宣布“绞杀战”失败，以“饱和轰炸”取而代之，天空被撕裂。

万里高空中，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出现了一幅壮烈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奇景。志愿军空军的战机，矫捷灵活地出没在敌群之中。他们忽而俯冲攻击，右拦左堵，忽而上下翻飞，飘忽出没，使敌人个个受到威胁。他们就像一堵横在万里长空的铜墙铁壁，挡住敌人的去路，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又像一把把扎进敌人胸膛的尖刀，搅乱了敌人的五脏六腑，把敌机的队形冲得七零八落，使它们想逃跑也根本无法脱身。

志愿军的空中攻击加强了。此时，终于发生威兰最担心的事：志愿军在北朝鲜各地又重新开始了几个月前由于联合国军空袭而停顿了的机场修复工程。志愿军显然意识到他们的空军兵力差不多有可能进行一次成功的突破了。9月25日，第67联队的一个侦察机飞行员在进行例行侦察的过程中，很偶然地发现志愿军正在清川江以北四岩站附近修建一个全新的大型机场。看来，志愿军已在这里偷偷地工作了将近一个月，现在已在为一条7000尺长的简易跑道铺设硬路面。10月14日在这一地区进行周密的空中搜索后，发现志愿军在这一方圆20里的范围内正在建筑不只是一个而是三个喷气式战斗机机场。另外两个机场的位置是：一个在泰川以南一里的地方，一个在南市东北三里处。每一处都有一千多名劳工在赶修，工程在急速地进展着。他们不仅在建筑跑道，而且还在建筑飞机掩体及其它设施。每个机场都有高射炮和高射机枪保卫。

米格走廊的这三个机场，对于联合国在朝鲜所从事的战争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志愿军一定会坚决保护他们的这项设施，因为这三个机场非常靠近，所以空中只要有一支米格兵力就能够很容易地保护其中任何一个机场。如果共产党空军真的设法建成了这些机场，并且在机场上配置米格，他们就能把米格走廊的无人空域向南一直伸展到平壤。而如果志愿军把米格疏散配置在四岩站——泰川——南市三角形地带内各机场上的飞机掩体里，那么，清除掉这些米格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鉴于这种情况，第5航空队在一发现这些新机场后，就立即派出轰炸机指挥部的B—29轰炸机对其进行了目视轰炸或雷达轰炸。

朝鲜的冬季很寒冷，在冰天雪地中志愿军顽强地前进，中国空军的空战水平也大大提高了。1951年10月整整一个月内，志愿军空军在北朝鲜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则陷于危险境地。根据战报，远东空军在空战中被击落7架F—86、

1305架B—29、2架F—84和1架RF—80。在这个寒冬十月，轰炸机指挥部的老式B—29遭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损失。在10月份以前，轰炸机指挥部在空战中一共只损失了6架B—29，然而在10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内，就有5架B—29被敌人的高射炮或战斗机击毁，另外还有8架受了重伤。一个星期内就有55名B—29的乘员丧生或失踪，另外有12人负伤。当时许多悲观论者认为，老式的B—29在朝鲜已经无能为力了。由于胜利而更加壮了胆的志愿军则把飞机运过鸭绿江配置在新义州和义州机场上。这是第一次在新义州机场疏散并配置了大约26架米格，还配置了大约60架螺旋桨式飞机。而且到目前为止，远东空军还没有炸坏四岩站、南市和泰川的新机场。数以千计的劳工正在加紧填平遗留下的弹坑，并修建其它设施。范登堡将军在飞

往远东视察后回到华盛顿时，曾作了一个悲观的报导。他对报界谈话说：“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1951年初冬，志愿军空军作战实力日益增强，联合国军不得不对其紧急计划重新作某些考虑，一个新的中国空军团调到大孤山之后，使得安东各基地的飞机总数达到290架米格—15战斗机。原来驻在鞍山、辽阳和沈阳等后方基地的其它米格飞机由于临时向前驻到安东，因而提高了米格在朝鲜西北部的出动率。F—86飞行员在北朝鲜上空开始遭到大批新的改进型米格飞机攻击。这些飞机后来判明是米格—15比斯。这种飞机的动力装置是一台由俄国的弗拉基米·克利莫夫设计的功率较大的BK—1型航空发动机。志愿军在飞机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战斗出击率又高。据观察，在1951年11月份志愿军在北朝鲜上空出动了2326架次，同年12月份出动了3970架次。12月3日和8日在汉城以南还发现了几个米格小队高空飞行。

“猛打”方法的建议已被以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推翻。美国空军的计划人员建议，如果志愿军从鸭绿江以北发动空中攻击，则131应授权远东空军消灭掉安东的几个基地。这个作战方案于1951年12月被参谋长联席会议采纳，并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只要志愿军还没有公然利用安东基地对联合国军军事设施进行空中攻击。或者说，只要联合国的各项政策还没有改变，远东空军的兵力还没有显著增加，威兰将军只打算让自己的部队继续与志愿军的喷气式飞机在北朝鲜进行空战，并且最先考虑去炸毁那些能够支援共军飞机对联合国军事设施进行空袭活动的北朝鲜机场，除此之外，他还没有找到其它什么作战方案。

志愿军空军于10月下旬击败轰炸机指挥部的B—29后，美国空军当局所考虑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为远东空军提供更多的用于夺取空中优势的F—86，而是计划如何能迅速地把这些飞机运往远东。南市上空血战的消息，使得美国空军当局放弃原订在1952年春末的某个时间把第5航空队所属的一个F—80联队改装成F—86的计划。10月22日，范登堡将军命令国内的防空空军司令部立即派75架F—86连同飞行员和机械师调还给防空空军。但是，应埃佛勒斯特将军的请求，威兰建议用这75架F—86装备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的两个中队。美国空军司令部的人员曾想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因为威兰将军在以前曾建议把3个F—80中队改装为F—86，以便减轻对存货不足的F—80的补充需求量，和增加夺取空中优势的潜力。但是范登堡将军在东京与威兰将军协商后，还是同意了埃佛勒斯特的计划。

可以想像，在冬季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把飞机装在军舰甲板上运到日本，是有一些危险的，因为海水会喷到航空母舰和甲板上来，但是在阿拉米达，人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已为F—86采取了较好的防水措施，尔后由埃斯特角号护航航空母舰和西特科湾号飞机运输舰分别于11月1日和9日启航运往日本。当这种新型的F—86在运往远东的途中时，埃佛勒斯特将军就决定把南朝鲜的第4战斗截击机大队全部集中起来。因为第235中队只是使用

132了已驻朝鲜的另外两个中队原有的飞机。

当第5航空队等待F—86的增援时，哈里逊·R·辛恩上校指挥的第4战斗截击机联队正难以对付11月中几乎每天都飞到北朝鲜上空的许多志愿军空军的米格飞机。

经过长期试验之后，志愿军空军开始采用一种高度成功的“钳形包围”战术，即以60到80架米格编成几个互相协同的纵队，在35000英尺以上的

高度上从安东和水丰水库上空飞过鸭绿江。“西海岸纵队”和“中部纵队”都留下了几个小队或一小部分飞机，与 F—86 巡逻队交战，而机群的主体则一直向南飞到平壤上空集合，然后开始向鸭绿江返航。在返航途中，一部分米格降低到 19000 英尺高度，攻击联合国军的战斗轰炸机、返航的 F—86 或掉队的飞机，志愿军空军为了掩护大批飞机的返航，通常有一部分新生力量的米格飞机向南至少飞到新安州去接应。这种“钳形包围”，志愿军空军米格由于占有数量上优势，所以 11 月份在平壤以北取得了主动的地位，而联合国军所有的飞行员则只能对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所发动的进攻进行被动的抵抗。

志愿军空军的“空中米格走廊”已牢牢的掌握了空中优势，在朝鲜战场上空，多少美军的战斗机拖着尾巴栽下来，令那些黄头发、大鼻子的飞行员胆战心惊。

于是，在 10 月 28 日，联合国军在板付空军基地召开的一次司令官会议上，第 5 航空队和轰炸机指挥部的司令官们的唾沫里飞溅着他们手舞足蹈地描绘着空战中志愿军飞行员的机智勇敢，又垂头丧气的责怪自己的飞行员如何不争气，甚至有的葬身异地的事实，最后，大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数量的战斗机护航队实际上都难以保护 B—29 中型轰炸机免受米格的攻击。这一铁的事实，反倒启发了凯里将军的思路，他认为，对 B—29 的唯一可靠的掩护，是建立一道严密的 F—86 的阻击屏幕。针对这个问题，凯里将军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建议，即轰炸机指挥部的 B—29 只在夜间出动轰炸。轰炸机指挥部利用其现有的兵力每天夜间出动 5—7 架次进行轰炸，3—4 架次用 MPQ—2 型雷达引导进行地面支援，2 架次散发传单，1 架次 APN—60 雷达进行检查飞行，1 架次对 MSQ—1 型地面雷达进行检查飞行以及根据气象和需要进行侦察活动。凯里将军要求尽快地发展“肖兰轰炸”作为轰炸机指挥部的 B—29 的主要攻击方法。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对于敌人的“肖兰轰炸”战术，志愿军空军很快摸到了路数。

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冬季，天空闪烁着点点寒星。就在义州机场周围，我高射炮埋伏在掩体里，拉长了脖子，睁大了眼睛，搜索着空中飞贼。50 多架探照灯，像无数把利箭直刺夜空，构成空中防线，任敌机多么狡猾也休想逃脱正义之拳！

终于，敌机飞入了我的圈套。在巨大的探照灯光柱里，一架 B—29 轰鸣着飞来，又一架 B—29 飞机悄然而过。这时，探照灯紧紧追踪，起飞的米格雄鹰奋翼攻击，打得“飞贼”晕头转向，于是，高射炮喷吐怒火，漆黑的夜空变成闪电雷鸣的景观，好不壮观。在地面上散落着四架 B—29 的残骸，有一架嘶鸣着悲声带伤逃跑了。

千变万化的志愿军空军作战战术到 1952 年 5 月又有了新的变化。志愿军空军完全停止了训练性的飞行出动，并且还大大地减少了他们在北朝鲜的作战活动。在 5 月份，联合国军飞行员发现米格只出动了 620 架次。志愿军空军从各个空军部队中抽调了最优秀的飞行员来作战。志愿军空军已开始在米格走廊使用地面控制雷达进行截击了。在 5 月份，米格机群有许多次对联合国军飞机进行了非常准确的穿云下降攻击。志愿军空军飞行员是利用电子助航设备，尽可能地规避 F—86，而对联合国军的战斗轰炸机，特别是对那些正在离鸭绿江 40 里范围内攻击目标的战斗轰炸 134 机实施攻击。

美第 5 航空队在埃佛斯特将军批准了一个新的“战术”，从 1952 年 3 月 3 日起开始实施“饱和轰炸”。和先前所采取的活动方式不一样，这一次，第 5 航空队的联合作战中心选择了具体的攻击目标，把所有的执行任务的飞机都置于它的严密指挥之下，并给它们规定进入路线、起始点、退出程序以及进入和脱离每一个目标时的高度。

4 月间进行的“饱和轰炸”，使得新义州和新安州之间志愿军铁路交通长期陷于停顿状态。但是，美军在“饱和轰炸”中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请看：在对铁路实施空中封锁的过程中，第 5 航空队共损失了战斗轰炸机 243 架，还有 290 架其他的战术飞机也受到严重的损伤。这就是敌人所谓“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成绩”的结局。

4 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威兰说：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英国电台的透露给朝鲜的美国喷气机驾驶员带来一片黯淡的气氛。

世界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新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认识了空军。

抗美援朝的壮举结束了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软弱可欺的形象，她终于以东方巨人的气魄与雄姿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中，中国空军的功劳是不可泯灭的。

135

志愿军空军健儿，驾机巡航在蓝天时，他们的脑海里映现出一个个祖国人民援朝抗美的生动故事。他们深知，座下的战斗机是祖国人民的深情与希望。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军属的号召，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宣传运动和增产增收结合起来，工人开展生产竞赛；农民掀起生产运动；工商界踊跃交纳国捐，帮助稳定物价；医务界自动组织医疗队开赴前线……

上海市原定捐献计划为人民币5018亿元（老币），折合战斗机334架，高射炮1门，捐献结果共计人民币8419亿3685万2889元（老币），折合战斗机566架。北京市原计划捐献850亿元（老币），折合战斗机69架，实际缴款1410亿（老币），可购战斗机137架……全国各省献机运动的实际捐款都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指标。据统计，截止1952年5月，全国人民捐献了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钱款。这对于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何等意义的数字啊！

迪化（乌鲁木齐）市103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吾古尼沙汗，步行到80公里外的南山下拾麦穗，半夜三更纺棉花，变款捐献。天津市常锡厚教授捐出了数年心血巨著《治河工程》的全部稿费。唐山一位武老太太，积攒了几十年的“体己钱”，在日寇占领时吃糠咽菜都没舍得花的7块大洋，全部捐了出来。米仓县一名妇女将自己埋藏地下多年的首饰捐献出来，这些首饰是祖上留下传代的，国民党军队曾用各种残酷手段进行勒索她都没拿出来。不少家庭妇女捐出自己爱情的象征——订婚、结婚戒指。江苏武进县汪秀琴说：“我爱我的结婚戒指，我更爱我的祖国。”有的家庭，父亲捐了儿子又捐，丈夫捐了妻子捐，说是各写各的名字，各表各的心意。

在蓝天翱翔的机群里，就有一架不寻常的飞机，那就是著名136豫剧演员常香玉捐赠的。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和她领导的香玉剧社，决定在全国各地巡回义演6个月，用演出收入捐献战斗机1架。

常香玉在义演结束后，给志愿军写了一封信。信这样说：亲爱的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我是一个唱河南梆子戏的演员。在国民党血腥统治时期，受尽了种种摧残。解放后我们艺人受到了重视，得到了帮助，我的生活在改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我被选为西北和中南许多人民团体的委员和代表。我深切地知道，这些都是伟大的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你们——热爱祖国的英雄们的战斗带给我们的。

为了表示对你们衷心的爱戴，为了支援你们在朝鲜前线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香玉剧社”曾于去年8月15日到今年2月7日，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胜利完成了“香玉剧社”战斗机1架的捐献计划。

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赤诚与无私化成一架架“工人号”、“农民号”、

“工商号”、“妇女号”、“学生号”、“少年号”……翱翔在保家卫国的异国天宇。

这些凝聚着中国人民心血的特殊飞机组成的战斗机群，筑成敌人不可战胜的空中防线。这一防线，构成我国空军历史多彩的一页。

浴血战斗在朝鲜前线的志愿军，自然成了全国人民“最可爱的人”。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回国汇报，队伍一出北京车站，欢迎的人群便潮水般拥了上去。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一把拉住志愿137军飞行员杨振玉，双手擅抖着，慈详的目光在年轻的脸上扫了一遍又一遍，半晌才说：“孩子，你叫我亲亲你！”杨振玉一把将老人抱住，热泪两行……

烈属、军属，同样受到尊重和厚爱。在城市，烈属优先就业，在农村，对烈属实行了“三保”，即保证深耕细作，保证多打粮食，保证不荒一寸土地。医务界实行免费为烈军属治疗疾病。每逢过节，各界人民派代表对烈军属进行各种形式的慰问。一个老工人去理发，等候的人一听老大爷是军属，立刻从最后边把他拉到最前边，理了半个头的小伙子站起来，又把老大爷请到理发椅上。

广大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农民，在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鼓舞下，掀起了报名参军的热潮。华东军区报名人数达23万余人，浙江省有几万农民报名参军。全国各地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故事。安图县金洙焕老大娘，四个儿子参加了志愿军，最后又把第一个儿子送上了前线。她对儿子说：“娘怎么疼你们，你们怎么疼国家，要不娘怎么舍得把你们都送走？记住孩子，你们怎么疼娘，也就怎么疼国家。”

1951年，英雄刘胡兰的母亲给全国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全国的母亲们，姐妹们：

当我听到美帝国主义正在侵略朝鲜，还想重新武装日本，又想再来侵略中国，我的心都气得发抖了。

我想到日本鬼子、蒋介石、阎锡山统治下的情形，想起我的女儿胡兰子，想到她被残杀的情景……

姐妹们！我受这样的痛苦，我想你们当中也有受到这种痛苦的人。想想看，你亲自抚养大的儿女，好端端地被敌人杀死，你的心会多难受啊！难道我们做母亲的抚养孩子，就是为了让帝国主义、卖国贼杀害吗？不能的！我们的国家再不能让洋鬼子欺侮！中国人是有血性的，我们要让鬼子也看看中国人的阵势。让美国鬼子看看咱们心有多齐，力量有多大！

姐妹们！我们要全力支援我们的人民志愿军，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儿女送到朝鲜战场上去！常言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我们要和朝鲜的千万个母亲一起，用自己的骨肉保卫自己的祖国，消灭那些万恶的美国刽子手！保卫世界和平！

胡文秀报名参军抗美援朝，全国少数民族也当仁不让。1951年一年内，就有2.4万多名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学生参加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列中。内蒙一个行政村，有60多个青年牵着自己的马参加了志愿军。贵州关红县一个苗族妇女，结婚5天就动员丈夫参军，牵着马把丈夫送到区上。

中国不仅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派往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还隔着千山万水，冒着枪林弹雨，送去了大批粮食和物品，救济战火中的朝鲜人民，帮助他们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仅1950年就运去了6000多吨粮食，

1.1 亿多条毛毯， 40000 万斤棉花， 3.5 万尺布， 200 亿人民币。 1951 年又运去 36 万套棉衣， 15 万双鞋， 192 列车粮食、 20 列车肉类……

中国历史记下了这个不寻常的时代。中国人民以最真挚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珍念。1951—1953 年出生的孩子，有多少父母给儿子取名——援朝；给女儿取名——抗美。一时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数不清的张援朝、王抗美、李抗美……

国内的大力支持，极大地鼓舞着朝鲜战场上的将士，他们决心狠狠地打击侵略者，以实际行动来回祖国人民。

朝鲜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的 8 月，美军已举步维艰了。李奇微再也不是刚刚上任时的轻松与得意。在作战指挥室里，他踱步迟 139 缓，显出一筹莫展的样子。美军在地面遭到失败后决意加强空中力量，美军为了取得喷气式战斗机空战经验和增强空战力量，以轮换的方式派遣了一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驾驶员到朝鲜作战，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

戴维斯是美国空军第 4 战术战斗机联队的飞行员，第 4 联队是美国一支老牌劲旅，在二次大战的风云中，这支劲旅驰骋上下，战功显赫，在美国空军中是屈指可数的。

叱咤风云的美军第 4 联队在朝鲜战场上遇到了强硬的对手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

美国的空中优势受到严重的挑战，喷气时代空中大战降临到美国人面前。8 日下午，第 4 联队队长乔治·史密斯上校接到了赴朝鲜参战的命令。全队在 6 天时间内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城纽卡斯耳群基地转场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然后又用了 2 周时间分乘 1 艘航空母舰和 1 艘快速油船，跨越太平洋到达日本。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了机动。

第 4 联队加入第 5 航空队序列，他们原计划进驻平壤机场，但中朝军队的迅速推进，使这一设想成了泡影，遂在日本东京附近的入间川扎营，以 336 中队为主，抽调其他中队人员组成“第 1 分遣队”，率先入朝。

他们的队伍中集中了一大批本大队和来自 56 大队、 357 大队的二战英雄，个个都是屡经战阵、身怀绝技、闯过了二战的惊涛骇浪，在 3 年半时间中，他们频频出击，东征西讨。先后参加了“米格走廊”大空战、大和岛空战，多次掩护 B—29 轰炸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还直接参加了“空中绞杀战”，疯狂突击朝鲜北方的机场、铁路、桥梁和调车场，给美丽的朝鲜河山和中国东北边疆带去无数恐怖和灾难。

然而，这支老牌劲旅在勇敢无畏的毛头小伙面前，吃尽了苦头，死伤和被俘数十人。140

空军战史上详细地描述了志愿军空军与美第 4 联队作战的实况，今实录如下：

1951 年 11 月 16 日，第 14 师飞行员 43 名，米格—15 歼击机 40 架，由沈阳壮陵机场进驻安东西南面的大孤山机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决定第 14 师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 2 师 6 团一起，在第 3 师带领下参加作战。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他们完成了熟悉战区的飞行任务。

12 月 13 日上午，第 14 师 42 团出动 22 架飞机，在第 3 师 9 团 16 架飞机的掩护下飞至清川江上空截击美机，击落美飞机 1 架，在激战中，第 40 团击落击伤美 F—86 飞机 3 架，而自己被击落 7 架，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作成决心错误，只想让初次参战的新部队在美空军间隙寻找较差的 F—84、F

—80 飞机，指挥上没有注意到两侧的敌情，第 40 团编队距离拉得太长，使担任掩护的第 9 团难以全部投入战斗，另外第 9 团只有部分兵力进行了支援、击落敌机 3 架，待整个编队赶到时，美机已脱离战斗，向海上飞去。这次战斗遭到严重的损失，但对第 40 团来说，受到了一次锻炼。该团第一次出动就遭到美 F—86 飞机的袭击，全体飞行员在战斗中没有惊慌失措，坚决勇敢地投入战斗，与美机格斗达 6 分钟之久，有 13 人开了炮，直到接到返航命令时才退出战斗。1951 年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曾亲自编写这次战例，供部队学习，以吸取教训。

第 14 师受了一次挫折后，没有气馁，休整了一天，12 月 15 日上午，在第 3 师 9 团掩护下又打了一仗。这次战斗一反前一次空战的被动局面，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 11 架的战果。当日上午 6 时 58 分，美机 4 批 52 架活动于平壤地区上空。第 14 师 42 团由副团长边逢积率领起飞 18 架飞机，在第 3 师 9 团 16 架飞机掩护下出击美机。他们接受 40 团前天作战失利的教训，保持严整队形，注意观察警戒，很快发现目标。在美机尚未发觉时，突然展开攻

141 击，全团 8 人开炮，2 大队副队长郭子谭、3 大队中队长丁世财各击落 F—84 飞机 1 架。第 9 团居高临下坚决掩护 42 团作战，全团 5 人开炮，击落 F—84 飞机 7 架、击伤 2 架，自己仅被击落 1 架。由此可见，运用奇袭战法，出奇制胜，对夺取空战胜利十分重要；而思想上麻痹，空中警戒不严，战术上呆板，则必然会给对方造成可乘之隙。12 月 13 日和 15 日的两次空战，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经验。

在此期间，第 2 师 6 团也多次出动战斗，有一次除击落击伤美空军 F—80 型飞机各 1 架外，还首创击落 B—26 轰炸机 1 架的战绩。这次战斗是在 12 月 14 日上午进行的。当日 9 时 20 分发现美机 10 余架，由平壤向北飞行。第 2 师 6 团起飞米格—15 歼击机 24 架，由团长徐登昆率领，在第 3 师 9 团掩护下前去截击。到达清川江附近上空后，副团长邢海帆发现右下方有两个黑点，估计是美机，即率领 1 大队飞向目标。接近后判明是 F—80 飞机，即投入攻击。邢海帆接连 3 次开炮，击落击伤 F—80 型飞机各 1 架。3 大队飞行员杨木易和谢英川在寻找本机群过程中，于平壤以北发现 1 架单独活动的 B—26 轰炸机，双机即交叉轮番攻击 3 次，最后杨木易将其击落。

在第 14 师和第 2 师 6 团参战后，第 6 师也奉命于 1951 年 12 月 8 日，由政治委员张志勇、副师长北沙率领，从沈阳东塔机场转至安东大东沟机场参战。这个师共有飞行员 42 名，米格—15 歼击机 52 架。由于训练时间短，飞行技术低，在熟悉战区的飞行时，连续发生两起迷航迫降事故。志愿军空军刘震司令员又令他们继续进行战斗训练，到 12 月 30 日才开始作战。1952 年 1 月 5 日进行了第一次战斗。当日第 6 师 18 团起飞米格—15 歼击机 20 架，截击活动于清川江上空的美 F—80 战斗轰炸机，全团 3 人开炮，因射击距离远未击中。1 月 31 日上午，第 6 师 16 团出动 36 架飞机，直线出航远程奔袭，在平壤附近上空截住 12 架美机，7 人开 142 炮，1 大队大队长许秀玉、2 大队中队长朱玉迁分别击落 F—84、F—86 各 1 架。这是第 6 师首获战果。

1952 年 1 月中旬，第 15 师飞行员 48 名、米格—15 歼击机 43 架，由师长黄玉庭、政治委员崔文斌率领，从公主岭机场转至大孤山机场，进行参战前的各项准备。2 月 19 日，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决定第 15 师在第 4 师带领下作战。开始出动 5 次，没有遇上美机。3 月 12 日与美机进行第一次空战。由

于初次参战，又遇上了性能较好的F—86飞机，结果战斗失利，被击落击伤各1架。他们接受教训，研究战法，在3月20日的空战中，该师第45团副团长林广山、1大队大队长樊玉祥和击落美机1架，飞行员孙忠国击伤美机1架，自己没有损失。

1952年2月4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只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为了使更多的部队得到实战锻炼的机会，第12、17、18师也陆续转到一、二线机场参战或准备参战。第12师飞行员45名、米格—15歼击机49架，由师长王明礼、政治委员李明刚率领，于3月中旬由上海抵达大孤山机场。第17师飞行员52名、米格—15歼击机42架，由师长李树荣、政治委员罗斌率领，于3月下旬由唐抵达大东沟机场。第18师飞行员39名、米格—15歼击机40架，由师长王定烈、政治委员徐明率领，于3月底由广州抵达沈阳于洪屯机场。至4月底，第12、17师在第4师带领下完成了战区航线飞行，进入正式作战阶段。但因美机活动越来越狡猾，第12师出动10次，只有1次交战，未获得战果。第17师出动19次，没有同美机遭遇。第18师在机场进行战前训练，于5月上旬转至一线机场投入作战。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已有9个师18个团的歼击机部队和2个轰炸师的部分部队参战。参战飞行员447名，其中有轰炸机空勤组28个。战斗出动680批、1.11万架次，空战85143批、1602架次，击落美机123架，击伤美机43架，被美机击落82架，击伤27架。志愿军空军与美空军损失飞机比为1：1.46。在战斗中志愿军空军获得了许多组织指挥和空战的经验，打出了志愿军的威风。

这一天，志愿军开创空中神话的时机来到了。

1952年2月10日上午，我空军指挥部得到消息：美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F—84、F—80战斗轰炸机2批16架，在18架F—86战斗机掩护下，轰炸军隅里附近的铁路线。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马上命令第4师起飞两个团34架米格—15歼击机，以第10团的16架飞机为攻击队，第12团的18架飞机为掩护队，由第10团团长阮济舟率领，采取编队“品”字形，急速飞往战区。

无数驾战鹰如箭离弦，射入高空。在浓云密布的天空里，飞行员警惕地飞行着，耳边不时传来地面指挥员用无线电提醒空中编队的声音：“加强警戒，注意搜索敌机！”飞行员们高度戒备，严密监视四周的天际。他们知道，在空战中谁能先发现目标，谁就能夺取主动。

在前进中，第12团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格外镇静，他稳操驾驶杆，随时迎击敌人。

突然，他机敏地发现远方海面上空有一道道白烟，这表明美机在活动。他立刻报告了带队长机，并继续观察着那里的动向。这时美机正利用云层隐蔽地接近敌空军机群。带队长机阮济舟果断地发出“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的命令，张积慧和僚机单志王投掉副油箱后，即猛拉驾驶杆，爬高占位，准备攻击。当他们抢占到高度优势时，却丢失了目标，自己又脱离了编队。一时找不到美机，他们就加大油门，追赶编队。张积慧从右后方云层间隙中发现8架美机直窜下来，为首的2架已经猛扑到他们飞机的尾后。距离越来越近，很快就要到开炮距离。张积慧提醒僚机单志王：“注意保持编队！”然后猛然作了一个右转上升动作，美机冷不防扑了个空，冲了过去，张积慧、

单志玉顺势咬住了美机中的长机。美机见势不妙，拼命摆脱，先是急俯冲，后又向太阳方向作剧烈垂直上升，继又转入俯冲。张积慧、单志玉双机始终紧追不舍，步步紧逼。第一次开炮因角度不对未击中。张积慧紧追到 600 米距离，将美机套进瞄准具光环，第二次开炮，三炮齐发，将其击中。在张积慧的眼光里，这架 F—86 飞机，连同它们的飞行员一起，坠毁在朝鲜博川郡青龙面三光里北面的山坡上。

张积慧击落美机的长机后，迅速拉起，又攻击另一架美机。该机飞行员做着不规则的飞行动作，极力摆脱。当张积慧逼近到开炮距离时，美机又突然作上升转弯动作，张积慧也敏捷地作上升转弯，并从内圈切半径靠了上去，在 400 米的距离上瞄准射击，一次开炮，就把这架美机打得凌空解体，七零八落地向下坠去。

前后不到一分钟时间，张积慧在他的僚机单志玉紧密配合下，击落美机 2 架。

空战中作战的张积慧，他怎么会知道他们击落的正是美国炫耀一时的“空中英雄”戴维斯呢！

空战结束后，当地志愿军地面部队从美机残骸中找到一枚驾驶员的不锈钢证章，上面刻着：第 4 联队第 334 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这一喜讯沸腾了朝鲜战场，志愿军将士们沉浸在无限的亢奋之中。

戴维斯有着飞行约 3000 小时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曾参加战斗飞行 266 次。1951 年 8 月，美空军为了取得喷气式战斗机空战轮换方式派遣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牌驾驶员到朝鲜作战。戴维斯就是其中之一。

击落戴维斯，美方是如何反映的呢？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同时戴维斯之死也给美国国会议员 145 员带来不休的争吵。虽然戴维斯的妻子向美国空军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也挽救不了戴维斯的生命。

志愿军空军首长致电各部队表彰张积慧的功绩以及张积慧、单志玉长僚机密切协同的战斗精神，号召全体指战员向他们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张积慧的事迹通报全军，并给张积慧记特等功一次。

当时，来自美国的报道，生动地描述了戴维斯战死的反响：戴维斯战死的消息传到美国各界引起巨大的震动。戴维斯的妻子对于美国空军当局把她的丈夫留在朝鲜作战以致战死一事怨愤地提出了抗议。她申诉：按照规定，戴维斯是最有权利回国的。她引述丈夫最近写给她的信：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我们损失了这么多飞机、这么多的人。并且说和他作战的飞机比佩刀式飞机不知要好多少，我们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为此，美国国内爆起一片激烈的争吵，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头目勃里奇借机攻击民主党进行侵朝战争的愚蠢，他说：现在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没有希望的冲突。”

25 位战俘的妻子在美国国会前集合请愿，要求还给她们丈夫。一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一位战俘的母亲席德文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

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军队。

日本《每日情报》杂志在一篇文章中称米格飞机为“显示世界最高水平

的新式战斗机”。法新社说：“共产党的喷气式飞行员都是出色的空军人员，美国飞行员也普遍赞赏他们的表现。被称为美国第一流空军健将的加布利斯基上校在承认朝鲜和中国志愿军的飞机精良后说：‘他们驾驶员更娴熟，他们的方法也更好了’。一个英国随军记者采访了空战回来的高级驾驶员后，在文章中写道：‘盟军飞行员承认共军在空中战术技巧给了他们以深刻印象

146 象。’一个名叫阿米德的澳大利亚飞行员被米格机击落后，侥幸逃回基地，一位荷兰随军记者报道：这位阿米德惊魂未定，说：‘那些共产党都是头等飞行员。’……”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把军功章授予击毙美国空中英雄乔治·A·戴维斯的张积慧。

张积慧是中国人民志愿空军第4师12团3大队大队长，他曾先后击落4架F—86。空4师召开隆重的授勋大会，把象征着国际荣誉的军功章佩带在张积慧的胸前。这是特等功臣张积慧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第三枚奖章。张积慧用激动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激动的心情：“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在我胸前，在我心脏跳动的地方，挂上了代表着国际功勋的军功章，我感到非常幸福。我首先感谢党和人民给我的教育。如果没有党和人民，我是不会有今天的，回想起十几年前我还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我还在山东荣城桥村跟父亲给地主扛活。那时，我从没有想到能有今天。看看今天，我更爱我的祖国和亲爱的人民。我宣誓：我将更加努力地在空中对敌进行战斗，来保卫我们亲爱的祖国，保卫朝鲜和世界和平！”

张积慧击毙美国空中英雄的壮举极大地振奋了奋战中的人们，从自卑、颓靡中解放出来的民族心理又一次受到鼓舞。人们为英雄自豪，为中国自豪，张积慧的事迹到处传颂，张积慧的故事编进了扫盲课本里，那已经不是一个英雄的传说，而是民族自信的树立，民族精神的弘扬。147

5 韩德彩技高一筹，“双料王牌”费席尔被俘时还想不明白的问题。

美国决定以军事行动来施加压力，迫使朝中屈服而同美国接受停战条件，而这一切迫使美国把空军推到首位。但是，此时的中国空军已不是初战时的空军，从数量到技术，都令美国刮目相看。对此，威兰有一个清醒的分析：只有在联合国军有了制空权的情况下，联合国军的空中威力才能够攻击那些足以促使共军接受合理停战条件的目标，有了制空权还能瘫痪战线以北占数量优势的志愿军地面部队的机动能力，妨碍其进攻计划的实施，联合国军有制空权后使得志愿军认识他们在朝鲜的绝望处境。

1952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显然已经达到22个空军师和1830架飞机的预定实力，大约有1115架飞机集结在满洲境内的机场上。1952年上半年，苏联在远东的空军部队所有的飞机也达到了大约3560架的编制机数稳定在7000架左右，其中约5000架属于苏联，2000架属于中国，还有大约270架属于北朝鲜。美国远东空军当局于1952年11月获悉，中国已经接收了100架最新式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轻轰炸机。并将其配置在满洲。中国在远东的空军实力不仅数量上超过了联合国军，而且比联合国军拥有更多的新式飞机。

由此可见，中国空军的建设规模及强大威力，就像一把尖刀刺入威兰的心中。

敌人对志愿军的空军配属设施也关心备至。有一份写给他们

148 上司的报告中这样记载着：

共产党空军建立一个由25个预先警报雷达站和11个地面控制截击雷达站组成的巨大雷达网。他们利用这个雷达网提供情报，保证设在安东的中共与北朝鲜的联合作战中心能及时命令米格—15截击机紧急起飞。敌人的预先警报雷达的探测范围最远能达到三八线以南，而敌人的地面控制截击雷达的探测效率则以朝鲜西海岸一带，特别是安东以外围90里半径以内的地方最为有效。最初，志愿军只有一些七拼八凑的陈旧过时的雷达，其中有一些显然还是美国制造的，但到1952年下半年，共产党空军在安东设置了一台显然是苏联造的最新版的地面控制截击雷达，其性能与联合国所用雷达一样好。从1952年6月以后，共产党空军在防空作战方面开始使用种种地面控制截击设备，白天他们出动安东外围机场上的米格—15战斗机，夜间则混合使用喷气式和活塞式昼夜间战斗机。

共产党空军为了对他们在北朝鲜的军事设施进行就地防御，就在1952年冬将高射炮兵力加强了最高峰，一共约有786门大口径高射炮和1672门小口径高射炮。主要的大口径高射炮是苏式85毫米口径的M—1939型炮，有效射高约为25000英尺。主要的小口径高射炮是苏式37毫米口径的M—1939型炮，射速约为每分钟160发，有效射高约为4500英尺。共产党空军高射炮的配置是随着联合国军空军的攻击目标而转移的，但是大部分的大口径高射炮和炮瞄雷达，以及相当多的小口径高射炮，通常都集中配置在平壤、新安州、安东、新义州、水丰、和满浦镇的外围。共产党空军由于缺乏炮瞄

149 雷达，而且被迫使用昼夜战斗机执行夜间战斗机任务，因而广泛使用了探照灯，通常在安东、新义州、水丰、平壤和新安州大桥的外围都配置有二三十台，而在清川以北的任何地方，共产党空军所配置的探照灯通常都能将夜航飞机捕捉住。在晴朗的夜间，探照灯光柱都能照射到3万英尺高度。

足够数量的探照灯还附有雷达装置或枪声装置，当雷达装置或枪声装置判定飞机位置并进行跟踪后，其它用目视瞄准的探照灯就立刻开灯，对飞机进行集束照射。共产党空军的探照灯随时可以移动，经常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1952年6月以后，共军的防空体系已经包罗了战斗截击机、地面控制截击雷达、高射炮和探照灯，但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来说，主要威胁仍然是米格—15。志愿军的截击机不仅对我们顺利实施从空中施加压力的战略是一个威胁，志愿军米格飞行员的安全基地就在鸭绿江北岸，他们飞机实用升限高于联合军的任何战斗机，而且他们还有地面控制截击雷达的引导，因此志愿军空军在清川江以北称为米格走廊的空域内几乎占有空战的一切有利条件。1952年6月以后在朝鲜发现的将近90%的米格飞机，可以说都是在面积6500平方里，或者说容积65000立方里的米格走廊内活动的，由于敌人可以选择任何时机出动飞机，而且米格飞机几乎随时都可以从较高的高度上实施攻击，因此，早上适用的战术，到了下午可能就过时了。

从1952年10月开始，志愿军空军换装性能较好的米格—15BNC歼击机作战。并实行轮番锻炼。“加打一番”的作战方针，即在打机群的同时，积极寻打战机，低空隐蔽出航，初次轮战的

150部队以打战斗轰炸机为主，尔后逐渐同F—86掩护的混合机群中的中小机群作战，最后打大机群。

1952年10月29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安东召集会议，研究志愿军空军的作战问题，并就作战方针、部队轮换、指挥、增修机场、改善侦察通信工作和海上作战条件等问题作了指示，要他们积极作战锻炼志愿军空军，取得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沉重打击敌人。对彭德怀的指示，志愿军空军在“加打一番”的作战中认真进行了贯彻。

朝鲜7月，多云多雨季节。大自然的变化给志愿军空军起飞作战造成一定的影响。

1953年2月17日15时34分，志愿军空军指挥所陆续令第17师51团、49团起飞3个中队，到镇南浦大同江口一带打击美分散活动的小机群。第一个中队在镇南浦上空4000米高度发现美海军F4U飞机6架。2号机张国禄立即冲上去攻击，但速度过大而冲前。美机遭攻击后，利用其速度小、转弯性能好的长处，采取圆圈防御战术，相互掩护逃跑，张国禄以上升左转反扣的动作再次对第一、二、三架美机逐架连续猛烈开火，击落其中1架。第二个中队因听错命令，中途返航，未获战果。第三个中队在大同江口又发现美海军F4U飞机4架，随即投入战斗，2号机陈太渠、3号机耿东清、4号机李春梦各击落1架。这次战斗，志愿军空军共击落美机4架。

3月16日晨4时44分，美F4U战斗机4架、F—80战斗轰炸机8架在平壤以南活动。志愿军空军第16师48团起飞8架，由团长张卿云率领直趋镇南浦地区打击这批美机。到达战区后，张卿云首先发现F4U飞机2架，立即下令投入战斗，并率僚机向美1号攻击，开炮3次，将其击落。2中队长机鲍俊枝于镇南浦以东发现F—86飞机2架，即率队攻击，僚机黄美祥击伤1架。第16师首次空战，取得了击落击伤美机各1架的胜利。

151

3月间，美空军几次出动混合大机群，企图袭击朝鲜北部和鸭绿江沿线重要目标。志愿军空军积极予以反击。如3月13日12时9分至55分，志愿

军空军指挥部发现美空、海军出动 168 架飞机，编成混合机群，分为两个梯队，向北进袭。第一梯队 32 架 F—86 战斗机，先以 4 架沿东线直窜江界、楚山地区，用以钳制志愿军空军侧翼部队，继之以 12 架 F—86 飞机于高度 1.1 万米，由中线经平壤、安州窜向北镇、昌城一带，企图诱使志愿军空军主力东向，并阻击由昌城出动的飞机，随后以 16 架 F—86 掩护 16 架 F—86 战斗轰炸机，于高度 3000 米左右，沿西线经镇南浦直奔铁山，企图袭击安东江桥。第二梯队 F—86 战斗机 40 架紧随前一梯队之后，支援第一梯队作战。其余战斗轰炸机 64 架紧随前一梯队之后，支援第二梯队作战。其他战斗轰炸机 64 架，分散活动于清川江以南德川、永柔、沙里院等地区。另有海军飞机 16 架，活动于元山一带。当美机第一梯队 F—86 飞机进至永柔，战斗轰炸机进至镇南浦地区时，志愿军空军先后起飞 5 批 64 架飞机采用多梯队、多层次渗入的战法，插入美混合机群中寻找战机，第 17 师 49 团起飞 14 架飞机为攻击队，插入美机群之中打战斗轰炸机。第 12 师 36 团起飞 12 架飞机为掩护队，直接配合第 17 师 49 团作战。在各部队密切配合，第 17 师 49 团以机动灵活的战术动作，勇敢地钻进美混合机群之中，全团 8 人开炮，击落 F—84 战斗轰炸机 3 架，其他美战斗轰炸机盲目投弹慌乱回窜。第 12 师 36 团、第 15 师 45 团也都与 F—86 飞机进行了空战，并击落了 2 架。

1953 年 2 月至 4 月份，志愿军空军积极作战，取得了击落美机 70 架，击伤 21 架的战绩，基本上保证了鸭绿江沿岸至清川江志愿军地面部队抗登陆战役准备的顺利实施。

在此期间，第 12 师于 3 月底调回二线休整。4 月 7 日，空军有长将第 12 师参战 1 年零 12 天的作战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报告指出：第 12 师在所有参战部队中，是作战时间最

153 长的一个师，也是进步最快、战果最大（击落敌机率与自己被击落之比为 2 : 1）的一个师。该师的主要优点是：部队纪律严明，重视研究美空军的战术特点，注意吸取作战经验，具有优良的战斗作风。

1953 年 4 月，5 月间，美空军在不断轰炸破坏清川江南北铁路干线的同时，开始轰炸朝鲜北部产稻区的水库，企图达到淹没农田，破坏朝鲜北方经济的目的。在此期间，美空军用于空中战斗的已有 4 个 F—86 联队，320 余架飞机，其战术也有明显的变化。他们调来了一些飞行时间达 1000、2000 小时的所谓“王牌驾驶员”，组成“猎航组”，或隐蔽于万米高空的云上，或设伏在机场附近的山区上空，偷袭志愿军空军正在起飞或着陆的飞机。最初志愿军空军由于疏于戒备，曾吃过几次亏。后来加强了对起飞着陆的警戒，扭转了被动局面，粉碎了美空军的企图，并在一次空战中将美空军“猎航组”的“双料王牌驾驶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击落。

4 月 7 日下午，第 15 师 43 团的 12 架米格—15BNC 型飞机，在楚山、碧潼地区与美空军 F—86 机群空战后返航。他们在汉堡机场上空散开了队形，减低了速度，依次着陆。飞行员韩德彩和长机张牛科在掩护战友们安全着陆后，双机拉开了间隔距离，正准备着陆。当下滑至高度 1000 米时，耳机里传来了地面指挥中心的命令：“拉起来！快拉起来！有敌机！”韩德彩听到这急促的口令，当即拉起机头并稍压坡度，向四周搜索。他盯着远处飘动着的白云，极力想从云团中和云团边缘寻找美机的踪迹。忽然看到左前方有 2 架飞机，一前一后，以大坡度向左转弯，好像是在编队飞行。韩德彩立即警觉起来，当他下滑到 400 米的低空改平飞时，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喊声：

“拉起来！拉起来！敌人向你开炮了！”

韩德彩当即拉起机头，机警地向后半环搜索起来。碧空茫茫153没有敌机的影子。他继续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突然，在左前下方的300米处出现了两架正在左转弯的飞机，这是“双料王牌”费席尔的F—86正在追逐一架返航的我机。狡猾的费席尔一见张牛科的飞机高度低、速度慢，便立即放弃了前一架我机，拉平机身，调转机头，恶狠狠地扑向张牛科。

敌机刚一改平，韩德彩就立即认了出来。他马上大声呼叫：

“三号！快拉起来，敌人要向你开炮了！”话未讲完，敌机的炮声已经响了。长机尾部冒出了一股白烟。一见长机受伤，韩德彩受到莫大的耻辱，他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沸腾了。立即拉减速板，猛推油门，飞机急速跃升起来，闪电般扑向敌机。费席尔猝不及防，一下子被咬住了，他一见不妙，不得不放开张牛科，慌忙摆脱。韩德彩双眼紧盯着敌机，猛赶急追。

张牛科在韩德彩的掩护下，沉着地操纵着负伤的飞机，安全着陆了。

这时，韩德彩和敌机的距离在不断缩短。费席尔慌了。黔驴技穷，他使用了摆脱我机惯用伎俩，突然来了个下滑右转，企图诱我机下追，然后利用F—86优于我机的水平机动性能逃跑。但是，忙中出错。费席尔只顾逃命，没有想到他此时的高度仅800米，下面山高二三百米，往下滑动余地小，没有大的出路。韩德彩在这一瞬间准确地作出了判断。他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并料到敌机会很快拉起来，因此不仅没有追下去，反而轻轻一带机头，上升了一点高度。

这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费席尔一见下面有山，我机又未跟上，急忙向左上方拉起。韩德彩早就等在那里。他一见敌机抬头立即向左方截击。敌机的影子一下子套进瞄准具光环，他稳住机头，刚要按动炮钮，敌机又忽地不见了。

费席尔毕竟是个老狐狸，一见左转不妙，马上改为右转，这154

一手还真把韩德彩闪开了一段距离，但韩德彩迅速地一压坡度，呼地一下追了上去。这一下费席尔再也无法脱身了。在不到300米的距离上，韩德彩狠狠地按动了炮钮。“咚！咚！咚！”，炮弹准确地打在了机身和后尾之间，敌机“腾——”的一下窜出了团团烟火。费席尔一见机身起火，赶紧逃命。

费席尔的飞机应声变成一团上升的烟火，烟火中钻出一个大黑点，接着张开一顶粉红色的伞，慢慢往下降落。“快抓俘虏！敌人跳伞了！”

这次空战韩德彩回忆说：“从发现敌机，到把它打掉，最多不过半分钟，落地后我一看见长机张牛科已安全落地，身体一下瘫软了，好像是刚爬了千万座高山。半分钟的空战，那种消耗，那种体力和精力的释放，不是用几句话可以形容出来的。可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当看见长机被敌人击中，我感觉自己的眼睛都绿了，真恨不得跳出座舱把敌人抓住才解恨！”

费席尔跳伞后降落在裕太村砬子沟的公路上，他把手枪、子弹、美钞、日元全部扔掉，撒随就往山上跑。裕太村民兵接到通知，已经在那里等候了。费席尔惊恐地举起双手，民兵问他为什么往山上跑，他比比划划，意思是山上有志愿军，志愿军优待俘虏。

这位美国空中英雄对他被击落并不服气，审讯时他一再要求见见击落他的那位对手。

19岁的韩德彩走了进去，站在费席尔的面前。

费席尔用狐疑的目光把韩德彩上下打量了一番，双肩一耸，推开双手，摇动着蓬乱的脑袋，说：“对不起，长官先生，我不愿开这种玩笑。”

在费席尔看来，这个身材并不魁梧，脸上还透着一股稚气的飞行员，太年轻了，怎么可能有那么高超的空战经验和技巧呢？

韩德彩看着费席尔那种瞧不起人的样子，真想轮起胳膊让他

155 再尝尝拳头的滋味。

翻译告诉费席尔，打下他的这个人，今年 19 岁，参军后才学文化，在战斗机上共飞行不到 100 小时。

这个仅在侵朝战争中就出动过 175 次的费席尔顿时目瞪口呆，望着韩德彩，惴惴地问道：“……他们付你多少雇佣金？”

韩德彩一伸五指“五万万！…

“五万万美金？”

“五万万颗人民的心！”

4 月 9 日，美国通讯社——美联社从汉城发出一条消息：美国第一流的喷气式空中英雄、双料王牌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在 4 月 7 日作战中失踪了。

美利坚合众国又是一阵骚动。

白色的天宇，美机吃了不少苦头，在一驾驾飞机被志愿军击落的现实面前，美空军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夜间。敌人以为夜间才是他们活动的空间。而志愿军空军也早已走在了前边。为了迅速掌握夜间作战技能，打击夜间活动的美机，从 1951 年 10 月 1 日，志愿军空军总部开始筹划夜间训练和作战问题。

由第 2 师 4 团副团长张华、大队长钱焕章、副大队长阎磊、谭汉洲等 4 名飞行干部，到鞍山友空军部队学习夜间飞行。从 1951 年 10 月至 1952 年 1 月，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基本上掌握了夜航技术。接着由他们当教员，带领全团开展夜航训练。到 1952 年底，已有 28 名飞行员掌握了夜间简单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技能。

第 4 师在 1952 年 4 月间从一线机场返回辽阳休整后，于 8 月 6 日也开始进行夜航训练。首先由友空军帮助培养了 2 名教员，他们是李汉、林虎。尔后李汉、林虎又与友空军一起举办了夜航训练班，首批参训的有邹炎、赵明、耀先、侯书军、李永泰和第 3 师陈东山、王昭明等人。然后第 4 师自行组织训练，到 1953 年底共培养出 25 名夜航骨干。

156

1953 年 1 月 15 日，由第 2 师 4 团组成的一个拉—11 型歼击夜航大队，有 8 架飞机，8 名飞行员，由副团长王天保率领，从上海转至辽阳机场参战。由第 4 师 10 团组成的一个米格—15BNC 歼击机夜航大队，也有 8 架飞机，8 名飞行员，由副团长侯书军率领，于 1953 年 3 月 21 日从辽阳转至大东沟机场参战。

志愿军空军司令部为夜间作战规定的任务是，反击夜间侵入中国境内和窜犯清川江以北地区美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保卫鸭绿江沿线重要目标。作战区域在清川江一线，逐步前伸至平壤地区。

为便于夜航机作战和与高射炮、探照灯进行协同，在安州成立了以志愿军高炮指挥所吴昌炽司令员为首、老 11 师刘秀峰副师长为辅的小型夜航指挥所，统一指挥该地夜间空、炮、灯的协同作战，于 3 月 27 日开始担负作战指

挥任务。

两个夜航大队熟悉了本机场与一线基地的夜航设备、周围地形情况，研究了美空军夜间活动的规律及战术特点，进行了熟悉战区的航线飞行。指挥所研究和熟悉了如何组织夜间战斗起飞、出航与作战指挥引导、迷航处置等问题。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第4师10团夜航大队于4月10日开始担负夜间战斗值班。

夜战终于拉开了序幕。5月29日夜，我观察所发现多批美机在朝鲜北部活动。第4师10团副团长侯书军和领航主任宋亚民于30日凌晨2时5分先后起飞。侯书军高度5000米，宋亚民高度4500米，按照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的指挥，经铁山、宣川飞向战区。当侯书军飞至定州上空时，接到指挥所通报：“敌机2架，在永柔、顺川之间活动。”侯书军一面上升到6000米高度，一面向安州方向机警地搜索前进。他刚飞至博川以南上空，突然发现一个火光点从自己飞机的左后方一闪而过。他迅速左转弯追赶。但是，眨眼间，光点不见了，座舱外漆黑一片。侯书军根据指挥所通报的情况，飞向安州地区继续进行搜索。他细心地环顾周围的夜空，发

157 挥平时练就的目视发现目标的本领，又在自己的左前下方，看到一个闪闪的光点，像在夜行时看远处模糊的一盏灯火一样。侯书军定睛一看，这小小的光点在飞快地移动着。他赶紧加大油门，向着光点逼近，将它套进了瞄准具的光环，狠狠地发出一排炮弹。这时，侯书军隐约地看到一架美机正向上拉起，于是他也一抬机头，对准美机按动了炮钮，美机中弹起火向下坠去。

这是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在夜间击落敌机，它标志着志愿军空军在成长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2年8月声称：“虽然我们认为共产党可能希望达成停战协议，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或者没有看到什么迹象，能够表明我们对共产党所施加的压力已经足够了，已经足以使他们感觉到必须马上停战了。”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指示克拉克将军不必再在板门店提出什么新的建议，并指示他继续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一切可用的空中兵力，去攻击北朝鲜所有的军事目标。但是，从空中施加压力的战役显然还没有能够迫使志愿军屈服。

1953年6月初，在志愿军夏季反击战役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停战在望。当时战区气象复杂，但美空军仍出动飞机对朝鲜北部重要交通线、桥梁和机场等目标进行轰炸破坏，并企图在达成停战协议前，轰炸泰川、龟城、南市及永柔等地的水库、以冲毁铁路、公路、农田，使朝鲜北部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难以恢复。为了有效地保卫重要目标，志愿军空军克服气象条件不利的困难，连日起飞，以小编队多梯队战斗活动方式，低空与美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从6月中旬起至7月27日停战，共战斗起飞117批994架次，其中有39批338架次与美机空战，击落美机25架、击伤5架。

6月13日下午，战区云量8—10成，云高600—1000米。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注意到美机先后7次飞抵战区侦察天气，估计可

158 能有大机群出动，即令各部队迅速做好战斗准备。不出所料，14时许，美空军果然出动了250架飞机组成的混合大机群，向鸭绿江方向进袭。志愿军空军第3、6、12、15、17师起飞56架飞机，在友空军配合下，于中、低空飞至铁山地区，截住美机去路，经过一场激战，打退了美机的进袭。

美空军的预谋未能实现，仍不死心，连日派出机群活动，伺机进行轰炸

破坏。志愿军空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只要美机出动，马上起飞截击。6月19日，仍然是满天乌云，云高300—5000米，能见度4—6公里。11时36分至12时16分，美空军出动F—86战斗机16批116架，战斗轰炸机9批56架，组成混合机群，向安东方向进犯，企图轰炸鸭绿江桥，志愿军空军指挥所令第4师10团、第15师45团、第4师12团共起飞28架飞机，高4500米飞抵铁山上空，打击美机群中的战斗轰炸机，以保护鸭绿江桥不受攻击。第10团和第45团到达战区后，穿云下降投入战斗。但因缺乏经验，穿云时忘记互相通知，以致动作不协调，有的中队失去联系，有的形成单机，虽然个个英勇战斗，但仍被美机击落1架、击伤4架。后来第12团赶来支援，经过一阵激战，5号机李永泰击落美机1架，7号机施光礼击落美机2架，终于打退了美机的进犯，完成了保卫江桥的任务。

横跨于鸭绿江上连接中朝两国铁路运输线的大桥巍然屹立，满载着军用物资的列车通过这里源源不断地开向前方。美国空军处心积虑地要破坏这座大桥，6月24日上午又派出100多架飞机企图进行袭击。志愿军空军第6师16团、第15师45团、第4师12团奉命起飞32架飞机同友空军一起进行反击。志愿军空军的机群在铁山地区与美机机群遭遇，经过激烈空战，击落美机5架、击伤1架，迫使其余美机未敢北犯。战斗中，第16团飞行员李春吉表现十分勇敢。他在龙岩浦上空追击2架美机，入海30公里，将美长机击落。后遭另一架美机偷袭。李春吉在飞机中弹失去控

159制的情况下，于海面上空5000米高度跳伞，美机仍不断向其开火射击。他落入海中后，以顽强的毅力，与惊涛骇浪搏斗近7个小时，后安全返回部队，创造了志愿军空军海上跳伞成功的先例。

志愿军空军经过6月份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中低空作战，取得了一些经验，7月份，复杂天气更多。7月8日，空军党委分析6月份的作战形势，指出：抗美援朝作战已经两年多，美机几次企图破坏拉古哨发电站和鸭绿江桥，都未得逞，一定要把荣誉保持到最后。志愿军空军首长提出，坚决保卫重要目标，以取得新的空战胜利。促成停战谈判的成功。为此，强调不与美F—86战斗机纠缠，以免美战斗机乘虚而入，缩短各梯队出动的间隔时间，争取不间断地在保卫目标外围并消灭美战斗轰炸机；各梯队采取梯次直线往返穿插作战，并相互主动支援，集中一域，形成兵力优势。志愿军空军部队认真学习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中低空空战战术，利用一切可以起飞的天气积极出战，战斗情绪高涨。

7月16日下午，美空军出动混合大机群在清川江桥和宣川至清川江桥及云山、价川段交通干线上空活动。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判断美机有向铁山与昌城集中的可能，令第6师16团、第4师两个团和第17师51团先后起飞36架飞机到铁山地区上空作战。这次空战取得了击落美F—86飞机3架的战绩。

7月19日，志愿军空军又在复杂气象条件下进行了一次空战。当日上午，美空军派出两个机群袭击南新州和义州机场，遭到反击。下午15时至16时15分又出动一个由各型飞机168架组成的混合机群，企图再度袭击这两个机场。志愿军空军采取多梯队连续出击的战法，英勇反击。第6师16团12架飞机由曲成田带领为第一梯队，至义州上空打击美机。他们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投入战斗，打乱了美机的编队部署。3中队沈江瞄准1架掉队的美机，将其击落。1中队郭权武击伤美机1架。第4师10团8架飞机由褚福田带领为第二梯队，至义州上空与美机空战，褚福田将

160 美长机击伤，其余美机慌乱投掉炸弹逃窜。志愿军空军又一次完成了保卫重要目标的任务。胜利而归。

7月19日距离朝鲜停战的日子——7月27日，还有8天时间。在这几天中，虽有战斗机起飞，但无战斗，因此，7月19日下午的这一次战斗，成为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最后一次空战。这次战斗击落击伤美机的沈洪江、郭树武和褚福田，成为志愿军空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上，在最后一次空战中取得战绩的飞行员。

6 和平时刻，没有在胜利簿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将功勋系在蓝天的中国空军。

四道沟指挥所。

聂凤智看看手表，离全面停战还有 15 分钟，他信手点上支烟，爬上指挥所外面的山顶，照明弹、曳光弹五彩缤纷，映得夜空流彩，一片通明。

四道沟，就是在这个名不见传的地方，3 年来中朝两国空军的一切行动就是由这里发出的。

空联第一任司令员是刘震。

刘震在陆军是员战将，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当他换上空军的蓝裤子、走进这坚固、隐蔽的掩体指挥所时，就像站在了零的起跑线上。

用泰山压顶形容刘震当时的压力，实不为过分。

刘震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绘制他的现代化兵种指挥的蓝图。从指挥小机群到大机群乃至战斗机，轰炸机混合协同作战，从粉碎 161 空中霸主的“屠夫行动”、“撕裂计划”到“空中绞杀战”……空中态势愈来愈严峻，挑战一次比一次血腥，每次都要刘震拿出决心，想出对策，制定作战方案。

决心下了，对策、方案有了，这一切变成命令，机群升空了，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杀出了一个“米格走廊”，动摇了美国空军的“空中优势”。刘震又从飞行员的实战获得了经验教训，与刘亚楼切磋研究分析，总结出“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引起世界关注的军事理论，把空战战术创造性地引向了一个能攻善守的新高度。

刘震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为人民空军这一崭新兵种的地面指挥奠定了基础，这是人民空军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抗美援朝，毛泽东指示使用空军“以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让空军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据此，空军部队以师为单位轮番进入前线，进行实战锻炼，指挥机构也以军区空军机关为班底，轮番指挥，轮番锻炼。

1952 年盛夏，聂凤智走进四道沟指挥所，接过刘震的话筒，站在了司令员的位置上。

聂凤智说：“这时我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空中挑衅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

这一年的 9 月 7 日，聂凤智指挥的第一次空战。偏偏赶上气象复杂，天低云暗，能见度极差。情报参谋报告，远东空军出动了 100 多架战斗轰炸机大举进袭拉古哨发电站。偏偏又是一场大仗、恶仗。

聂凤智点上一支烟，打还是不打，一时决心难下。打吧，如此恶劣的天气，平时连训练都不大敢飞，担心造成意外损失，何况现在面对的是百架敌机的实战，不打吧，眼看拉古哨大型水利发电枢纽即遭毁灭，这个损失太大，而且也助长敌人的气焰。

指挥室静静的，作战参谋、情报参谋、通讯参谋……屏声敛

162 气，默默地注视着这个身高仅有一米六几，威慑力却能穿透钢壁的司令员。

打了一辈子仗，就是下令 27 军渡长江、攻南京、战上海的时候也没这么决心难下。标图板上，敌机的踪迹一秒秒向前移动，像毒蛇逼近吐出的舌，连犹豫的时间也不给了，聂凤智拿起话筒，给空 3 师下达了出动 16 架飞机的作战命令。这之后聂凤智的眼睛再不离开标图板。烟一支接一支，他身边的

参谋说，聂凤智早晨走进指挥所，点燃香烟，然后就用烟尾对烟头，直抽到晚上出指挥所，一天一根火柴就足够了。整个朝鲜空战天天如此。他的夫人说，老聂到空联司上任，别的东西不查点，单问香烟带足了没有。他说，香烟比老婆好，无论紧张、激动还是一筹莫展，它都能调节你的情绪，给你智慧和力量。

标图板显示不出战绩，而空战又不同于陆军作战，地面指挥不可能深入前沿当场得知胜败。这段时间是最难捱的。

参谋长终于把空中射击胶卷送来了。这天空战击落击伤 5 架 F—86，米格被击落、击伤 6 架。5：6。平心而论，稚嫩的我军空中勇士同美国老牌的飞行高手交战，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已属不易，况且我 16 架对敌 100 余架，敌我悬殊又这么大。但我们空军飞机少，底子薄，飞行员尤为宝贵，拼不起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讲，此仗没有打好。

空 3 师议论纷纷，无论当面背后，大家直言不讳，各抒己见，态度之激愤，言辞之尖锐，都是聂凤智始料不及的。

“这样打法，不要几次就把飞机搞光了！”

“聂凤智指挥陆军还行，指挥空军就不行了！”

“他妈的，瞎指挥！”

第一仗没打好，聂凤智本来心情就很沉郁，听了这种种议论，他再也坐不住了。一个指挥员不能以精湛的指挥艺术服众，这是一种耻辱。同志们珍惜年轻空军的荣誉，直率地提出批评和意见，163 又使他看到今后胜利的源泉，聂凤智当天到空 3 师，坐到了飞行员中间，让他们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面对着一张张年轻的脸，一双双含怨的眼，聂凤智又一次为战士们的忠诚、坦率感动。他诚恳地和他们交换意见，直率地说：“仗没打好，这是事实，责任在我。同志们在恶劣天气下作战，打得很苦，很顽强，值得我学习。同志们爱护飞机爱护空军的荣誉，更使我受到莫大的鼓舞。我是个土包子，从陆军到空军时间不长，指挥空战是个新兵，是个学生，但是我愿意从教训中吸取经验，在战争中学习本领。这毕竟是第一仗，今后要打第二仗、第三仗……志愿军军歌中有这么一段词，中华好儿女，齐心打豺狼。只要我们上下合力，同心同德，一定能完成祖国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

空 3 师的飞行员们大鼓其掌，说：“聂凤智有大将风度。”

聂凤智不回避矛盾，不掩饰自己的不足，他给飞行员讲自己的故事。他说红军反围剿，他当连长，一次上级交给他个新任务，让他带领部队去打国民党的汽车，他很有章法地在公路旁埋伏了一个通宵，天将亮时，一群轰轰隆隆的家伙在公路上出现了。副连长问：“打不打？”他仔细看了那玩艺半天，说：不打，这是火轮船，咱打老蒋的汽车。天亮后上级首长批他，说他把敌人的汽车放过去了。他打了个立正：报告首长，我这里没过汽车，只过了几只火轮船！

聂凤智揭自己的疮疤，旨在缩短自己和现代战争的距离，他深深感到新的军种建立和运用，并不意味着新的战术的诞生和完备。新的武器的最佳性能在生熟练驾驭指挥之间，也会出现不相适应的过程。严峻的现实已不允许空军的领导干部囿于昨天一套，必须用现代战争的新知识充实“小米加步枪”的老学问，给我军的传统作战理论赋予新的生命力。

聂凤智不是站在空联司的指挥台前才意识到自己和时代的差距。他从小参加红军，识字不多，思想却异常地活跃。也许天性 164 如此，凡是新鲜的

东西，他都有兴趣。有一次战斗缴来了一辆国民党的吉普车，打潍县之前他和几个师长勘查地形，招呼他们上车。师长一边笑一边说：“你开‘火轮船’啊？我们不坐，我们还想多活几年呢！”一个个推推桑桑地上了大卡车。

那时聂凤智 30 岁出头，很利索地跨上吉普车，并不觉得这玩艺有啥难摆弄的，捣鼓了几下子，对驾驶员说：“我开，你压阵。”小车上了路一气开出几十公里，越开兴趣越高。天旋地转，四个车轮子朝了天。……几个师长的卡车赶到，聂凤智和驾驶员正从车里往外爬，一身泥，倒没受伤，几个师长全乐了，聂凤智说：“帮个忙吧。”七手八脚把吉普车翻转过后，聂凤智又坐到驾驶员的位置上……

到四道沟后，上下班聂凤智都是自己开车，他说这样快慢随意，还可以节省一名司机。

这时他的驾车技术已经十分娴熟，一般司机都比他不过。这在当时的高层领导中，实属罕见。除此之外，摆弄无线电、打猎、钓鱼、打牌、跳舞，聂凤智都是高手。

不过在四道沟的时候，除了星期六晚上偶尔可以跳跳舞，别的闲情逸致都顾不上了。聂凤智的脾气是干脆、专一、一丝不苟，他把这种作风带到了四道沟。

当年给聂凤智做侦察参谋的陆伟根回忆说：聂司令员脾气很大，一进指挥所谁也不敢嘻里马哈。他的脚步一响，所有参谋肃立，等候他到来。第一个报告的是侦察参谋，接着是气象参谋、通讯参谋、作战参谋……所有的报告中，只允许侦察参谋说“可能”，其它汇报一律要求精确，不容丝毫误差。空战结束了，战绩报上来，如果是场大胜仗，聂司令员像孩子似地一笑，大家就知道有趣的时候来了。在休息室里这个给司令员倒来茶的，那个给司令员拉过一张椅子，司令员开始侃大山啦。他字写得歪歪扭扭，口才极佳。一个简单故事、笑话，让他一说，绘声绘色，令人捧腹大笑，一身的疲劳全无踪影了，这时参谋跟他开玩笑，逗乐，偷他的香烟，干什么都可以。战情一到，司令员起身就进指挥室，严肃、紧张，一切如初。

当年的情报科长沙林说，聂凤智是我见到最聪明的人。聂凤智诙谐、风趣、思维敏捷，集思广益，他那非凡的凝聚力像磁性极强的电磁场，每一个靠近他的人都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磁化。参谋们在他手下一个个充满自信，浑身冒精气神儿，所有能量被他调动起来，每个人都三头六臂地能干，聂凤智又善于把这些能量、智慧吸收过去，这使他的指挥才能迅速提高，充分显示。

1952 年 10 月，距他指挥的头一仗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情报，敌人大机群活动，目标鸭绿江桥、鸭绿江边机场。当时苏联顾问、空联司副司令员兼朝鲜人民空军司令员王链、志愿军空军一线轮战师 5 个师长都在指挥所。

“敌 51 大队、4 大队起飞了。”侦察参谋报告。聂凤智一抬浓眉，目光盯住侦察参谋。

“情报可靠，两个大队起飞 115 架 F— 86。”唯一能说“可能”的侦察参谋陆伟根报告。

聂凤智嗖地把目光射向陆伟根。

“据前线观察哨报告，头批起飞 20 架 F— 86，我分析是佯攻。”陆伟根补充报告。

当时防空情报网有三道：雷达、侦听、地面观察哨。苏联顾问只相信雷

达，为此聂凤智和顾问常起分歧。

从标图板上出现的敌机轨迹看来机群并不大。这是主力还是佯攻呢？无论是把主力当佯攻，或者误把佯攻当主力，结局都不堪设想……

“再不起飞就来不及了！”苏联顾问提醒。

聂凤智细眯着眼，仍是一口一口吸，一口一口吐，一口接一口。166

“嘘——”

所有的人长吐了一口气，标图板上的蓝箭头，到了清江口往回返了。

40分钟后，情报参谋报告：51大队又起飞了。

聂凤智说：“来真的罗！”拿起话筒，向待命的空3师、空4师、空12师下达了起飞命令。

沙林说，如果敌人佯攻我们就起飞，我们刚上去敌佯攻机正好返航，我机最大续航时间为40分钟，等我们落地，敌主力正好打我们个措手不及，那样起码是半个师覆没。

聂凤智文化水平低，却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手下的侦察参谋陆伟根是个大学生，先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考入四川大学，学英语，又到美国留学。侦察参谋熊德伟，父亲是牛津大学教授，本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侦察员、翻译员都是聂凤智向陈毅要来大学里的高材生。这批人吃过黄油，喝过牛奶，到了四道沟吃高粱米，倒也兴冲冲的，他（她）们说，关键是司令员重用，心情舒畅。熊德伟有一天找到聂凤智：“我们的高射炮炮位有问题。”他把图纸展在聂凤智面前。“B—29航线是固定的，我找出它们的规律，制成图纸，如果炮位这么一变，B—29飞过来就丧命。”

倘若聂凤智指挥的第一个空战算作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那么这笔学费在日后填补了一个现代化兵种指挥经验的诸多空白。

有人曾问聂凤智，在朝鲜战场上感受最深的是什么？他极干脆他说：累！那种导致身心异常紧张的压力和精力高度集中的负荷，非身临其境的人，恐怕是难以体会到的。而且当时几乎天大有情况，天天在指挥所里，天天与疲劳不堪作伴。饭也吃不好，这边刚捧上饭碗那边偏偏来了敌机，只能打完仗再吃，一顿饭要热上几次。觉睡不安，每天凌晨3时起床上山进指挥所，晚上八九点钟下山以后，还要开会，给军委发电报。敌情频繁时，白天晚上167上连轴转，几天几夜不合眼，抽烟却达到了个人的最高纪录，每天要烧掉四五包不带过滤嘴的中华烟……

陆伟根回忆说：那时候，聂司令员累得睡在床上说梦话还在指挥，常常早晨醒来发现人已经掉在地下。有一次正吃着饭，饭碗从手里掉下来睡着了……

陆伟根说着，动了感情。

1953年7月19日下午，聂凤智指挥空4师10团、空6师16团共20架飞机，打了朝鲜空中战争的最后一仗。这一仗，空6师沈洪江击落美机1架，空4师堵福田、空6师郭树武各击伤美机1架。

至此，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两年零八个月，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实战366批4872架次，击落美空军、海军和参与侵朝战争的其它国家的空军飞机330架。击伤95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飞机231架，被击伤151架。116名飞行员牺牲。

1953年7月17日，一线机场一派肃静，起飞线上一架架飞机整齐列阵，飞行员整装待发，坐在机舱里，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扩音器。在那

里，将要传来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司令员发布的停战令。

久久期盼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7月17日，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可是因为朝鲜停战协议要在这天签字，它就成了值得人们永远记忆的一天。

这一天，牵动世界“神经”的板门店，天空晴朗，夏风宜人，以它特有的风姿记录着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上午9时，板门店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专程前来采访这条“头号新闻”的世界各地的记者有200多人，他们三五成群的交谈着议论着。从汶山来的各国记者，由对方代表团新闻联络官勒苟负责联系；从开城来的各国记者，由我方代表团新闻联络官沈建图负责联系。当记者们看到这奇迹般的大厅时，不少人翘起大拇指说：共产党人办事效率真高，没想到一夜间竟从地下钻出一幢崭新的建筑。

大厅内布置得庄严实用。按事先的商定，朝中方面的人员出入西门，联合国军方面的人员出入东门。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内，只要与双方代表团有关的设置和用品，都是对称的、平等的。大厅正中，向北并排排列着两张长方形的会议桌，会议桌中间是一张方桌。方桌两侧双方各仁立两名助签人员，桌上铺着绿色台呢，西边的桌上立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东边的会议桌上立着联合国的旗子。大厅西部一排排的长条木凳是朝中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东部的长条木凳是联合国军方面人员的席位。大厅北面凸字形的部分是双方新闻记者的活动区域。那长方桌上摆着朝鲜停战协定及附件的方本，有朝文、中文、英文共18本，其中我方准备的9本用深棕色皮面装帧，对方准备的9本封机上印着联合国的徽记，是蓝颜色的。三种文字均须双方核定，一字不差。待完成正式签字后，双方各保存一份（中、朝、英文3本），另一份（中、朝、英文3本）由军事停战委员会保存。

9点30分，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各有8名佩带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

随后，双方出席签字仪式的人员分别由指定的东西门入厅就座。10点整，大厅里一片安静。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从大厅南门进入大厅，分别在会议桌前就座。两位首席代表在本方助签人员的协助下在自己一方准备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员，同时交换文本，再在对方交来的9本停战协定上签字。之后，由助签人员把这9本停战协定带回去尽速送交司令官签字。

这场不寻常的签字仪式，由于双方工作人员作了周密的安排，进行得很顺利，两位首席代表在10分钟之内要在18个本上签字，虽说紧张但有条不紊。

169

事先已商定，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哈里逊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签字仪式于上午10时10分结束，南日大将、哈里逊中将从分别同本方人员起身退出签字大厅。

7月27日，“联合国军”的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坟山的帐篷里，在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当然，他所以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要从这里得出什么有益的教训，而仍然是从冷战反共立场出发，鼓励人们下决心要反共到底。他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

道这件事并未结束——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在我们这一生将不会结束。”

同一天，南日大将带着协定文本赶往平壤，当晚零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也签了字。

7月27日下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司令员崔庸健次帅的陪同下到达开城，下榻在来凤庄。彭总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开城前线举行的盛大宴会。并于7月28日上午9时30分于志愿军代表团新修建的会议室里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彭德怀签字后，面对用血肉写成的文本，对在场的将领们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谈话。

“我在签字时心中想：先例既开，来日方长，这对人民说来，也是高兴的。但当时我方战场组织，刚告就绪，未充分利用它给敌人以更大打击，似有一些可惜。一句话，实现人民的和平愿望压倒一切。”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同时公布了内容包括5条63款朝鲜军事停战协定和有关附件的全文。

根据协定，双方控制下的一切武装力量，包括陆、海、空军的一切部队与人员，于双方代表团首席代表签订停战协定后12时起，即7月27日朝鲜时间下午10时起，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为，而停战协定和附件及其临时补充协议的一切其他条款，亦一律于170停火的同时开始生效。一切军事力量，供应和装备将于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内从非军事区撤出。

当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向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停战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这令山河倾倒的声音，响彻朝鲜三千里江山，中朝人民为之欢腾了。

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7月27日晚2时。同一个时间里，驻守在军事分界线两侧的双方军队的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在横贯朝鲜中部200多公里长的军事分界线上同时停止射击、轰击和一切作战行动，海军和空军部队也停止作战行动。同一时间里，开城前线志愿军指挥部通过战地电话网命令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和高射炮兵部队在规定时间内全部停火。同一个时间里，板门店中立区两侧的砂川江和大德山一线我军陆地上的高音扩音器不断播放着停战、停火消息。

来自当天的报纸报道说：“连日来，朝鲜半岛一片欢呼，沉浸在庆祝胜利的喜悦之中。7月28日平壤市各界人士数十万人隆重举行庆祝朝鲜停战实现大会。会场上彩旗飞舞，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歌声震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他号召全朝鲜人民为了达成祖国和平统一，在‘一切为了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战后人民经济’的口号下继续努力。”

为了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历史功绩，7月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会议举行授勋典礼，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勋章。同时，对于长期战斗在朝鲜半岛上的志愿军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人员分别授勋，给予了崇高的荣誉。授予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有功人员的勋章，是朝鲜同志派要员由平壤专程来到开城代表团驻地授予的。

北京，8月11日，在召开的欢迎彭总胜利归来的大会上。人们的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大会由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主持，他代表全国人民高度赞扬了志愿军赴朝作战2年零9个月，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为祖国、为人民

取得了荣誉、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郭沫若在大会上高呼，“光荣属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实践者！”“光荣属于英勇善战的志愿军的英雄们！”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彭德怀精神抖擞登上讲台，他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致意，一直到彭总行了严肃的军礼会场才安静下来。彭总代表志愿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的湖南口音，一句句输入人们心坎里。他说：“3年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执行祖国人民的意志，和英雄的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经过了严酷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光荣的胜利。这个胜利与光荣应该归功于英雄的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归功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人民！”彭总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24次会议，听取了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对板门店谈判的经过，其中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朝鲜停战谈判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停战谈判。它既不是帝国主义者征服了别的国家、强迫别国接受投降条件的停战谈判，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地盘、相持不决，只好以妥协瓜分殖民地谋得短暂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是一个想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到年轻的新兴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停战谈判。很显然，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谈判是不会甘心情愿地接受的，他无时无刻不在企图翻案，因此，朝鲜停战不能不说是一场异常尖锐的、复杂而长期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的斗争。”

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一页。

172 第八章 血海狼烟

1 陆海空协同作战，一江山岛奏响了辉煌的交响乐章。

经历抗美援朝战火洗礼的中国空军回国后，经过总结学习，飞行技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发展。

此时，中国人民将目光投向沿海岛屿，投向被国民党控制之下的辽远国土宝岛上……

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在退守台湾、澎湖列岛、金门、马祖的同时，还占据着浙江沿海和大陈岛为中心的一些岛屿。在大陈诸岛上部署有 1 个师 6 个突击大队，建立了“大陈防卫区司令部”，并经常保持 8—12 艘军舰在附近海域游弋，总兵力达 2 万余人，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向大陆派遣特务，封锁海上交通。武装抢

173 劫商船，破坏渔业生产，并企图将这些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中央军委于 1954 年 7 月命令，由华东军区统一指挥陆、海、空协同作战，解放浙江沿海国民党军队所占岛屿。华东军区根据敌情、地理、气候等具体情况，决心首取一江山岛作为夺取大陈诸岛的突破口。

打开中国的版图，在右下角处一片绿色汪洋的海水里，座落着一个小岛。它那美丽的名字令人倾慕。一江山岛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距大陆 13 海里，东南距大陈 7.5 海里，是大陈诸岛的重要据点。该岛面积只有 1.7 平方公里，但国民党驻军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已构成了永久、半永久性工事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担任防守的为“一江山地区司令部”及其所属第 4 突击大队、突击大队 4 中队和炮兵中队，共 1000 余人。防守部队装备有部分小口径高射武器，并可得到大陈岛上远程炮火的支援。

1954 年 8 月 11 日，华东军区发布预先号令，决定以步兵第 20 军第 60 师的主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攻占一江山岛。华东军区在宁波建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张爱萍任司令员。浙东前指下设登陆指挥所、海军指挥所和空军指挥所。空军前指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曾克林、安志敏任副司令员，纪亭榭任参谋长。

空军前指发布的战令上，这样写着参加这次登陆作战行动的航空兵部队：空军第 20 轰炸师，第 11 强击师，第 3、12、29 歼击师，独立第 1、2 侦察团，海军航空兵第 1、2、4 师的部分兵力。

空军的主要任务是：以歼击航空兵协同地面防空部队，夺取和保持战区的制空权；以轰炸、强击航空兵集中兵力突击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军舰，切断国民党军对大陈诸岛的后勤补给的兵力增援，以小机群连续对大陈、波山、渔山等岛屿的军事设施进行轰炸，隐蔽进攻一江山岛的企图；支援陆、海军部队登陆，攻战一江山岛实施航空侦察等。

空军前指研究认为，要确实有把握地完成上述任务，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从指挥机关到部队，对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缺乏理论知识，没有实践经验；二是作战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与执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特别轰炸、强击航空兵没有经过复杂气象和海上训练，突击陆面固定目标的命中率尚不高，突击海上、岛上的点状目标或活动目标更无把握；三是对国民党军所占岛屿的军事设施，军舰的性能及其活动规律等情况不熟悉，没有可靠的资料。

为了解决以上难题，前指首长们的脑海里立即涌现出二十几个字的对

策，那就是：学习理论、建立机构、敌前练兵、航空侦察、战场准备、政策教育、协同计划。一时间，前指的角角落落忙碌起来，就是在开饭的饭桌上，指挥员们以碗筷做兵种，展开了战前攻岛演练。

很快，解放一江山岛的作战计划诞生了。这一天，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指挥员的会议正在进行，浙东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宣布了如下决心：一江山岛登陆作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海、空军部队一部夺取战区制空权、制海权，掩护陆、海、空三军参战部队进行战前训练；第二阶段以陆军第60师的4个步兵营，于临战前隐蔽进入头门山、高岛待机地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在白天高潮时对一江山岛实施登陆突击。

决心已经下定，但张爱萍的恩绪却反复无定，他更一次为这个不同寻常的战斗打着腹稿。他那敏捷的思维流过一座座山头，流过一片片海浪……，他深知如下道理：夺取战区制空权是保障登陆作战顺利实施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一江山岛登陆作战争夺制空权的斗争，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因素，人民解放军空军不能采取以突击机场的方式消灭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国民党空军由于基地距离战区较远，飞机装备陈旧，也无力突击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基地和组织大规模的空战，争夺空中优势。双方只能以单双机或小机群活动的方式，进行空中争夺战，

175 来达成各自对战区的空中掩护。

这时，他翻开国民党空军的有关资料，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国民党空军有7个飞行大队，作战飞机约400架，其中美制F—84、F—47战斗机为其主力，并开始装备F—86战斗机，其飞行员技术较好，40%以上能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作战。他又联想到自己的空军，我们在歼击航空兵部队装备的米格—15BNC歼击机性能较好，但大多数飞行员技术水平较低，只能在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

他回忆起发生在3—7月间的与国民党空军的几次空战经过：

3月18日，华东海军舰艇2艘在三门湾与国民党海军舰艇3艘展开激战，国民党空军先后出动各型飞机10批38架次进行支援，驻浙东沿海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及时起飞迎击，海军航空兵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F—47飞机2架。

5月11日，国民党空军2架F—47飞机，利用复杂天气向大陈岛飞来，海军航空兵出动2架米格—15BNC飞机拦截，在大陈、松门一带上空将其击落击伤各1架。5月15日夜间，华东军区陆军部队攻占东矾列岛以后，从5月16日至20日国民党空军出动各型飞机78架次，企图轰炸人民解放军守岛部队和海军舰艇。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先后连续起飞，以优势兵力予以打击，取得了击落6架、击伤3架的战绩。

7月6日清晨，国民党空军出动4架F—47飞机，企图袭击定海的海军舰艇。驻宁波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连续起飞4批8架米15BNC飞机迎击，其中空军第3师大队长李瑞仿、飞行员丁品贵双机和飞行员周乃、宁有臣双机将其截于舟山上空。F—47飞机采取防御、且战且退。李、周两个双机轮番进行攻击，空战17分钟，李瑞仿击落击伤F—47飞机各1架。经过这几次战斗，国民党空军遭受沉重打击，被迫停止了昼间到大陈海域上空进行巡逻掩护活动。有时夜间出来活动一下，一见大陆的飞机起飞截击，迅速176逃逸。这样，实际上在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的准备过程中，大陈、一江山岛以北地区的制空权已经基本上被我空军所控制。

最实际的分析，加强了前指首长的决心，在争夺制空权的同时，以空军为主，协同海军鱼雷快艇和海岸炮兵，集中突击大陈海域的国民党军舰，同时轰炸大陈岛上的军事目标，以达封锁敌占岛屿的目的。

1954年11月1日，按浙东前指命令，执行第一阶段预定计划，开展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拉开了序幕：当日天气晴朗，11时，歼击、轰炸、强击机从各自的机场呼啸而起，准时到达会合地点集合编队。首先由空军第11师副大队长王玉峰率领4架伊尔—10强击机，压制大陈岛上的高射炮阵地，保障轰炸机对军舰的突击。王玉峰四机采取低空进入，所投炸弹90%命中目标。接着，空军第20师60团团团长张伟良率领9架图—2轰炸机，突击大陈港内的国民党军舰，由于发现目标太晚等原因，所投炸弹未命中目标。

11月2日至12月21日，空军前指又连续组织轰炸机、强击机小机群，先后轰炸一江山、渔山、波山和大陈等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国民党军舰。这次轰炸行动，摧毁了岛上的一些军事目标，但对军舰的突击仍未奏效。为此，参战空军部队指战员认真总结教训，改进轰炸军舰的战斗队形和投弹方法，并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

自从人民解放军空军连续出击轰炸，特别是11月14日人民解放军海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以后，国民党海军活动于大港海域的舰只，昼间一般都在港外流窜，夜间才偷偷摸摸地回到港内。

1955年1月10日，浙东沿海刮起了大风，风速每秒达17米，聂凤智司令员判断国民党海军舰艇不会出海，只能停泊在大陈港内，决定抓住战机，集中兵力突击，奇袭大陈港。这一天，从6时17分至16时43分，共出动各型飞机130架次，分4次对大陈锚地的国民党舰进行了猛烈轰炸。

战斗中，强击航空兵部队英勇顽强，不畏艰险，克服风速超过允许飞行条件的困难，坚持连续出动。他们勇敢地冲过层层高射炮火网，有的飞机机翼被击穿，仍毫不畏惧，接连炸伤国民党军舰3艘。空军第11师31团飞行员刘健汉尤为果敢沉着，投入的4颗100公斤炸弹，有3颗直接命中“衡山”号修理舰。

执行这次战斗任务的轰炸航空兵部队，由副师长张伟良率领28架图—2轰炸机，冒着恶劣的天气条件，低空隐蔽出航，直飞大陈岛。张伟良深知这次战斗的重要。加强舱里他目光炯炯，沉着而镇定，张开的“神经雷达”密密搜索四面目标。突然，在港湾“三号锚地”发现1艘褐色军舰，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赠给国民党政府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该舰全载4000余吨，乘员130多人，可装运轻型坦克20余辆。在这艘军舰的外侧海面还停着6艘小艇。在“五号锚地”停着1艘深灰色的军舰，那是“太和”号护航驱逐舰，周围有几艘小艇正惊慌地向它靠近，想借舰上的高射炮火作为“保护伞”。他判明情况后，立即果断地定下决心，一面率领1、2大队突击“中权”号坦克登陆舰，一面命令3大队轰炸“太和”号护航驱逐舰。他们冒着炮火的威胁，英勇沉着地对准目标投弹。在空中，张伟良看到地面港湾处，烈火冲天而起，遮住了海港的面孔。他心里明白那是他们投下的1颗250公斤炸弹落在了“中权”号的右舷，这艘舰内装载的汽油、猛烈地爆炸燃烧了，烈火把“中权”号吞没了。在1、2大队轰炸“中权”号的同时，由副团长宁福奎率领的3大队在“五号锚地”也炸伤了“太和”号。张伟良是一个久经锻炼的指挥员，1940年当他12岁时加入抗日游击队，在陆军时参加和指挥过多

次战斗，立过战功，4次负伤。这次战斗后，张伟良和他的战友宋宗周均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178

在封锁大陈诸岛的一系列战斗中，空军前指先后共组织出动各型飞机297架次。1955年1月10日战斗后，国民党军舰变成了吓掉魂的乌龟，日夜在暗水里，再也不敢轻易在大陈岛海面活动。

浙东前指在1955年1月12日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张爱萍司令员宣读作战令：1月18日，向一江山岛发起登陆进攻。浙东前指赋予空军的任务是，保持制空权，保障陆、海军部队的集结、航渡和登陆进攻，掩护海、空军基地的安全，实施航空火力突击，主要突击岛上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炮兵阵地、火力点和指挥枢纽，以强击航空兵进行直接火力支援。在战斗准备和实施的全过程，以歼击航空兵梯次出动，在战区上空保持我1个中队至3个大队的兵力，随时准备截击来袭的国民党空军飞机，控制战区的制空权。

空军前指要求参战空军部队严格执行协同作战计划，做到准时出动、准时到达、准确突击。

1月18日这一天，黎明来得特别早。晨曦中，海岸线上的炮群、海港里的舰船，机场上的战鹰，昂首待发，天空中降下的微雨悄悄作响，似乎在等待一个难忘的时刻的到来……

凌晨4时11分，空军第一批歼击机呼啸出动，掩护集结于头门山、高岛等地的登击部队完成登舰起航的准备，随后168架歼击机分批在战区上空巡逻，护航在我方阵地，兵力的行动已造成强大声势。8时至8时15分，空军以图—2轰炸机3个大队、伊尔—10强击机2个大队，对一江山岛纵深集团工事和主要火力支撑点，实施第一次航空火力突击。空军第20师60团副团长宁福奎、副大队长高臣林率领的2个轰炸机中队，摧毁和破坏了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北一江山主要支撑点—160高地上的炮兵阵地、高射机枪阵地、地堡的掩蔽部。与此同时，以轰炸机、强击机各1个大队，突击大陈岛守军的指挥和远程炮兵阵地，使其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此时，只见一江山岛的地面上，浓烟聚起，火光冲天，轰鸣声压过海浪阵阵传来，令人振奋不已。179

12时12分至14时27分，地面炮兵、海军舰炮等相继袭击一江山岛前沿阵地。12时15分步兵第一梯队开始航渡，13时22分先后抵达一江山岛前沿海面4000米处海域展开，炮兵对滩头阵地进行火力袭击。

14时至14时14分，空军又以图—2轰炸机3个大队，对一江山岛纵深的核心工事和指挥机构，实施第二次航空火力突击。其中由第20师副团长刘忠清、中队长陈子华率领的2个轰炸机中队，摧毁和破坏了国民党军“一江山地区司令部”的全部营房，轰炸机中队摧毁了岛上中的迫击炮阵地、高射机枪掩体及堑壕。在与此同时，还出动图—2轰炸机2个中队和伊尔—10强击机1个大队，压制正向登陆部队炮击的大陈岛上的榴弹炮阵地，炸毁了大陈岛上的雷达阵地。

14时33分，轰炸机机群退出战区以后，又以伊尔—10强击机2个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前沿阵地进行俯冲轰炸。强击机编队根据登陆部队战斗进程，及时进行直接火力支援，连续实施俯冲轰炸扫射，压制岛上守军的火力点。他们根据空中观察到的情况，主动支援登陆部队迅速向纵深发展。当登陆部队遭到火力阻击时，强击机飞行员就从空中直接压制对方火力。强击机每俯冲攻击一次，步兵就冲锋一次。有一飞行员炮弹打光了，燃料不多了，仍向

对方阵地实施俯冲。伊尔—10 飞机低空呼啸而过发出的巨大的轰鸣声，把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吓得落魂落魄，纷纷躲藏起来。强击机密切配合战斗行动，有力地支援了陆军部队的登陆突破和纵深战斗。

14 时 30 分，步兵第一梯队登陆。 17 时 3 分，攻占全岛。只见海岸一线上，我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般，呼啸着迅速向敌岛扑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敌人慌了手脚，个个抱头鼠窜，整个小岛一片哀救声。当时，取得击毙守军 518 人、生俘国民党第 4 突击大队长王辅弼手下官兵 567 人的辉煌战果。

180

18 日这一天，空军前指共组织出击各型飞机 238 架次，其中歼击机 168 架次，轰炸机 72 架次，强击机 48 架次，投掷各种航空炸弹 851 颗、 127 吨，发射枪炮弹 3741 发，其中轰炸一江山岛投弹 93.69 吨。战后检查，空军炸毁各种火炮阵地 5 处，指挥所、雷达站各 1 处，破坏火力支撑点、掩蔽部、地雷区 25 处，营房数十间及部分地堡、堑壕等工事。事后，担任登陆第一梯队营营长孙勇对记者说：“当我们占领敌人前沿阵地时，空军在支撑点上轰炸扫射，压制和歼灭敌人的火力点，保证我们向前发展。其实，飞机离我们只有几十米。这样紧密配合，太过瘾了！”国民党军防卫一江山岛的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俘后在审讯中供认：“在 18 日那天，你们飞机来轰炸和往日不同，过去炸完就走，这次轮番轰炸。烟雾遮盖了整个一江山，所有电线全部炸断了，部队完全失去了指挥，很多炸弹都落在阵地和工地上。……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外边死了多少人，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2 反袭扰旗开得胜，18师首战告捷，福建人民说：现在我们的天空也解放了。

我军攻占一江山岛的胜利，刺激了美帝国主义及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把仇恨的目光投向大陆。海峡吹来蒋介石“加速反攻大陆”的叫嚣。1958年7月中，美国公然下令驻守在远东地区美军进入戒备，并加强了北起冲绳、南至菲律宾的海、空巡逻。7月17日，台湾当局也令其陆、海、空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并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沿海进行侦察。

为了打击美国当局的嚣张气焰，严惩国民党军队的挑衅活动，181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日夜兼程，从内地迅速完成了向福建、粤东地区的战略行动。空军部队进驻福建、粤东地区后，与国民党空军展开了激烈的空中斗争，夺取了福建、粤东地区的制空权，胜利地完成了配合陆、海军炮击金门和金门进行封锁的作战任务。1953年7月18日，中央军委召开有各总部、军兵种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彭德怀副主席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他说：目前美、英两国继续向中东增兵。国民党军队以策应美、英在中东的战争行动，正蠢蠢欲动，台湾海峡出现了紧张局势。为了有效地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一是空军进入福建，二是对金门打炮。空军一定要在7月17日进入福建、粤东作战机场。为稳妥可靠，要采取以小进求大进的方法，逐步推进。

空军党委连夜召开常委扩大会议。7月19日，紧急召集第一批入闽作战的师以上负责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会议的精神并决定采取有力措施，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挑衅。

7月19日9时30分，空军发出部队行动命令。伴随着台风暴雨传达，我空军指战员不畏艰苦，越过被大雨冲毁的大小桥梁43座，踏过塌方的公路、铁路，风雨兼程，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展开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一江山岛的战斗硝烟未散，迎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战斗又打响。7月29日，粤东沿海浓云密布，不时有雷阵雨。11时，我空军观察所发现，在浓重的云层中，有F—84G飞机4架，裹着云层，低空向汕头方向进袭。此时，在汕头机场的航空兵第18师54团早已准备好一切战斗准备。担任第一批战斗起飞的是大队长赵德安、飞行员黄振洪、中队长高长吉和飞行员张以林。11时零7分30秒，赵德安等4人驾驶米格—17飞机升空。飞机在细雨中收好起落架，发现云底高只有200米。赵德安意识到，如按惯例182以单机穿云，到云上集合编队，很可能延误时间，错过战机，于是他毅然决定在高度150米的云下编好队，从云隙上升，出云后高度1000米出航。

这时，担任地面指挥员的师长林虎向空中飞行员通报：“F—84G4架，在右前上方，注意搜索！”赵德安回答：“明白”。飞行员们加强机继续爬高，并向右前上方搜索。11时11分，飞至南澳岛附近空域，高长吉在右前上方距离5000米处发现F—84G2架，立即报告带队长机。林虎从无线电中听到后马上纠正：“不是2架，是4架！”高长吉仔细一看，果然是4架。赵德安随即令高长吉、张以林双机攻击，他和僚机黄振洪掩护。

在指挥所里，林虎审视了战区的形势，估计战区只有这4架国民党空军飞机，没有后续梯队接应，他立即下令：“你们周围没有别的情况，大胆沉着地攻击！”

在南澳岛上空，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

首先，高长吉、张以林咬住4架飞机的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作右转动作，企图迂回过来绕到高的机尾后，张以林正处于敌机内侧，迅速发射出一串炮弹进行拦阻，迫使敌1号机停止右转改为左转，敌2号机紧跟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条件，他对准敌机狠狠击发，二炮齐射，命中的2号敌机像折断翅膀的乌鸦一下栽到大海里。这时，在高长吉后上方的张以林，连忙蹬舵，推下机头，咬住敌1号机。敌机立即下滑作急剧动作，企图逃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在相距150米时连开数炮，将其左翼打掉一块。敌加强负伤的飞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弃机跳伞。当高长吉、张以林攻击敌长机组时，敌僚机组绕到高、张飞机的后面，为其长机组解围。赵德安立即迎上前去，瞄准敌3号机，开炮3次，将其击伤。敌见势不妙，调头向台湾方向逃去。

1833分钟的空战，干净利索，赵德安4机击落国民党空军F—84G飞机2架、击伤1架，自己飞机无一损伤，获得全胜。事后，美国合众国际社一则电讯称：超音速的共产党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令国民党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斗。首战告捷，揭开了入闽作战的序幕，给了国民党空军以严厉打击。空军对这次作战有功人员给予提前晋衔、晋级奖励，并号召所有部队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

此后，空军又连续取得了对空作战的胜利。

8月7日，国民党空军由其主力——第5大队上校副大队长汪梦泉亲自出马，率领F—86飞机8架，掩护2架RF—84，企图对晋江、惠安等机场进行侦察。刚进入大陆上空即遭到驻漳州航空兵第9师8架“五六式”飞机的截击，空战5分钟，汪梦泉驾驶的F—86飞机被人民空军飞行员岳崇新击伤。

8月13日12时许，国民党空军又出动RF—84飞机2架，在8架F—86飞机掩护下，侦察福州机场。当天上午才进驻该机场的海军航空兵第4师起飞4架米格—17飞机迎击，在闽江口上空将这2架RF—84飞机击伤。

8月14日10时39分，航空兵第16师46团出动8架米格—17飞机，在平潭岛上空与国民党空军11架F—86飞机遭遇，在兵力处于劣势、飞行高度又比对方低的不利条件下，飞行员周春富猛插敌阵，一举击落F—86飞机2架，击伤1架。但他自己也被击落，光荣牺牲。

从7月29日至8月22日期间，入闽航空兵部队共出动飞机255批1077架次，空战4次，四战四捷，共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4架、击伤5架，而自己仅被击落1架。

8月15日16时45分至18时，国民党空军集中F—86飞机48架活动于金门以东上空，并以8架飞机进入漳州附近。其中航空兵第9师的8架“五六式”飞机在漳州上空与F—86机群遭遇。184飞行员刘维敏同4架F—86飞机格斗14分钟，从高度1万米打到800米，击落F—86飞机2架。不幸的是，当刘维敏正追击另一架敌机之际，却被地面部队高射炮部队误当敌机而击落。此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成功战斗，但也暴露了空炮协同上存在的漏洞。当时，中央军委责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前往漳州专门研究解决空炮协同作战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空炮协同作战的原则，

一次胜利，浸染着人民空军将士的心血，也激起了台湾当局的复仇心理。他们望着架架飞机葬身于蓝海之中，心中如火焚。于是从台湾海峡的另一岸掀起了罪恶的狂飚。

为稳定军心,国民党空军于9月24日发动了自台湾海峡局势紧张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中攻势。那天,国民党空军出动F—86飞机126架次,RF—84侦察机14架次,对北起温州、南至汕头沿海的人民解放军海、空军基地强行侦察,并伺机进入大陆上空寻机空战。其中F—86、RF—84型飞机24架指向温州方向,并第一次使用美制“响尾蛇”空空导弹。

福州军区空军对国民党空军使用空空导弹未事先察觉,而对其次要发动大规模空中攻势早有准备。他们采取连续出击,区分梯队,层次配备等作战方法,起飞各型歼击机248架次及时迎击,但国民党未敢大批深入,只有2批16架F—86到德化、三都澳上空,分别遭到航空兵第14师和第16师起飞拦截。16师飞行员击伤F—86飞机1架,14师飞行员击伤1架。

进入温州地区上空的国民党空军机群,遭到驻路桥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截击,飞行员王自重击落F—86飞机2架后,被一架F—86飞机发射的“响尾蛇”导弹击中。

9月24日空战,尽管国民党空军下了很大赌注,不仅突然使用空空导弹,但并没有得到便宜,相反,连同提供“响尾蛇”空空导弹的美国,遭到世界公正舆论的谴责。1951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指出:台、澎、金、马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国干涉。建议举行谈判加以解决。但是,国民党当局不听劝告,又于10月10日发动了一次空中攻势。

这天,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约400架次活动于台湾海峡上空。其中由第5大队少校指导员路靖率领的1批6架F—86飞机,于7时左右窜至福清、龙田地区上空,当即被航空兵第14师副师长李震率领的8架米格—17飞机拦截,展开了空战。就在迎战的机群里,有飞行员杜凤瑞驾驶的一架。他黑红的脸膛,健壮的胸肌,是一个典型的中原汉子。这时杜凤瑞将飞机拉起,升到一定的高度,迅速占据有利地位,对着不可一世的敌机连开数炮,F—86敌机击落,飞行员张乃军跳伞被俘。接着他又击落了另一架F—86飞机,与此同时,杜凤瑞的飞机也受重伤,失去操纵机敏的杜凤瑞立即跳伞,凶狠的敌机对跳伞的杜凤瑞也不放过,紧追射击杜凤瑞英勇牺牲。向杜凤瑞射击的飞机也未逃脱覆灭的命运,当即被部署在该地的空军高射炮击中,栽进了汪洋大海。

杜凤瑞是一个只飞过330小时的新飞行员。1933年7月生于河南省方城县,少时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15岁参军。在陆军任司号班长,立过战功,1952年调入航校学习飞行,他以坚强的毅力,学习文化,努力钻研飞行技术,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飞行员。为继承发扬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64年国防部将杜凤瑞生前所在的飞行中队命名为“杜凤瑞中队”。

10月10日的空战,国民党空军的6架F—86飞机被打掉了3架,人民空军只损失飞机1架。但台湾当局为了欺骗舆论,中央社发表消息声称:“在空战中,我击落中共米格—17型飞机4架,击伤2架,另与我机互相撞毁1架”,“我机除张乃军少尉所加强的军刀飞机1架撞毁共机1架后,壮烈牺牲外,其他5架军刀机都已安全飞回基地。”并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张乃军“解救战友”,

186“奋不顾身”,“壮烈牺牲”的情景。这一编造出来的“胜利”消息,由蒋介石在台北寿馆主持的“四十七年国庆纪念大会”上宣布,“引起了文武百官的欢呼”。事实上,张乃军在10月10日的空战,既没有“解救战友”,

“与中共相撞”，更没有“壮烈牺牲”，而是被杜凤瑞击落后当了俘虏。战后第二天，新华社记者问张乃军是怎样被击落的？他说：“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情况时，突然觉得机身猛一抖，顿时失去了知觉，我转过来的时候，飞机失去了操纵，我只好跳伞。”

自10月10日战斗后，由于国民党空军迭遭打击，再也没有出动大量飞机与人民空军争夺制空权。台湾海峡的形势也逐步缓和下来，此后，福建地区的空中斗争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在一片似乎空寂的背后，却酝酿着风暴。

站在厦门市沿海的海岸上向东了望，在碧水港湾的对岸，屹着一群小岛，那就是国民党军队固守的大小金门岛。它们并肩而立，形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金门、小金门总面积130多平方公里。

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后，将金门岛作为防守台湾的前哨和“反攻大陆”的基地。国民党军队在岛上设有“金门防卫司令部”，1958年7月驻有6个步兵师，配有各种炮400多门，总兵力8.5万人。金门距大陆较近，又处在围头、莲河、厦门、镇海三面包围之中，岛上主要军事目标均在人民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构成了对其实行封锁的有利条件。

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决定，炮击金门：

1958年8月23日17时30分至18时55分，福州军区的地面炮兵和海岸炮兵，在一声令下后，万炮齐发，炮弹像万条火龙直捣金门的国民党军队的老窝。此次攻击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使国民党守军遭受重大损失。随后根据中央军委“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方针，对金门岛连续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封锁。

“八·二三”炮击金门后，空军于8月28日调1个探照灯排187（4个部灯）部署于厦门前沿阵地，协同地面炮兵作战。自9月2日起，每天从19时30分，每隔10至15分钟照射1次，对于夜间封锁金门通外海的航道，为炮兵指示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9月23日和15日，由侦察航空兵独立第2团大队长姜东多带队，以米格—15BNC侦察机6机编队，两次包括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小担等岛屿在内的350平方公里的地域进行航空侦察。由于组织严密，行动隐蔽，清晰地摄取了岛上的军事设施，为指挥机关和炮兵部队提供了准确的目标资料。

制人于死地，莫过于扼住他的咽喉。金门被封锁以后，台湾当局对金门的供应，主要依靠海运，也进行一定数量的空投。昼间空投时，一般由国民党空军出动F—86机群掩护。中央军委决定抓住战机对国民党空军空投运输机予以打击，使其断粮断草，陷入困境。航空兵第16师48团1个中队担任打击空投运输机的任务。

打击空运的战斗随即打响。10月3日1时零2分，我空军发现台湾出动C—45运输机24架，并有48架F—86飞机掩护机群接近金门海域上空，飞行高度1.2万—1.3万米。15时40分前后，福州军区空军命令驻边城、汕头机场的部队起米格—17飞机24架，飞至接近金门的同安、漳州、漳浦地区，在1.2万米左右的高度上，吸引牵制在金门海域上空担任掩护的F—86机群。与此同时，林晋江机场起飞4架米格—17飞机，由第16师48团团团长曹双明带队，低空隐蔽出航。飞至围头以北35公里处，2号机方洪义首先发现第一架空投C—45运输机，当曹双明发现这架运输机快接近金门时，加速追赶，可是他立即发现地面高射炮火的威胁，于是决心先打第一架，连续

3次开炮，将其击落。2号机方洪义，3号机余耀忠接连攻击第三架C—45运输机，亦将其击落，其余运输机见伙伴一一葬身大海，都中止空投，调头向台湾飞去。曹双明四机一举击落C—45运输机2架，安全返航。经这次突然打188击后，台湾当局从10月4日起不得不停止了昼间向金门的空投。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宣布“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自由地运输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7天以后，又令福建前线部队“炮击再停两星期。”从此，进入“停停打打”阶段，基本解除了对金门的封锁。

精兵是练出来的，雄鹰是飞出来的，空军的首脑们更加理解这句俗语的内在含义。

鉴于台湾海峡形成双方对峙的局面，空军决定将福建地区作练兵场，组织有实战经验的歼击航空部队进入闽南轮战，每次轮战以团为单位，时间8月至10月，并且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事实证明，这种轮战，对空军的组织指挥，战术技术水平和快速能力的提高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入闽作战，是继抗美援朝之后，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作战行动。入闽空军部队自1958年7月18日受领作战任务，至10月底为止，为时3个月零13天，共出动飞机691批、3778架次。空战13次，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14架、击伤9架；高射炮兵作战7次，击落2架、击伤2架，共计击落击伤国民党空军飞机27架，俘飞行员1名。参战空军部队被击落飞机5架，击伤5架。

在入闽作战中，人民空军不仅完成了作战任务，而且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入闽作战日记之一：

1961年8月2日8时50分，国民党空军RF—101侦察机1架，以150米的高度，900多公里的时速，由台湾径直向福建闽江飞行，由于高度太低，雷达没有发现。9时零8分15秒，当这架飞机在闽江口露头，即被置在梅花镇的对空观察哨发现并连续报出：“4号（指正方向）、高度400（米），航向福州！”8分20秒，各级指挥所和所有炮连均收到情报。9分26秒，各炮连2.5万米至1万米距离捕捉到目标。10分30秒，位于前沿的高射炮兵第

189105师503团2连连长孙秉臣首先下令开火，随后所有炮连相继打响，在集中猛烈炮火的打击下，这架RF—101飞机连续中弹，坠毁在福州机场西南14公里的南屿镇附近。驾驶员国民党空军少校分队长吴宝智跳伞被抓获。

这次战斗从发现情况到RF—101飞机坠地历时3分20秒钟，其中部队用10至20秒钟完成了一等战斗准备，7至8秒钟求出了射击诸元，当飞机一进入高炮火网，即中弹爆炸，充分地体现了“以快制快”战法的威力。

入闽作战日记之二：

1965年3月18日9时44分，国民党空军两架RF—101飞机从桃园机场起飞。航空兵第18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沈科，10时12分令副大队长高长吉加强歼—6起飞待战。10时23分雷达在汕头东南165公里发现目标，高度500米。沈科根据国民党空军以往的活动规律，判断可能由南向北从靖海入陆侦察汕头机场，即令高长吉从待战空域出航，高度1.1万米。10时34分，RF—101果然由靖海入陆，时速1000公里，高度8500米，并继续升高，10时35分国民党飞机发现被拦截，即放弃侦察，增速回窜。高长吉打开加力，在超音速条件下勇猛追击，追上面的一架，在距离600米时三炮齐发，打得RF—101凌空爆炸。这架加强飞机的国民党空军第6大队辅导长

张保弃机跳伞坠入海中。

入闽作战日记之三：

1967年1月13日13时，国民党空军的1架RF—104侦察机在4架F—104战斗机掩护下，进入福建晋江上空，高度1.1万米，时速2000公里。驻漳州的航空兵第24师先后起飞两批8架歼6飞机拦截。空军第8军指挥所领航员董福成果断地引第一批歼—6飞机在时速小于对方600公里的情况下，以大角度迎敌。3号机飞行员胡寿根采取斜对头拦阻射击，发射炮弹48发，一举击落F—104飞机3架。创造了在负速度差条件下，实行大角度攻击，击落敌机先例。

入闽作战日记之四：

1956年6月23日，国民党空军B—17飞机1架，从浙江路桥以南进入大陆，高度约2000米。衢州机场的空军航空兵12师值班指挥员、副参谋长吴云山判断情况准确，指挥果断，令该师34团团团长鲁氓加强米格—17飞机，两次开炮，于23日1时许将其击落。该机坠于江西广丰县岭底乡境内，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拯民以及8人丧命。

入闽作战日记之五：

夜间，粤西、桂东地区云量10成，云高260—500米，局部地区有阵雨，能见度差。20时58分，国民党空军B—17飞机1架从雷州半岛上空入陆后，飞行目标时断时续。驻广州航空兵第18师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判断，这架飞机可能进入防区，遂令指挥所“一号班”上阵。23时零8分30秒，又令该截击大队中队长蒋哲伦驾驶米格—17飞机起飞拦截。在领航员王金彰、谭流光的引导下，蒋哲伦从云隙中出航，在35公里长的有效截击地段，抓住5、6分钟的战机，使用机上雷达距离3.2公里发现目标，2公里截获，两次开炮，将这架B—17飞机击落。飞机残骸于广东恩平县境内，机上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等15人全部毙命。

3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U—2 飞机销声匿迹了，蒋介石终于安静下来了。

60 年代，国民党空军使用了美制 RB—57D、U—2 飞机等高空侦察机对大陆实施战略侦察。空军使用当时仅有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机动设伏，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创造了击落美制国民党空军 RB—570 飞机 1 架、U—2 飞机 5 架的辉煌战果。

国民党空军用高空侦察机窜入大陆进行战略侦察，始于 1957 年 12 月。最初使用的是 RB—57A 侦察机。这种飞机的续航时间 7 至 8 小时，最大时速约 1000 公里，飞行高度 1.5 万公里左右，其性能在人民解放军装备的歼击机的打击范围内。1958 年 2 月 18 日 RB—57A 飞机 1 架进入山东半岛地区被海军航空兵击落后，国民党空军停止使用这种飞机进入大陆活动。1958 年 3 月 12 日，由美国飞行员直接驾驶 U—2 飞机入侵中国内地侦察，对此，中国政府多次提出抗议。随后，美国将 2 架 RB—570 侦察机交给台湾当局，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继续对中国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RB—57D 型飞机的性能比 RB—57A 型飞机优越，主要是飞行高度增大至 1.8 万公里，而这个高度在米格—19 歼击机的实用升限（1.75 万公里）之上，故难以对其攻击。RB—57D 飞机装有 4 部航空像机，在高度 1.85 万公里实施航空照像，可摄取长约 1000 公里，宽 7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从 1959 年 1 月至 3 月，该机进入大陆 10 架次，活动地区遍及福建、浙江、江苏、广东、湖南、湖北、安徽、贵州、四川、河南、山东等 13 个省市。空军虽然起飞歼—5、米格—19 歼击机 109 批 202 架次拦截，其中有 106 架次的飞行员发现了目标，但终因飞行高度够不上而无法攻击。

空军如何打击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多次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提高歼击机升限高度，同时加速地空导弹营的组建和训练，力争在 1959 年国庆节前完成防空任务，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对于提高歼击机的升限高度，采取拆去一些机上设备，减轻飞机重量的措施，经反复试飞，仍达不到截击 RB—57D 飞机的飞行高度。此时，地空导弹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1959 年 4 月底基本完成地空导弹营的组建，营的主官都是从空军各兵种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军政素质较好的团一级领导干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经过突击训练，掌握了指挥、操作和兵器维修技术。9 月上旬进入阵地，9 月 21 日正式担任作战值班。其作战指挥由北京军区空军负责，军区空军下设地空导弹群指挥所，指挥员由第 3 训练基地主任张伯华担任。这些组织准备工作都是在保密情况下进行的。

10 月 7 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英钦驾驶 RB—57D 飞机 1 架，于 10 时零 8 分从浙江温岭上空进入大陆，飞行高度 1.8 万公里，后经南京升至 1.92 万公里，越过沿途歼击机的层层拦截，沿津路上空大摇大摆地北进。11 时 21 分，当 RB—57D 型飞机距离北京东南 480 公里时，部署于北京的地空导弹营进入一等战斗准备。11 时 50 分，地空导弹第 2 营在距离阵地 135 公里处，打开制雷达无线，115 公里捕捉到目标。此时，北京军区空军指挥所命令 2 营：“坚决消灭敌机！”

当 RB—57D 飞机距阵地 100 公里时，2 营完成导弹的接电准备，距离 70 公里时接通发射架同步，转入自动跳跃。2 营营长岳振华即果断下令发射导弹，12 时零 4 分 3 发导弹腾空而起，飞向目标，立即将这架 RB—57D 飞机

击落。飞机残骸坠于东南 18 公里处，飞行员王英钦当即毙命。

这次战斗，开创了新中国空军和世界防空作战史上第一次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例。为此，国防部予通令嘉奖，给全营记二等功，营长岳振华等人受到晋升军衔的奖励。战后，朱德、李富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罗瑞卿、蔡畅等领导人亲临该营阵地视察，并向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慰问。

为保密起见，这次战斗未作宣传。当时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对中国以何种手段击落国民党高空侦察机，纷纷猜测，但中国新闻机构始终保持缄默，未泄真情。

国民党空军的 RB—57D 被击落后，对大陆的高空侦察间断达两年三个月之久，直至 1962 年 1 月才改用 U—2 飞机又恢复侦察活动。

U—2 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为美国情报机关特制的高空侦察机。该机于 1955 年 8 月第一次试飞，1956 年 3 月下旬，美国以全国航空咨询委员会发布新闻的方式，宣布试制成功，谎称它将在美国空军气象局的后勤和技术支援下，“用来研究湍流及气象方面的情况”。实际上从 1957 年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即将它当作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工具。U—2 飞机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滑翔性能好，飞行高度可达 2 万余米，续航时间达八九小时，该机的航空照像设备可摄取宽约 150 公里、长约 3500 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并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1960 年台湾当局将美国接收的 U—2 飞机编成“第 35 气象侦察中队”，挑选飞行技术好，飞行时间在 2000 小时以上，具有空中侦察经验的人员担任飞行员，该中队隶属于国民党空军总部情报署，实际上是美国情报机构控制的一个战略侦察中队。

国民党空军接收 U—2 飞机后，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和准备，于 1962 年 1 月 13 日起进入大陆侦察，至 6 月底出动 11 架次，活动范围除新疆、西藏外，遍及全国各地。

经中央军委批准，空军决定使用保卫要地的几个地空导弹营，在 U—2 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6 月 27 日地空导弹第 2 营首先转到湖南长沙设伏，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空军领导机关认真分析 U—2 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第 2 航线，发现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福建方向有航空兵部队调动时，通常都要出来侦察。于是 8 月 27 日，将地空导弹第 2 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为出敌不意，该营打破教令的规定，没有将阵地选在平坦的地方，而是选在丘陵之间的一片松树林中，面积减小了二分之一。为诱敌使 U—2 飞机出击，9 月 7 日空军令驻南京的 1 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 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 1 架，以 0.8—1 万米的高度，直飞南昌以南某空军基地。

果然不出所料，9 月 9 日 6 时许，国民党空军的 1 架 U—2 飞机从桃园起飞，7 时 32 分经过平潭岛，以 2 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8 时 24 分经九江左转，直飞南昌。8 时 32 分当它进入第 2 营火力范围时，该营营长岳振华抓住战机，沉着指挥，顷刻间 3 枚导弹腾空而起，当即将这架 U—2 飞机击毁。该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 15 公里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身中弹片，经抢救无效丧生。

这次战斗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开展机动作战获得的第一次战果。事实证明，机动设伏的地点选择是正确的，诱其出击的战术运用是成功的。周恩来总理闻讯后，高兴地说：“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9 月 15 日，首都各界 1 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 U—2 飞机的胜利。9 月

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了岳振华击落U—2飞机的情况汇报，并给空军部队以极大的鼓励。该营荣立集体一等功。

国民党空军U—2飞机的窜扰活动虽然遭到打击，但它通过电子侦察，也摸到了萨姆—2型地空导弹的工作频率，相应地在U—2飞机上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用以向飞行员发出具有地空导弹威胁的报警信号，使飞行员操纵飞机机动逃脱。1963年3月至9月，U—2飞机深入鼎新、兰州、西安等地侦察时，3次临近地空导弹营设伏地，均因其使用预警系统，及时变了飞行航向，避开了火力范围。其中9月25日，1架U—2飞机侦察西安地区，地空导弹部队先后7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均被U—2飞机发现改变了航向逃避，未获战果。因此，能否有效地对付U—2飞机上的预警系统，虽然可以接收到地空导弹制导雷达的信号，但从接收到信号至开始实施机动一般要在20秒钟的时间，要击落它，就要在这20秒钟上作文章，针对这一情况，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压缩开制导雷达天线的距离，即由规定的距目标75里开天线压缩至43—45公里开天线；二是快速完成射击操作动作。即将原来开天线后需做的14个动作中的9个在开天线前做好，其余5个力争在开天线后几秒钟内完成，保证开天线后迅速抓住目标，立即发射使U—2飞机来不及机动逃脱。9月25日战斗以后，又经精心计算，将开天线的距离压缩到38公里以内。实行这两个办法，对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和部队操纵兵器的技术动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各营进行了几个月的艰苦训练，逐步掌握了这种作战方法。这种近距离开制导雷达天线，快速进行战斗操作的作战方法，空军部队称之为“近快战法”。

从1963年1月至9月，U—2飞机7次进入大陆的情况分析，其中有6次经过浙江、江西交界的徽州、江山、弋阳、上饶一带。据此，空军决定将地空导弹部队调至这一带机动作战。同时，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指示：“将4个营统一部署，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网。”于是把4个地空导弹营从西安和北京机动到上述地区作战，由南京军区空军和第3训练基地组成集群指挥部，实施统一指挥。各营经过紧张行军，于10月29日先后进入阵地，构成从弋阳至衢州160公里的拦截正面。

为了组织这一次作战行动，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于10月29日同部队一起到达设伏地点。他在检查各营战斗准备时，发现有此工作尚未就绪，即于11月1日主持召开各营营长、政委会议，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思想，督促落实“近快战法”。会议开始不久接到报告：台湾出动1架U—2飞机，7时43分从温州进入大陆。随后沿衢州以东地空导弹部署的外侧，向西北方向飞行。当时分析，这架U—2飞机很可能到西北地区侦察的，回航时还可能经过设伏地区。为不暴露部署，成钧决定各营兵器作好伪装，抓紧准备，歼灭回航敌机。

11时15分，该机从甘肃鼎新折返，果然由原航线返回。14时零5分，各营的目标指示雷达在200公里的距离发现目标，高度2.05万米，时速750公里。14时11分过九江后，飞向地空导弹2营阵地。指挥员下达命令：“2营负责消灭敌机，其他各营作好佯动和射击准备，制导雷达开天线距离压缩到37公里以内！”当U—2飞机距2营阵地61公里时，为隐蔽制导雷达频率，该营先使用炮瞄雷达向制导雷达指示目标。距离60公里时，接通导弹发射架同步。但当敌机距阵地39公里，正要测定射击诸元，制导雷达即将开

天线时，炮瞄雷达突然丢失目标。在这紧急关头，营长岳振华当即命令改用目标指示雷达，指示目标少测定射击诸元。距离 35 公里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8 秒钟内陆续发出 3 发导弹。14 时 18 分，这架 U—2 飞机被击剧烈爆炸！残骸坠落于江西广丰县万罗山附近，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叶常律跳伞被擒。

叶常律曾两度获国民党空军“克难英雄”称号，这是第三次驾驶 U—2 飞机进入大陆侦察。当记者问他被击落的情景时，他说：“当我飞到上饶附近时，已经看到海岸，心想已完成任务，正准备出海降低高度下滑着陆，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巨响，自己被甩出飞机，失去知觉，醒来后才按降落伞，估计在空中飘了两、三分钟，落到了地面……”。

这次战斗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二次击落 U—2 飞机，胜利的喜讯立即传到了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向作战部队表示祝贺，并致以慰问。聂荣臻元帅指示：这次作战，做到了战术和技术的密切结合，要好好总结经验。

地空导弹第 2 营营长岳振华，原系高射炮兵团长，担任营长 5 年来，领导全营指战员苦练技术，钻研战术，作战指挥机智果断，勇于负责，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 3 架，表现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

1963 年 12 月 26 日国防部授予岳振华“空军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64 年 6 月 6 日国防部授予第二营以“英雄营”荣誉称号。

胜利一浪接一浪，像碧空云海，翻滚着红霞。1964 年 7 月 7 日，地空导弹第 2 营在福建温州地区设伏，以运用“近快战法”，击落了第三架 U—2 飞机。当天上午，台湾出动 3 架 U—2 飞机进入大陆，分别在上海、广州侦察后向漳州飞来，一度出海又重新入陆，当 2 架 U—2 飞机接近漳州 100 多公里时，另 1 架 RF—101 飞机又低空进入汕头侦察。当时第 2 营只有 4 个发射架、4 发导弹，仅能对付其中的 1 架敌机。岳振华（此时已任副师长）沉着指挥，果断地决定打从南面进入的 1 架 U—2 飞机，在距离目标 32.5 公里时，指挥部队突然用制导雷达天线抓住目标，三秒钟内完成导弹发射前的操纵动作，接连发射导弹 3 发，这架 U—2 飞机猝不及防，中弹坠毁于漳州东南 7 公里的红板村。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号称“头号王牌”的少校飞行员李南屏，他曾 12 次驾 U—2 飞机侦察大陆而安然逃脱，这次却随机毙命。

地空导弹第 2 营四战四捷，战功卓著，毛泽东主席在空军战斗报告上指示：“很好，向同志们致敬祝贺！”他对周恩来总理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7 月 23 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领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 2 营全体指战员。

由于连续遭到打击，国民党空军在 U—2 飞机上又加装了回答式干扰系统，同时又加装了红外线照像设备，并开始夜间出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爆炸成功以后，台湾当局急于获取情报，两个月出动 U—2 飞机 10 架次进入大陆侦察，其中侦察兰州、包头地区 6 架次。1964 年 11 月 26 日清晨 2 时 37 分，1 架 U—2 飞机从福建连江进入大陆，5 时 10 分经过第 2 营在兰州设伏的火力范围，该营战斗准备、兵器操作和各项保障工作良好，但由于 U—2 飞机施放欺骗回答式干扰，发射的 3 发导弹，没有命中目标。罗瑞卿总参谋长指示：“要鼓气，不要气馁。认真找出没有打好的原因，接受教训。”空军副司令员成均当日赶到现场，同机动设伏的各营领导干部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过研究，

决定在制导雷达上加装新研制的反干扰设备,以对付 U—2 飞机上的回答式干扰系统,与此同时,各营加强反干扰训练,为熟悉回答干扰波形,找出了回答干扰的信号,研究出在干扰情况下选择真实目标信号的特点及有效措施。

1965 年 1 月 10 日,国民党空军出动 1 架 U—2 飞机,于 19 时 56 分由山东海阳入陆,高度 2 万米,时速 750 公里,经黄骅、大同、飞向包头,隐蔽设伏在包头市东南萨拉章地的地空导弹 1 营,在营长汪林的指挥下,正确使用“近快战法”,连发 3 发导弹,使 U—2 飞机上的预警装置和干扰系统未来得及使用,即被击落。该机驾驶员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张立义跳伞被俘,这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夜间击落敌机。该营荣获国防部记一等功的奖励。

1965 年中国自制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随着部队的增多,不仅重要保卫目标有地空导弹部队设防,机动设伏的部队也相应增加。1967 年 9 月 8 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出动的 1 架 U—2 飞机,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 2—2.05 万米,设伏在该地空导弹第 14 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 2 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 U—2 飞机 1 架。

1959 年 9 月至 1967 年 9 月,国民党空军 RB—57D、U—2 高空侦察机共进入大陆侦察 129 次,被击落 6 架。其中 U—2 飞机进入大陆 110 架次,被击落 5 架,生俘飞行员 2 名,从 1968 年起,国民党空军被迫停止派遣 U—2 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活动。

地空导弹部队机动作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战绩,主要原因:一是部队有很好的政治素质和优良的战斗作风。近十年来,执行机动作战的 18 个营,足迹遍及全国 20 个省、市、自治区,行程约 24 万公里。为了战斗胜利,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严守纪律,不论是严寒酷暑、风沙雨雪,说打就打,说走就走,历尽艰辛,以苦为荣。二是善于正确掌握国民党飞机的活动规律。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土地上,一架 U—2 飞机的活动,一次跨几个或十几个省、市,而机动设伏的兵力最少只有 4 个营,最多不过十几个营,每个营负责的拦截正面只有几十公里,要摸准 U—2 飞机的活动航线,其困难可想而知。但是中国空军指挥机关和地空导弹部队善于判断 U—2 飞机入窜大陆的企图,认真分析研究其活动规律,从而确定正确的部署。三是部队的行动做到高度隐蔽,每次机动设伏部队都进行轻装,人员着便服,夜间进入阵地。阵地选在山沟、丛林或便于伪装之处,打破了条令规定的框框。同时实行无线电静默,巧妙地实施佯动,因而保持了突然性。四是在技术战术上不断创新。部队创造的“近快战法”和采取各种反干扰措施,对付 U—2 飞机的机动和干扰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4 年 8 月,战争的脚步践踏到我国南方邻界的一片树林,湄公河溅起血花,美丽的椰林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这个在朝鲜吃了苦头的美帝国主义,又想在越南找到补偿。美国为了支持南越政权,制造了“北部湾事件”,悍然向越南北方发动空袭。顿时,中国西南边境蒙上了战争的阴影。

为了保卫中国领空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于 8 月 5 日下令有关军区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严密注视美军动向,以对付可能的突然袭击。

当时,中国空军在中南、西南边境地区只有南宁、遂溪、蒙自,昆明等几个机场,驻有 2 个歼击航空兵师部和 3 个具有作战能力的歼击航空兵团,在昆明设有 1 个军级指挥机构,沿边境一线部署少数雷达兵分队,防空力量

十分薄弱。接到了加强战备的命令后，空军对中南、西南地区的作战进行了通盘研究，基本指导思想是，既要适应紧急战备行动的需要，又要照顾到长远建设，将这一地区纳入国家防空体系的组成部分来进行建设。除命令昆指和广州军区空军等指挥机关立即进入战备外，将驻广东兴宁的空军第7军军部调往南宁，担任广西、雷州半岛地区的作战指挥；将驻浙江衢州的歼击航空兵第12师，驻福建漳州的高射炮兵第3师调至南宁，驻昆明的歼击航空兵第26师（遂溪）、9师（广州）就地做好战斗准备。另指定8个航空兵师又1个团为第二梯队。对雷达情报、通信导航、工程机务、后勤保障也作了相应准备，并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新建和扩建一批机场及配套的指挥保障设施。

战令在空军所属部队中传达着，战备立即到位，各类人员进入战备岗位，他们准备迎接比朝鲜战争更加严峻的斗争。

来自越南的战争威胁，空军指战员时时都能感触到。他们不能忘记，自从1964年8月中旬开始，美军出动战术战斗机在北部湾附近地区上空频繁活动，并不断将魔爪伸向中国领空。1965年3月2日以后，美军开始对越南北方边境轰炸，并使用B—52战略轰炸机实施夜间空袭。4月8日、9日美方出动军用飞机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并向中国海军航空兵担任警戒巡逻的歼击机发射导弹。鉴于此，中央军委决定对入侵中国领空美国军用飞机实行“坚决打击”。4月12日，空军制定了对付美机挑衅的作战计划中指出：空军部队既要准备在边境地区与美机打空战、反轰炸，还要准备在纵深地区打更大的、持久的空战和反轰炸。在南国的碧空下，空战很快拉开了序幕。8月29日，我空军指挥部队发现空中情况，美军从冲绳加手纳基地起飞1架DC—130运输机，在南海上空投放1架无人飞机，从海南岛海口入境，经南宁、兴宁、漳州、厦门出境，至台湾湖口回收。9月至10月上旬，又连续从南海上空和南越边境投放无人机6架次入侵中国领空。当时美军使用的是一种BOM147型无人机。它的特点是体积小，飞行高度可达2万米，侦察设备好，可以回收多次使用，是一种廉价而有效的侦察工具。但是，由于我们对性能和活动特点不十分了解，空军虽多次出动飞机拦截，都未获战果。10月13日，美军1架无人驾驶侦察机从友谊关入境，至广西地区侦察，航空兵第1师起飞1架歼—6飞机截击，在1.76万米的高度发现目标，3次跑开，炮弹打光了，但未中要害。飞行员决心驾机撞下敌机，因动作过猛，飞机进入螺旋未能撞击，飞行员跳伞，飞机坠毁。

对美军无人飞机侦察机作战，屡战不果，这样的结局令空军领导甚为焦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率工作组赴广东遂溪，召集指挥员、飞行员和有关战勤人员开调查会，进一步弄清了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性能、特点，分析了多次战斗未能击落敌机的原因，肯定飞行员的勇敢作战精神。在会上，刘亚楼司令员以指挥员的胆略和作战经验动员说：尽管敌机飞行高度高、体积小、它的弱点是速度小，没有主动逃避和还击能力。击落这种飞机的关键是要精确地对歼击机进行指挥引导，压准目标航迹。飞行员要采用正确爬高方法，熟练操纵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瞄准、射击、脱离等一系列战斗动作。使用现有装备击落敌机是完全可能的。在作战指导思想上，要力求稳妥，刻意求精，必须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歼击敌机，防止蛮干。为此确定在南宁、遂溪、昆明、蒙自等地设立高空作战点，配备精干的歼—6、歼—7作战分队和指挥保障班子，苦练打无人飞机驾驶侦察机的技术战术和协同动作。这些用

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无坚不摧，无高不攀！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训练和准备，航空兵第1师作战分队于1964年11月15日第一次击落1架无人驾驶侦察机。

11月15日，雷州半岛天气晴朗，阳光明媚。11时53分，雷达在海南岛陵水以东170公里发现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航向西北，直指涠洲岛，高度17.6万米，进速780公里。11时58分驻遂溪机场航空兵第1师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奉命驾驶歼—6飞机拦截。徐开通火速起飞，2时20分飞机爬高到1.62万米时，距目标1500米。徐开通放减速板，从目标后上方5度角进入攻击距离400米两次开炮未中，距离230米时，第三次开炮后，只听一阵轰炸声，那架无人驾驶飞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下来。徐开通胜利返航。

继徐开通打落美无人驾驶飞机之后，空军捷报频传：1965年1月2日13时55分，航空第1师驻南宁的作战分队副中队长张怀连驾驶歼—6飞机，于广西灵山上空，在1.77万米高空，距目标175米开炮，发射炮弹44发，又击落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这次特点是，目标航线曲折，在9000公里长的航路上先后6次转弯，可利用的截击地段只有120公里左右。由于准确引导，飞行员采取正确的跃升方法和射击动作，获得了战果。

1965年4月3日，航空兵第18师54大队1中队长董小海驾驶歼—6飞机，在广西崇左县上空，又击落1架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这次战斗的作战条件比前两次复杂，主要是敌机飞行高度更高，机动次数多、范围大。这次打掉敌机的高度是1.81万米，敌机从进中国国境至南宁的135公里距离内连续进行了5次蛇形机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此次战斗是航空兵第18师54大队1中队自建立以来第八次击落敌机，连同以往击落击伤的敌机在内，该中队创造了击落击伤13架的记录。周恩来总理等接见了董小海等作战有功人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处陶铸赴现场察看了敌机残骸，对这个战功卓越的战斗集体表示祝贺和慰问。1965年5月3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该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

自此以后，空军系统地总结和推广了各次战斗经验，从而战果更加显著。1965年4月18日航空兵第1中队中队长张怀连、12月24日航空兵第9师飞行员朱以隆，连续以歼—6飞机在1.81—1.82万米的高度上各击落美国入侵的无人驾驶的侦察机各1架。1966年1月3日，航空兵第3师飞行员鲤祥孝驾驶歼—7飞机，使用火箭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1架。美国在无人驾驶侦察机连续遭毁后，虽然改用性能较好的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但是仍未逃脱被歼灭的命运。1967年6月12日，美国1架BQM—147H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岷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以时速650公里、高度1.8万米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3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准确引导下，边上升、边转弯，压准敌机航迹，一次修正航向占据有利位置，先发射对空导弹未中，在时速大于敌机400公里的情况下，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勇敢地抵近，距敌180米使用火炮攻击，一举将其击落。

1964年8月至1969年底，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共入侵97架次，被击落20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14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3架，海军航空兵击落3架）。

为了对美国战术战斗机入侵活动进行斗争，空军一方面在接近中越边境地区的凭祥、蒙自等地区部署了一些高射炮兵部队，另一方面，在部队中开

展了打击入侵美军战术战斗机的战术训练。

1965年10月5日11时47分至12时43分，美机有3批13架次先后4次侵入广西凭祥地区领空。12时18分，空军第7军指挥员命令：驻南宁航空兵第9师副中队长张运宝率领4架歼—6飞机，以高度6000米隐蔽出航到龙州上空待战。12时35分，4架F4C战斗机掩护1架RA—3D侦察机，高度1万米，在隘店附近侵入我国领空纵深达30多公里，增速爬高，争取战术优势。36分张运宝四机随即拉开战斗队形进行轮番攻击，将其击落。这是空军在西南边境打击美战术战斗机飞机入侵的第一次成功战斗。其特点是抓住了有利战机，又严格执行了作战政策。此次美机入侵中国境内时间仅2分钟。由于事先把歼击机置于有利的待战位置，当敌机一入境，即进入跟踪，发起攻击，将敌机击落在中国境内。

1966年至1967年，美军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入侵中国领空的战术战斗飞机增多。我军歼灭敌机的数字也与日俱增。当年的空战日记上记载：1966年4月12日，航空兵第26师飞行员李来喜驾驶歼—6飞机在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A—3B攻击机1架。5月12日，第21师飞行员朱嗣珩驾驶歼—5飞机在云南马关上空击伤RB—66飞机1架。9月9日和9月17日，第18师飞行员高秀明、副大队长高长吉驾驶歼6飞机，分别在广西东兴、友谊关以北各击伤F—105战斗机1架。

4月24日17时左右，美机F—4B型战斗机2架于17时零9分从板兴入侵中国领空，高度1800—2000米，被设伏在该地的空军高射炮兵第30团击落1架；另一架投掉副油箱和火箭架企图逃跑，被驻宁明的航空兵第26师中队长宁义民驾驶歼—5飞机击落。

5月1日12时50分左右，美海军A—4B型战斗机3架侵入中国岫中西北上空。空军高射炮兵第30团集中火力，在55秒钟内，打掉2架，另1架侥幸逃脱。

8月21日13时左右，美海军A—6A攻击机2架从隘店附近入侵中国境内，航空兵第18师副中队长陈丰霞、飞行员韩瑞阶各击落1架，美海军上尉领航员罗伯特·J·弗林跳伞就擒。从1954年至1969年，空军在执行防空作战任务中，共击落敌机90架，击伤敌机177架。其中歼击航空兵击落33架，击伤18架；高射炮兵击落48架，击伤158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9架；雷达兵部队用高射机枪击伤1架。

1968年11月，美国被迫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中国西南边境的空中斗争渐趋缓和。那瓦蓝的天空一片宁静。世界上向往和平的人们，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第九章 英雄回眸

1 杨振玉：挽救一个战友比打下几架飞机都光荣。

非常感谢空军司令部战史研究室的朱昌荣主任为我提供了采访名录，我才得以见到这位和蔼可亲的前辈——杨振玉副司令员。我原以为杨副司令员住在空军指挥学院，因他在任空军副司令员之前是空军指挥学院院长。

那天下着雨，我去空军指挥学院。电话打不通，我干脆举着伞钻进了雨中，一路打听来到杨副司令员的家门口。小院静悄悄的，除了雨打花叶的声音，就是我按门铃的声音罢！就这样在雨里站了20多分钟，仍是没人应。这时，左邻的一位慈祥的老首长告诉我，杨院长前几天搬进了空军大院了。于是，我跑进电话亭拨通了杨副司令员家的电话，约好了次日见面的时间。按约定时间，我准时来到杨副司令员办公室，杨副司令员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温和、干练，目光敏锐。谈起当年的战争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他娓娓而谈，不时还用手比划着——

（根据录音记录）航校毕业后，我的编队技术较好，同大队长在一起，起初当僚机，僚机的任务是掩护长机攻击。打的几仗都是在被动情况下，不是主动出击。我击落的3架都是F—86飞机，当时是美国最好的飞机。论技术，他们的飞行员大部分都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论飞机质量（性能），他们飞机跟我们的差不多，但技术比我们强。我们那时飞行不到100小时，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不到50小时，比其它飞40、60小时的部队要好——

我大部分是在反击情况下击落敌机，有两次在自己危险的情况下。我们6架飞机在平壤附近带领兄弟部队打小机群。

我们也是苏联教官带出来的。只要你已经歼敌了，就说你已经会打仗了，苏联人就不带你了，就可以带下边的部队打仗（那时我带6师吧？）他们在底层、中层。打完仗返航的时候，我们6架，敌机8架，飞行高度8000多米，分两层。右边快，被敌机截住，开火了一般都是主机掩护。右边两架成90度斜角也可以把敌机赶走，所以，左边没动。敌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再不动就有危险，这时，我转过来，报告长机。我一转，敌机长机也向我转过来了，太近了开火不好，我就先开了火，击落了它。我在前边往回转比在两侧往回转危险性更大，飞机成平面，也比较危险。我一转身敌机长机向我开完火就跑了。我击落后，回来我的长机的无线电杆被打断了，长机对我很感激，因为不是我的掩护任务。假如我不转过来，长机就没命了。那时初期参战，经验不多，靠那股劲，又击落一架敌机，又挽救了一个战友的生命。回来立了特等功，展开了学习，提出了一个口号：“挽救一个战友比打下几架飞机都光荣。”以前打仗，一发现敌机后就打，容易散队，敌人就容易一个个击落我机。提出这个口号后，密切协同得比以前好。这是一次战斗。

第二次也是我掩护别人，也是白天，也是6架飞机。这次是出航，从丹东起飞。说是抗美援朝，其实没过江，海上敌人较多，他们故意拉烟（放出一种信号），但我们还是有了经验。6架飞机的注意力都在前方，那时有个口号：发现敌机就等于取得了50%的战胜敌人的把握。而我却回头看了看，发现8架敌机从我们的两侧攻过来了。正攻右边，我发现后敌机已开火了。我方那架飞机被打着冒烟了，是崔魏的长机。我们让他赶紧跳伞。他并不肯跳。我赶紧转过来，我们的僚机已被击伤。对方逃跑的动作比较慌乱。立即进入螺旋（即飞机失控），这时长机过来，拦住了那一侧，此时我的长机已经被击伤了，如果敌机再次开火，连跳伞都来不及。崔魏战斗下来眼睛全肿

了。另外一架敌机也进入螺旋。这次我就起了这个作用(发现掉下两架敌机)，但那次没开火不能算战绩。

就有一次我是长机的。3号机，我们先发现敌人，都想早点把它打掉。敌机投弹后再降低高度，这叫偷袭战术，敌机发现我们一攻它，就向后侧转。我瞄准长机，僚机瞄准僚机，进行了一次小的格斗。发现早，及早下降高度，我击落了一架，击伤一架。就这次当长机主动攻击，其它都是掩护别人。前边击落一架，后边击落两架，立特等功，击伤一架立一等功，一等功以上可评英雄。我评了个二级战斗英雄。朝鲜战场上我击落3架、击伤1架敌机。

我1931年生，是内蒙人，1947年参军，那时才16岁。以前我在陆军，当了3个月的战士，因为读了5年书，就当文书，后当文化教员、团政治处干事。朝鲜战场下来后，我在南苑高级航校指挥员训练班，1954年7月去苏联学习，1958年10月毕业。

中国人当年是敢干。那时我们学飞行实际不到一年(速成班)，朝鲜战场呆了3年，轮换着去。打一阵又回到后方休整一阵。50人的师死了一半。我那时在3师7团2大队。

那时我比较年轻，说句实话，想的也比较少。

杨副司令最后嘱咐我，一定要按历史事实写。

我们合了影，他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2 赵宝桐：历史是不能改变的。

（根据录音记录）……在朝鲜战场上，我是打得最多的，击落7架……我是全军（空军）唯一一个获两个特等功的飞行员……我给你看看这盘录像带吧，是八一电影厂拍的《今天·昨天·明天》，反映当年战斗英雄今天的生活。反正这些个英雄事迹我讲了几百遍，都是那个样，当时怎么说，现在也只能重复，历史是不能改的……

一部老式的录放机和一部不太新的电视机摆在我的面前。赵宝桐用不太熟练的动作折腾了好半天，终于放出了图像。画面上首先是越震华，1959年世界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人，开创了我军航空作战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首例……轮到介绍赵宝桐这一段时，录像机突然不出图像了。于是赵宝桐走近录放机前，一边敲打录音机，一边命令它出像。一急之下，气喘起来。我赶紧说：算了，我查资料吧！这时，金凤从房间里走出来。金凤看上去只有50岁左右，头发短齐，有白发，举手投足都有一种超脱的气质。这位庄重又不乏东方女性娴静美的夫人一走进客厅，赵宝桐马上报告说录像机坏了，不是我动坏的，是它自己坏的，而且正在放我时坏的。金凤极有分寸地对我点点头，展现了一个欢迎的笑容，然后对赵宝桐说，坏了就拿到楼下修去吧！说完又对我点了点头，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他断断续续地回忆着：

……1949年南下到汉口，我于9月份选上飞行员，去东北集合，那时全国还没解放呢！1950年开始在航校突击训练，飞了不到几十小时，就上了战场。24岁当团长，1953年9月和张积慧等同志去苏联学习。在苏联做了一次手术，肺长瘤了，割掉了那个瘤，手术做得不错，专家毕竟是专家嘛！回来后就去三航校当副校长。我是抚顺人。

去年《家庭》杂志请我们去，金凤写了一篇我们家庭的文章，得了个特别奖。那次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的夫人也去了……

3 刘玉堤：飞上蓝天的梦。

提起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上岁数的人尤其是在军界里，几乎无人不晓。但对这位出身贫苦，仅有高小文化程度的英雄是怎样飞上蓝天的，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那是 1941 年初，中央军委决定在陕北安塞成立第 18 集团军工程学校，培养航空机械工程技术人才。刚刚参加八路军不久的刘玉堤，就被 358 旅领导送到工程学校学习航空技术，从那时起，“要当个飞行员！”便成了刘玉堤的宿愿。这是因为他亲自目睹过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俯冲扫射、狂轰滥炸的残暴行径，他发誓：“有朝一日，在空中报仇！”

刘玉堤跨入工程学校后，头一关就是攻克文化课。按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先学文化课和俄文，尔后才能学航空理论。为了学好航空技术，早日能飞上蓝天，刘玉堤迎难而上，像打仗、攻敌人碉堡那样，不甘示弱，非常刻苦地学习数、理、化，背记俄文。但这个机会不长，因“精兵简政”，工程学校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和军事学院，不专门学习航空技术了。学员除了学习外，还要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学做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活；开展军民大生产，他一天能开一亩多荒地。他时常在想，将来招飞行员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所以有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毅力。他那棒棒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1943 年 2 月，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后，工程队随之撤消，不少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改作其他工作。刘玉堤看到学飞行的希望几乎没有了，便多次找俄文学校校长曾友权，恳求将他留下学俄文，以便有朝一日实现自己的宿愿。在他的请求下，曾校长终于批准了。他在俄文学校期间，一面学习，一面干活，利用工余时间学习数理化，巩固以前已学到的知识。

1944 年冬，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正在进行机场工程建设。这对于立志要当一名飞行员的刘玉堤来说，此时此刻激动不已。施工中，他和战友、民工们一起劳动，在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民工们不敢下河挖石头，他第一个跳下去挖；晚上住在草棚里，四面透风，凉飕飕的，但是，刘玉堤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修我们自己的飞机场，再苦再累，心情格外高兴。当机场竣工后，他看到一架架飞机稳稳地落地，真想跑过去摸一摸飞机！见那身着飞行服的飞行员英姿威武，他心里是多么羡慕呀！心想：我总会有那么一天，成为飞行员的，后来，为了提高文化程度，他又到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半工半读。

1945 年 9、10 月间，党中央决定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敌人遗弃的航空器材，筹建航校。八路军总部航空组负责执行建立航空学校的任务。刘玉堤听到这一消息后，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找航空组负责人常乾坤，第一个要求就是“让我上飞行队学飞行吧！”校领导看了他的机械师合格证后，将他分配到了维修飞机的机务队。

不久，在刘玉堤三番五次的请求下，校领导最后还是批准了他去飞行队。从那时起，刘玉堤便开始了他学习飞机驾驶技术的艰苦里程。在学习飞行驾驶技术阶段，刘玉堤全身心投入，专心致志地在地面勤学苦练，反复熟悉背记起飞、上升、下降、着陆等一串的动作数据和操作要领，除吃饭外，几乎整天坐在练习器上练习飞行动作，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一有空就背，连走路、吃饭、上厕所也在默默地背诵着。在练习操纵时，为防止操纵动作过大、过粗，练时像大姑娘绣花那样柔和。为了达到飞行员的一切良好素质，

他爬到房顶上看地平线，练习目测高度；坐汽车体验地速；白天看飞鸟，夜晚望星星，增强观察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刘玉堤基本掌握了驾驶技术理论，在他看来，飞上蓝天的条件已具备了。

上机操作的时刻到了。这天上午，机场上空阳光灿烂，飞机随着一阵阵隆隆的马达声呼啸而过，一架架飞机滑上跑道冲向蓝天。飞第一个起落的学员飞完了，第二个学员飞完着陆了，第三个起落就轮到刘玉堤了。他的心在急速地跳动，激动的心情难以压抑，眼看马上就要上天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的事发生了，当他一只脚刚跨入座舱，两眼就觉得无数个金星闪耀，随即身体倒了下去。同志们赶忙将他送到卫生所，随后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大叶性肺炎。后来同志们才知道，这几天刘玉堤患感冒发高烧，怕影响飞行训练，一直瞒着教员。住院十几天，病情刚有好转，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抓紧锻炼身体。出院时医生开了张“不能参加体力劳动，不能参加飞行”的条子，刘玉堤一看，心想，这还了得？！一出医院门口就把条子撕了。

刘玉堤回到部队后的头一件事就找飞行队长刘凤，说：“队长，我身体好了，我要参加飞行！”但因住院，不少同志已放单飞了，他心里非常焦急。教员安排他抓紧补课，战友们热情地帮他，领导安慰他，刘玉堤抓紧一切时间补习，不时地请已单飞的同志给他讲飞行的体会，他都一一默记在心里。不久他就跟上了队。

那是1947年金秋的一天，天空格外晴朗。刘玉堤在教员的带飞下，终于驾驶着飞机，飞上了蓝天，以往的梦想已成为现实。这是他飞行的第一个起落，也是实现飞上蓝天宿愿的第一天。因为是第一次飞行，动作不够准确，特别是他操纵驾驶杆动作过大、过粗，着陆时，飞机像脱疆的野马，横冲直撞，差点撞到机窝上。问题发生后，带他的教员说什么也不让他飞了，严厉地说：“这个学员动作太粗，不能飞！”

这对刘玉堤来说打击不小。可是，他并没有灰心，心想，已有第一次飞行体验了，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也要顶住，坚决克服它。于是刘玉堤下狠心苦练操纵动作。带他的是一位新教员，耐心地教他，除了上大课外，还单独给他吃“小灶”。在机场，别的学员在飞行，刘玉堤在草坪上抓紧练习推杆动作，拿着一根棍子比划着。教员作示范，他跟着推，琢磨着该用多大的力气；他做动作时教员不时地给予纠正，当教员飞行时，他在后舱仔细地观察舱内各个仪表，表速多少，怎么上升、下滑，怎么压杆转弯，手不停地模仿着，经过一段时间苦练，教员让他在前舱操纵，教员在后舱把关，努力做到“操纵柔和”四个字。当刘玉堤一点一点掌握了飞行操纵动作、拉杆、收油门，由慢到快或由快到慢，动作柔和稳当了。

功夫不负苦心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刘玉堤终于迎来了放单飞的日子。那是1948年春的一天，牡丹江机场艳阳丽日，春光融融，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驾驶着战鹰自由地翱翔在祖国的蓝天。操纵动作是那样柔和，上升、转弯、下滑、着陆，以及空中各种飞行动作，飞得是那么顺当、干净、利索，好像战鹰比前次飞行听使唤多了。他，第一次放单飞成功了。

从此，刘玉堤开始了他飞行的生涯，整整飞了30个春秋，祖国的万里蓝天留下了他一道道的航迹，他把自己的身心奉献给了人民空军的飞行事业。他由飞行学员到飞行指挥员，由飞行大队长、团长、副师长、师长、副军长、军长，升任为某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层层都是称职的军事领导干部。然而，更值得庆幸的还是他刚刚学飞行，飞行时间还不过百小时，在

喷气式战斗机上只飞行了 15 小时左右，就奉命参加了抗美援朝作战，与侵朝美空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在空战中，机智勇敢，讲究战术，开创了志愿军空军部队一次空战一人独自击落敌机 4 架的记录；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先后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 8 架的重大战果，被空军政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在担任空军某军军长期间，曾多次指挥过国土防空作战。1967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1 日 8 天之内，接连指挥航空兵部队打了 3 次，取得了三战三捷、击落美军入侵飞机 5 架的重大胜利，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称赞。他为人民立下的战功和担任领导工作期间的政绩，已载入人民空军的史册。

4 邢海帆：一个反法西斯的老战士。

经老前辈华仁杰介绍，我驱车来到了空军指挥学院，拜访了现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的邢海帆先生。邢会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早已年过花甲，但身体很健壮，透过脸上的岁痕，那股英气犹存，从他的名字看，他应该航行在蓝色的大海，搏斗惊涛骇浪。可是，他却在长空穿云破雾搏击风雷 50 年。

在中国华人中，有幸成为飞行员，当上空中骄子的，并不多。在中国飞行员中，参加过与日军空战，又参加过抗美援朝与美军空战，更是寥寥无几。邢海帆正是那屈指可数的其中之一。他曾驾着战鹰击落日军侵华飞机，他也曾驾着战鹰抗美援朝，击落美军飞机。

如果你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或看过纪录片，你一定会被年轻的人民空军驾机飞过天安门的威武雄壮的场面所感动。邢海帆就是第一个飞过天安门上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带队长机。

1991 年 6 月 21 日，国际反法西斯老战士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到会的代表们，来自 26 个国家。会议主席台上，坐着一位中国人，他就是邢海帆。

他作为中国老战士代表团团长，应原苏联老战士委员会西兰契耶夫空军元帅接连 7 次邀请，参加这次盛会。

作为一名反法西斯老战士，邢海帆受到尊重是当之无愧的。

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总飞行时间 5000 小时以上。这个飞行时间是惊人的。许多人都知道，1952 年 2 月 10 日，志愿军英雄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当时戴的飞行经历也只不过 3000 小时以上。邢海帆的飞行、空战经历，得益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刻苦学习航空理论、航空技术。

在他家的客厅里，邢会长精神饱满、思维敏捷、语言清晰，声音略带磁性向我讲述一个遥远的传奇故事一样谈了长达 3 小时的作战经历。（根据录音整理）

1937 年，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法西斯践踏中国大地。此时，我即将高中毕业。1916 年生于四川阆中县，从小决心航空救国，考入了国民党笕桥航校 12 期，先后在成都和柳州陆军军官学校入伍受训练。1941 年就差举行毕业典礼了，这时中美租借法草案通过，由美国为中国培训飞行员的计划付诸实施。我和同期同学首次分两批从海路赴美国学习。

此时，太平洋上已不太平，战争阴云密布。日本军国主义在平静的海面上显露出凶恶的杀机。美国派出巡洋舰为客轮护航，同时让客轮转道南太平洋航线，保证中国飞行生安全抵美。

中国飞行生的客轮航行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海峡之间，收音机里传来震惊世界的消息：日本偷袭了珍珠港。于是我们在檀香山休息了 4 天，因而有机会一睹当时的惨景。港内美舰有的被炸毁，倾伏在水中，有的半身没入水内，舰尾留在水面。基地营房一片断壁危墙瓦砾。希卡姆机场上，到处是飞机的破碎残骸，弹坑累累。可恨的战争，我发誓要为消灭战争去奋斗。

战争催人觉醒。战争更燃起人的激情。我和同学们刻苦学习、训练，魂系遭日寇涂炭的祖国。一年之后，学习领航学、射击学、天文学、飞行技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我和同学们经南美洲，跨大西洋，穿中非洲，经印度，绕道回到昆明。一路上，我们唱着：“怒发冲冠，凭栏处……”

与侵略者空战的机会就在眼前，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但却不能上战场。根

据我的飞行理论和飞行技术，被做为“种子”，分配到迁至印度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任教。在这所航空学校里，既讲领航学、射击学等理论课程，又讲授飞行技术，带学员飞行。此外，我还抓紧一切时间，与一周赴美学飞行回来的留校同学切磋飞行技艺，研究空战战术。

为抗击侵略而培养飞行员，与上战场相比，同样是报效祖国。但我还是认为直接上战场，亲手惩罚侵略者更解气。于是，一有机会，就打报告，要求到作战部队去。经三番五次要求，终于在一年之后到了战斗部队，被分配到中美空军混合团3大队第8和28中队任分队长，驾驶的是P—40和P—51“野马”式战斗机。

从此，我奔赴了空战战场。

汉江上游北岸。湖北老河口机场，跑道上，一架P—40战斗机徐徐降落。

飞机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机场，悬着的心落地了。

当我跨出飞机座舱，望着自己的飞机被打穿的几个窟窿，脸上泛起了胜利的微笑。

这是在武汉空中战役中的第一天出动……

1944年底至1945年春，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胜利的前夕。在亚洲，美军在太平洋战区发起的反攻取得了节节胜利。在中国战区，制空权已不在日本侵略军手里。取得制空权的中美空军，士气旺盛。日本侵略者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还在作垂死挣扎。在中国战场，日军把华中地区的空军力量，收缩集结于以武汉为中心所组成的机场网里。其目的，一则阻止抗日军民从川、鄂、陕向东出击，二则从武汉地区采取夜间袭扰的办法，袭击西南大后方。因中美混合团没有夜航设备，对日寇的夜间袭扰伤透了脑筋。为拔掉这颗最后的钉子，歼灭日寇空军在华中集结的力量，中美空军首先组织了连续3日的武汉空中战役，出动各型战机千架次。

我所在的飞行大队担任主攻突击任务。战役发起的前一天晚上，全大队参战飞机从各机场陆续起飞，借着黄昏的余辉，秘密飞抵湖北老河口前进机场，每架飞机到达后，立即疏散隐蔽。机场外的树林里，藏着一架架战鹰。

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紧张地进行着战前准备。

时间刚过中午，所有参战的飞行员整装待发。大队长按惯例叫作战参谋搬来一张桌子，所需地图和空中照像获得的资料，放在停机线附近。大队长集合参战飞行员讲话，声音压得很低，脸上表情严肃，几十名参战的飞行员都认真屏息静听，这时整个机场显得格外寂静，彼此可以听到战友的呼吸声。

两位大队长话音一落，飞行员立即登机。瞬间就响起了飞机马达的轰鸣声，这声音震撼着机场大地，震撼着天空。随即，数十架飞机鱼贯而起升上天空，整队向目的地飞去，在与敌接触之前，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

随大队出航后，沿着汉江北岸飞向武汉。在一万多英尺的高空，朵朵白云从机翼下掠过，高山河流，悠然而逝。远远望去，长江如带，斜横在大地上。顺着长江搜索，在长江和汉江交汇处，隐蔽可见武汉三镇，鼎立在广阔的汉江平原上。

按战斗计划，我所率领分队突击目标是徐家棚日军机场。当时武汉上空被大片灰色中云覆盖，城市烟尘聚集弥漫，造成空中能见度不好。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我率分队故意从武汉较远的东北边向前飞，然后突然转头西飞，指向武汉，随即变换双机跟进的战斗队形，用小角度快速冲向突击目标。很快，就看清了突击目标徐家棚机场。日军哪里想到，头顶上神兵天降就在

顷刻之间呢？此时，徐家棚机场，仿佛在睡大觉，宽阔的停机坪上，20多架日军轰炸机整齐地排列在停机线上，机身上还盖着蒙布。

日本夜航轰炸！我们高兴地大叫起来，随之下达了“进入战斗！”口令，这时已迅速进入了射击距离。我驾驶的飞机，装有6挺大口径机枪和带有6捆保险伞的炸弹。

我满腔热血在沸腾！把瞄准具光环牢牢对准离自己最近的一架敌机，扣动扳机，6挺机枪一齐开火。顿时，敌机中弹起火。

说时迟，那时快。当我将机头微抬，又瞄准一架敌机，又是一阵猛射，敌机也冒烟着火。

就在同一时间内，我按动电钮，将6捆降落伞炸弹投下。只见降落伞炸弹的白点，沿着敌停机线散布开来，爆炸的浓烟笼罩了停机线。

日军机场的防空是严密的。机场两端的延长线上，都布置了几道浓密的交叉火网。就在我带队进入攻击停机线时，敌人对空火力枪炮齐发，耀眼的光弹在飞机前后左右乱窜。

打击敌人停机线上的飞机，对于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开心事。我当时只顾多打飞机，早已把个人的安危抛到九霄云外。我在攻击时不顾一切地向地面防空组成的火力网里钻。当我迅速脱离时，机场大火产生的气浪使我的飞机发生晃动，好像受到小物体撞击，这是飞机已中弹的感觉。我摇动驾驶杆，检查仪表，发现飞机没有致命的损坏，便驾机安全返回基地。

第二天继续出动，我在担任突击武昌南湖机场的任务中，轮番攻击隐蔽在地堡里的敌机，先后又击毁两架敌机。可是，我的飞机也14处中弹，凭着过硬的飞行技术和顽强的毅力，终于把受伤的飞机飞回了基地。

第三天，我又驾机出航，参加高空掩护。此时日机损失惨重，已无力升空，我机全部胜利返航，日军集结收缩在武汉周围机场的空军，经中、美空军连续3天的大规模歼灭，已无力再战。祖国领空的制空权，就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继武汉空中战役之后，我又参加了上海空中战役。

那天，我所在的飞行大队于早晨7点从陕西安康基地驾着新装备的P—51战机起飞，迎着东方朝阳向上海进发，进行留空8个多小时的远程奔袭。轰鸣的机群编队向前，仰望祖国美丽的蓝天，俯视长江中下游的千里沃野，祖国的山山水水，历历在目。一种“还我河山、洗雪国仇、把日寇赶出去”的心情，油然而生。繁华的上海、秀丽的苏杭，令人向往。

当飞经武汉、南京侧这时，发现有少数日机在远处低高度盘旋。看样子没有什么威胁，除密切监视警戒外，编队仍按预定航向前进，到了太湖上空，远远望去，大上海在烟雾中隐约可见。紧张的战斗准备开始，我投掉燃料耗尽的副油箱，吞下能持续4小时的兴奋药“大力丸”。机群很快分成掩护和几个突击队，以小角度俯冲增速，分头冲向上海各机场。

操纵着飞机，闪电般冲向江湾机场，发现一架日军飞机正在跑道上强行起飞。来不及迟疑，立即瞄准射击，敌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中弹起火了。

拉起飞机，在长江上空，急速转弯，继续搜索敌机目标。此时，敌人地面防空火力凶猛异常，在大队长“返航”的命令下，退出了战斗……

这是我第一次远程奔袭。以后的连续两次出动，都获得了战果。上海空中战役，同武汉空中战役一样，也是连续3天出动。但这次战役，航程远，留空时间长，体力消耗大。尽管在空中有巧克力干粮吃，又服“大力丸”，

每次下飞机后航医又给喝一小杯白兰地，但还是使人觉得疲劳。但为了胜利，为了尽快打掉日本法西斯，大家都士气高昂坚持战斗。

在抗日战争中，我除参加武汉、上海两次大的空中战役外，还参加数十次对空对地战斗，我先后驾机打掉日本鬼子 20 多个火车头，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 8 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了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被晋升为空军上尉。221

1945 年 11 月，我所在的飞行中队进驻济南。抗战胜利了，国民党当局命令他们对解放区实施侦察、扫射、投弹。我不愿打内战，借奔父丧、探亲 and 结婚等理由，请假外出达半年之久，归队后以恢复技术为由不出任务。平时，表现消沉，在言谈中流露出不满情绪，被人告密，幸得上司是我当年留美时的领队，才免于难。我设法从战斗部队调到了觅桥航校。由于反对内战的思想行动，在与未婚妻通信中，有所表露，信件被国民党邮检截获，引起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在生命安全受到危险的情况下，秘密加入共产党地下工作，1948 年 6 月底，得悉国民党逃台湾前要准备对我下毒手的消息后，即根据党组织指示，把我从上海辗转到了解放区西柏坡。由中央社会部分分配到华北军政大学工作，同年 12 月随叶剑英元帅参加接管北平，在航空处工作。

1949 年 5 月 4 日，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派出 6 架 B—24 轰炸机，从盘踞在青岛的机场起飞，轰炸了北平南郊的南苑机场，炸毁通信机 2 架，炸伤 C—46、B—25 飞机各一架，炸毁机库 1 座，房屋 20 余间，死伤 24 人，空袭的恶魔威胁着刚解放的北平。

当时，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为确保第一届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安全，中央决定建立一支空中防空力量。

5 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召见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决定在南苑机场成立一支飞行队的决定，这支飞行队，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6 月初，我和处长方华赴公主岭 P—51 飞行训练队恢复飞行技术，返回航空队。222

1949 年 8 月 15 日，南苑飞行队正式成立。9 月上旬，飞行队接到准备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命令。

我和战友们，谁都没有飞过空中分列式。飞行队的飞机，飞行速度等性能又不一样，训练时间也不到 1 个月。为了搞好这次受阅，空地勤所有同志群策群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为代理队长，我费尽心思。在没有航空图的条件下，就用五万分之一的北京市地图代替，反复计算每架飞机的速度、高度，经过多次计算和演练，确定下来一套飞行方案。受阅飞行方案是：飞行航线——选择通县双桥上空为航线起点，直飞天安门上空；飞行高度——即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便于观察，又考虑到受阅中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可滑到城外迫降；飞行速度——为使飞机通过天安门时队形整齐，每个飞行分队起飞、进入航线、速度、高度，以及分队间的距离和高度差，都计算得十分精确，人人熟记。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下午 3 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4 时，阅兵式开始。参加阅兵式的，有一支年轻的空军部队。此时，南苑机场上的 17 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每架飞机均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4时35分，空中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6个分队，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时间间隔，分别在900米、600米、450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接近东单时，从空中可见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骑兵、炮兵部队，似洪流浩荡前进。这时，空中机群轰鸣着通

223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一片欢呼的人潮，沸腾的海洋。

当受阅的9架P—51战斗机刚飞过天安门上空，就在空中指挥员的带领下，从复兴门上空作右后转弯，沿北城墙飞行。当9架飞机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最后一个分队相衔接，又一次通过天安门上空。

担任这次飞机的空中指挥员，第一个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的，就是邢海帆。

邢海帆带领飞行队圆满完成了开国大典受阅飞行任务，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党和人民的称赞。

一些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开国大典后的当天下午5点多，邢海帆和战友们刚刚返回南苑机场，就接到参加国庆盛大宴会的通知。他们来不及换下飞行服，就兴高采烈地乘车赶往城里。

在宴会上，周副主席与朱总司令来到飞行员席前举杯祝酒，对飞行队的同志们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希望你们努力。朱德总司令说，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符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飞行队的同志，都把参加受阅飞行作为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和一个新的起点，向着新的时代前进。

1949年12月，带着参加开国大典的喜悦心情，带着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再奋斗的决心，我又被调到济南，负责航校训练处工作。

195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从空中和海上对华东各大城市，重要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进行轰炸、封锁及其它破坏活动。2月中旬国民党飞机炸毁上海杨224

树浦发电厂。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防空力量，人民空军成立了第4混成旅。我由航校调任第4混成旅11团一大队任大队长。不久，空2师组建，我又调任2师任射击主任、领航主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侵略者凭借其号称“世界空军强国”的空中优势，在朝鲜战场上投入了1000多架各型飞机。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内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家门口战火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于1950年12月4日出战，严惩侵略者。

1951年10月，我所在的空二师进驻丹东大孤山机场，参加朝鲜空战。我任6团副团长又奔赴了空战战场。

几十年后，当邢海帆接待美国朋友，谈及抗日战争中并肩战斗、朝鲜空战中兵刃相见，究竟为什么？他说：“我是为祖国，为和平而空战”。

崇高理想与正义，是人生的支柱，是一个军人的天职。这正是邢海帆的人生信念。

1988年，邢海帆从空军学院高级系主任的岗位上离休。在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虽然退下来了，但爱国初衷和报国之志不能动

摇，我要趁此改革开放大好时机，夕阳尚辉之时，为海峡两岸统一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做点贡献。

他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他和其他委员联络航空界的新老朋友，于1984年夏成立了北京航空联谊会，并担任会长。

在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带领下，广东、四川、昆明、贵州、陕西、南京、广西等省市的航空联谊会也相继成立。几年来，各联谊会携手为祖国统一，世界和平友好辛勤工作。

由北京航空联谊会的工作，每年都有大批台湾同胞和国际友人来大陆和中国参观访问。以1991年为例。5月14日，美国“驼225峰飞行员协会”组成69人访华联谊团来到中国，寻找青春足迹，会见老战友，凭吊“驼峰”战场，重温中美友谊。10月17日至11月8日，美国“飞虎”第14航空队协会访华团330人，分两批来中国访问。他们在北京、西安、昆明、桂林、上海、苏州等城市，亲眼看到中国的飞速发展，加深了对中国的感情。

也是这一年，以邢海帆为团长的北京航空联谊会代表团，应邀赴莫斯科参加26个国家的老战士会议，与参加会议的许多国家的老战士畅谈友谊。

今天，这位老飞行员还在奔忙着。他老当益壮，飞行在和平友谊的航线上。1993年5月11日，他们已在昆明举行了“驼峰飞行纪念碑”落成揭幕盛典；5月9日在桂林举行了“飞虎14航空队山洞指挥所”旧址摩崖石刻落成揭幕盛典，该碑预计于199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时落成。这些活动，都包含着这位老飞行员的一片赤诚和不可动摇的爱国之志。

5 王坚：新中国“蓝天倩女”。

在共和国记忆的银屏上，有这样一页不平凡的历史：1952年3月8日，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着6架里—2型飞机，掠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首都人民的检阅。毛泽东那关怀的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的亲切话语至今还在人们耳际萦绕！

中国的妇女也实现了征天的梦想！

历史不会忘记，光辉永远不会散去。当历史重新展现在我面前时，作为一个女人，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

226

我翻开1952年4月出版的、已经发黄的《新中国妇女》杂志，目睹了这批女飞行员当年的风采，心中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激动，为采写本书，我决意去追访她们的踪迹。

广州的冬天有一种淡淡的春意。春节刚过，“广东省航空联谊会”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我慕名而访，从几十位饱经风霜的面孔中，有幸见到了当年接受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的、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之一的王坚。

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她那渐已苍白的鬓发、多皱的笑脸上，我领悟了几十年的历史沧桑。我想，她们是不是和我有着相同的人生之艰？是否有一本苦辣酸甜的日记！

坐在我面前的王坚女士谈吐爽朗，娓娓动人。就是她和一群姐妹们创造了“女人上天”的神话，荣获了一份难得的殊荣。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陈志英、邱江群、黄碧云、戚木木、何月娟、秦桂芳，还有我”……王坚一口气背下了同伴姐妹们的名字。回忆一边坐进机舱，手拉操纵杆，直冲九霄的浪漫，一边眉飞色舞。的确，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从她们开始，中国妇女的形象更加完美而高大。殊不知为争这口气，王坚和她的姐妹们吃了不少的苦头。

器材短缺，飞机陈旧，加上女学员的生理、心理特点，女飞行员面临着比男飞行员更大的困难。在地上想着天上飞，上了天不一会儿就头晕脑胀。她们对汽油味敏感，却偏将汽油洒到手帕上；和男同志一道跑步、打篮球……“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使下，她们仅用了7个月，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全部飞上蓝天。方中英政委、杨扶真副团长不知费尽了多少心血！

王坚这位要强的“蓝天倩女”，当她正值飞行成熟的时候，“文革”的风暴袭击了她和全家。她和爱人是当时飞行部队里有名的“蓝天情侣”，俩人比翼齐飞，却突然一道命令下来，俩人手握

227“停飞”指令，含泪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飞机和患难与共的姐妹们，接着是挨批斗。下放劳动，好端端的一个家庭妻离子散。直到1972年，王坚及其爱人才得以团聚——在天津劳动的丈夫，在四川寄养的儿子和在北京劳动的她相拥而泣。

但是她重返蓝天的愿望却始终没实现。1979年，王坚转业回到家乡广州。蓝天留下了她未尽的梦想。

王坚深沉地回忆着往事。眼圈渐渐红润而模糊。她说：“这些都过去了，我的经历再惨也没有许多老前辈那样惨。值得骄傲的是，自己曾作为新中国

第一批女飞行员，先后两次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亲身受到党的关怀，这就已经足够了。”

沿着这条闪光的航迹，我追踪到另一位女飞行员伍竹迪。他曾担任过飞行大队的副大队长，航校教材科副科长，离休前是航行调度教员。伍竹迪至今还记得，小女儿刚出世，在她怀里蠕动着，贪婪地吮吸母亲的乳汁时，她体验过一种做母亲的爱，她真愿母女依偎，时间永驻，但为了飞行，不等满月就给孩子断奶，望着女儿踢着小腿不肯吸奶瓶的情景，伍竹迪收回了目光，走出院子里去了，她不忍心听女儿声嘶力竭的啼哭，产假未滿，她就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只身一人千里迢迢赶回了部队，驾机重返蓝天，她的奶水仍然很足，有时被奶水胀得实在难受，就在座舱里轻轻按摩乳房，让奶水流淌在内衫上。

祖国万里蓝天，不仅留下了女飞行员的汗水，还留下了年轻母亲的乳香。

直到女儿5岁了，伍竹迪回去探亲，开门的正是女儿，女儿很有礼貌地说：“阿姨好！”她一愣，但还是顾不得许多，抱起女儿一阵亲吻，奶奶在一边说：“快叫妈妈！”，女儿认真地说：“不，她不是妈妈，妈妈在那儿”，女儿指着墙上镜框中的照片，伍竹迪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正当她搂着女儿讲故事、唱儿歌，培

228 养感情时，一封电报又把她召了回去，她又驾驶飞机飞向了抗洪抢险的华北上空。当她完成空投物资的任务归来，小女儿竟撅着小嘴不理她。现在，她的女儿已经30多岁了，伍竹迪已过花甲之年。后悔吗？不！因为她们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蓝天。

还有武秀梅，这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姑娘，她同姐妹们一起飞行，后来成为姐妹们中的佼佼者。她是幸运的。是“文革”中唯一一位没受到冲击的一个。她先在北京西郊机场飞行，后又调到北京空军独立大队飞行，退休前担任飞行团的参谋长，副师职待遇。她那神采飞扬的大照片经常出现在报刊上。现在，她身边有一儿一女相随左右，安度晚年。

在那页不平凡的历史上，有一页日本飞行教官和女飞行员之间的故事，令人难忘。1993年10月16日，这个故事又续上了新的内容。当年的日本教官长谷川正作为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访华时，同当年受训于他的女飞行员秦桂芳相遇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勾起了女飞行员们的回忆。

长谷川正眼眉上的伤疤，最初引起秦桂芳的憎恶，她怀疑长谷川正是在战场上屠杀我国人民时被游击队打伤的，故而怠慢他。一次秦桂芳驾机降落，她看到白旗没向教官报告便落了地，长谷立即勒令她停飞。又一次在飞行中，空中改平后，秦桂芳松了油门，险些出了大事，长谷气得大喊：“你的骄傲自满的，停飞！”之后，长谷找到小秦，告诉了他眼眉上的伤疤是在一次飞行中不慎而造成的。笼罩在秦桂芳心头的迷雾消失了，秦桂芳刻苦训练，成为班员第一个放单飞的女飞行员。长谷川正临回国时。送给秦桂芳一副象征长寿的吉祥乌龟画，寄托了长谷教官的美好祝愿。40年后，俩人相逢，秦桂芳回赠长谷的也是两只玉雕乌龟，这礼物的含义，又岂止是长寿吉祥呢！

新一代女飞行员们创造了新中国航空史上崭新的一页，她们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是她们，为新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229女飞行员们开辟了航天之路！

蓝天上，有妇女立起的一座丰碑！

6 夏伯勋：首批歼击机中队诞生。

1948年4月，我们成立了第一个歼击机中队，这个中队辖于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一大队。当时我在老航校飞行乙班任指导员。不久，我们奔赴黑龙江汤原机场组织飞行训练。

汤原机场位于汤原以南10余公里的一个平坦开阔的场地上，净空条件很好。可惜机场跑道被苏联红军撤退时彻底破坏了，跑道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爆炸坑。在当时的条件下，要修复使用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只好利用机场侧面保险道的草地训练。

当时使用的飞机，有6架日制“隼”式歼击机，2架“九九”式袭击机，2架日式教练机和4架“九九”高练机，这些飞机都是日本投降后缴过来的。由于飞机的许多零件被附近的群众卸走了，所以飞机根本上不了天。后来，经过深入做工作，才把这些零部件从群众手里搬了回来。当时飞机器材十分紧缺，装修时，零件配不齐的飞机，只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拆掉其它飞机上的零部件来拼凑。如有的“隼”式歼击机没有螺旋桨，就把“九九”式袭击机上的螺旋桨拆下来代替，这样，不要说对飞机的履历不知晓，就连飞机的现实性能和特点也心中无数，只能边飞行边摸索。

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飞行时全靠摆“T”字布和旗语指挥。每一个课目在地面讲清楚后，由飞行员自己去执行；编队飞行时，则靠规定信号来统一行动。机场也没有气象保障设备，只能凭经验观察本场气象情况来组织飞行。飞长途课目时，有时本场气象条件变坏了，也没有办法及时通知飞行员返航。1948年8月的一天，我带李宪刚同志长途飞行，飞到本场时突然遇到暴风雨，机场上“T”字布摆出禁止落地的“十”字标记。于是我们只好到依东机场着陆，翌日才飞回本场。

拼凑起来的飞机，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很多，驾驶这种飞机，没有敢于探险的胆量是不行的。如有的飞机换了发动机后，震动比原来大，滑油温度双规定的也高一些；有的飞机由于老旧，表面不光滑，飞行时速变小了，但我们都照常飞。还有的飞机仪表不准，有的罗盘甚至误差几十度，航行时主要靠地图地物对照着飞。当时连航行地图都没有，使用的普通挂图又不准确，地形地貌显示不清楚，这就大大增加了飞行的困难。如果遇到天气不好，看不清地形地貌，很容易偏航。有一回我到东安修理厂去接回一架“九九”高练机，飞回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在绕开云层飞行时，因为罗盘误差大而不知所在点的位置，产生了迷航。当我在迷航点转了两圈后，发现右前方有一条五六百米长，三十来米宽的“跑道”，四周是一丈来高的高粱，我决定先降落，问明位置后再飞。着陆后一问老百姓，才知道已经偏航到佳木斯东面40公里的双鸭山了。弄清了所在点的位置后，我经过校正，起飞复航，最终才飞到了目的地。

飞机内也没有降落伞，座舱里的座垫是棉垫和草垫垒起来的，如果发生了意外，只有同飞机共命运了。当时，大家没有更多的考虑这些危险，巴不得天天飞行，多飞几个起落；有的同志一天飞不上，就急得哭。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扼杀人民空军，到处派飞机侦察、袭击，汤原机场也经常遭到轰炸、扫射。有一回，中队组织飞行，我当指挥员、吕黎平同志驾“九九”高练机作训练飞行，突然敌机来袭击，我们马上采取防空措施，吕黎平同志迅速着陆、关车，人刚231离开座舱不远，敌机就俯冲扫射，把座

舱打了几个眼，机尾中弹后着了火。为了安全，为了多飞，我们摸索敌机来往的规律，避开敌机可能来袭击的时间，抓紧飞行训练。我们每天天亮前两、三小时就起床，到机场后，飞行员和机械员共同准备飞机。从机窝到起飞线，因滑行道是碎石的不能开车滑行，只能用人力推，推好一架飞机，需要 20 分钟左右。再加上给飞机加汽油、滑油和检查等，准备时间需要 2 个小时。当天朦朦亮时，飞机就起飞了，一直飞到上午 8 点，上午 10 点到下午 1、2 点这段时间，往往要防空，要把飞机推到机窝伪装起来，估计敌机来不了后再接着飞行，到天快黑时才收场，在场时间通常有 10 多小时。飞行结束后，为防止飞机意外着火，还要把机内汽油、滑油放尽，再作一次检查，然后才把飞机推进机窝。

在汤原飞行，生活条件很艰苦，吃的住的都很差。机场附近原有的一些房屋在我们到来之前，早已被群众夷为平地。因此，我们只好住在机场附近一个叫民主屯的村子里老百姓家里。睡的是简陋的上炕，一个土炕上挤着五六个人，互相之间有些影响也顾不上了。这个村子远离机场几公里，上机场主要靠步行，来回要走 1 个多小时。当时中队仅有的一辆汽车，经常忙于运输飞机用的油料和器材，只有在车子没有其它任务时，我们进退场才能坐一坐。吃的方面虽然设有“空勤灶”，但在当时条件下很难搞好。蔬菜主要是土豆，还有白菜、萝卜，不要说牛奶、鸡蛋，每人每周能吃上几两肉就很满足了。主食是高粱米，白面大米很难吃上一餐。医疗卫生条件也很差，中队没有医生，只有一个卫生员，医药十分缺乏，小病还可以顶过去，遇上大病，就得坐一昼夜的火车，赶往东安校卫生队去看了。

1948 年 11 月初，沈阳解放。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歼击机中队也在不断发展。1949 年初，训练基地由汤原转移到长春东南面 60 公里处的公主岭机场。机场条件也改善了，飞机也增加了，有 232 了好几架美制 P—51 战斗轰炸机。飞行员也增加了，除了原有的人员外，还增加了邹炎、郑刚、徐振东等 6 名 2 期学员和我地下党党员邢海帆、赵大海以及国民党起义人员杨培光、严磊、谭权州等人，总共 25 人左右。训练器材物资生活条件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30 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第一个歼击机中队战斗生活的日日夜夜，总是叫人难以忘怀。当时，客观条件实在很艰苦，但没有人嫌弃。大家心中燃着一团火，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好好学本领，争取早日上前线参战，为死难兄弟姐妹们报仇雪恨，为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出力……

7 丁钊：第一支空降兵部队。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入赴莫斯科，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帮助我国建立空军的问题。

8月18日，刘亚楼电请中央：“为准备攻占台湾，伞兵登陆对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同志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中央于次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但请向苏联同志征询下列各项意见：（1）伞兵条件如何？（2）据我们所知，国民党也曾有过伞兵的组织 and 指挥，但从未使用过。我们有人民条件，有游击战争经验，自与他们不同，但伞兵登陆或者有海上登陆的配合，或者有适当的群众及地形条件进行近距离的扰乱，这样需要多少人方能担任上述任务？（3）苏联空军负责同志对我们组织伞

233 兵的意见如何？我们的条件是否具备？”

刘亚楼遵照中央的指示，与苏联空军负责同志进行了磋商。同年11月，中央经过认真研究，由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中央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1950年2月15日，向苏联政府聘请顾问41名，订购降落伞300具，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

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根据空降兵处于敌后独立作战，必具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特点，要求和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模范的班、排干部组建空降兵。5月27日又电告各部：如确难按条件抽调，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时，则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空降兵部队领导机构的组建，要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调。中央军委组建空降兵的决心给我们参与组建工作的同志增强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军委确定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

万事起头难。筹备组建空降兵部队困难很多，工作千头万绪，除大力选调干部、抽调兵员和筹措物资等项工作外，首先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定编制。组织多大规模的空降兵部队，怎么个编法？我军没有经验，当时只能向苏联学习。经空军领导机关同苏联顾问团研究，参照苏军建设空降兵的经验，考虑到我军的实际情况，本着敌后空降、小分队、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确定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作战营和保障分队，设狙击1、2、3、4营，1个迫击炮营，1个战防炮营，1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场、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编3834人。因组编空降兵我军无先例，无经验，这个编制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某些职务名

234 称也是沿用苏军的……

二是选择基地，空军领导认为，根据当时空降兵部队只有一个旅，除了主要担负解放台湾任务外，还要应付国内各个方面突发事件等情况，训练基地选在中原地区比较合适。为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带领苏联顾问于1950年5月5日，赴开封、新乡、安阳等地进行实地勘察，5月9日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出报告，认为开封、郑州两地可作为空降兵训练基地。聂代总长5月23日批示：同意。随后，中央军委电令中南军区，责成河南省军区将开

封机场附近原日本兵营和郑州机场附近之房屋全部腾出交空军陆战旅使用。河南省军区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很快把房屋腾出。旅组建后，由于开封一地能容纳全部人员，故未进驻郑州机场，营区场地开阔，营房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离机场 1.5 公里，并有直通公路。训练基地位于开封东南，距城 1.5 公里。机场南面有面积很大的平坦沙荒地，可供跳伞着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训练基地。

空军陆战第 1 旅的旅部领导机构，是中央军委责成第 3 野战军组建的。军委于 1950 年 7 月发布命令，任命：

陆军第 26 军 77 师师长王建青为旅长；

陆军第 20 军 58 师参谋长方铭为副旅长；

陆军第 31 军 91 师副政委丁剑为副政委；

陆军第 21 军 63 师政治部主任林震为政治部主任。

1950 年 10 月因王建青身体不适合伞兵条件而调离，陆军第 28 军参谋长朱云谦任旅长……

苏联顾问团 41 人，因旅部领导机构是上海组建的，他们先期到达开封。旅机关到开封后，立即投入了部队的组建工作，主要任务是接收陆续从陆军调来的大批人员，进行体检和编组部队。当时从 1、2、3、4 野战军和东北、华东、山东军区中的 37 个军和 3 个军级单位共抽调来 6862 人。对体检合格者，采取以某一个军 235 选调来的人员为主编为一个连的原则进行编组。

经过 1 个月的紧张工作，体检合格者 5053 人，占调来人员 73%，8 月底机关和部队按编制基本编组就绪，全旅实编 5000 余人，党员占 73%，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 93%，在陆军直接参加过战半的占 83%……

1950 年 9 月 17 日，旅在开封营区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先组织了阅兵式，接着宣读了华东军区、第 3 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首长发来的贺电、贺信；第 3 野战军周骏鸣副参谋长代表中央军委给空军陆战第 1 旅授军旗并讲了话。旅长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战员进行了庄严宣誓……

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并将 9 月 17 日定为空降兵诞生纪念日。

9 月 27 日，中央军委根据 3 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决定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 7 总队（即伞兵总队）中的部分人员调归空军陆战第 1 旅。第 7 总队是 1949 年 4 月 15 日起义的国民党伞兵第 3 团改编而成的。从中挑选了 30 余名干部、350 名战士加入第 1 旅……

在苏军顾问团的帮助下，第 1 旅开始了伞兵各种技术训练。全旅经过 10 个月的突击训练，圆满完成了训练计划。先后多次参加了演习、阅兵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中，有了空降兵这个新兵种，它标志着中国空军开始了全面发展的新格局。236

